

# 炎黄春秋

第 **9** 期  
2009年

**胡耀邦逝世前半年的心态**

**国际反修斗争和“灰皮书”**

**“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另一种解读**

**我所了解的台湾农地改革**

**我告发了同学宋尔仁**

## 目 录

### 怀人篇

- 1 胡耀邦逝世前半年的心态……………刘崇文  
6 再说我的父亲陆定一……………陆 德  
11 龚育之和我的文字交……………朱 正

### 往事录

- 16 国际反修斗争和“灰皮书”……………张惠卿  
21 文革中影响全国的“青岛事件”……………丁龙嘉  
29 第一届政协秘书处工作琐忆……………孙小礼  
35 康濯何以揭发丁玲……………徐庆全

### 一家言

- 40 “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另一种解读  
——从文明到文化的转向……………子 明  
46 民主与专制的百年迷途……………邵 建

### 求实篇

- 48 我所了解的台湾农地改革……………匡萃坚  
56 首届中央政府党外人士所占比例……………胡 泊  
60 中共为什么1949年会胜利……………张 彦 编译

### 人物志

- 64 “信阳事件”后刘建勋在河南……………刘立强  
71 民国代总统周自齐……………丛彩娥 杨世谷

### 随感录

- 74 “总统府”对面的纪念碑……………智效民  
76 纪念端午节的意义……………周有光  
77 “国进民退”是一条死胡同……………张 鸣

### 忏悔录

- 79 我告发了同学宋尔仁……………老 鬼

### 海外事

- 81 不朽的库克……………毕 苑  
84 德国卫生部长专车失窃案……………亚思明

### 顾 问:

杜润生 李 昌 于光远 李 锐  
**编 委 会** (以姓氏笔画为序):  
方 实 王俊义 冯 健 冯其庸  
曲润海 朱厚泽 何 方 吴 象  
吴明瑜 宋木文 张文彬 张岂之  
张荣华 李 普 李一鑫 李大同  
李冰封 李维民 杨天石 杨继绳  
杜 光 杜导正(召集人) 苏双碧  
邵燕祥 周瑞金 范敬宜 金冲及  
赵德润 钟沛璋 凌 云 展 江  
徐 孔(副召集人) 秦 晖 袁 鹰  
高尚全 章诒和 萧蔚彬 彭 迪  
曾彦修 韩 钢 雷 颐 魏久明

### 社 委 会:

杜导正(主任) 徐 孔 吴 思  
杨继绳 李 晨 徐庆全 胡竞成

### 社 长: 杜导正

法定代表人、常务社长、总编辑: 吴 思

副 社 长: 徐 孔 杨继绳

执行主编: 李 晨 徐庆全

社长助理兼办公室主任: 胡竞成

网 络 总 监: 张晓鸥

理 事 长: 杜导正

副 理 事 长: 莊其環 李 琼

理 事: 白建钢 郎福呈

秘 书 长: 徐 孔

副 秘 书 长: 杜明明

主管、主办单位: 中华炎黄文化研究会

本刊常年法律顾问:

张思之(吴栾赵阎律师事务所 010-68083211)

步凌云(北京市华一律师事务所 010-85869163)

国外总发行: 中国国际图书贸易总公司

(北京399信箱)

国际标准连续出版刊号: ISSN1003—1170

国外发行代号: 1274M

国内总发行: 北京报刊发行局

国内统一刊号: CN11—2817/K

国内邮发代号: 82—507

订购处: 全国各地邮局(所)

印刷: 唐山市润丰印务有限公司

社址: 北京市西城区月坛南街69号

邮编: 100045

本 刊 网 址: <http://www.yhcqw.com>

本刊电子信箱: [yanhcq@sina.com](mailto:yanhcq@sina.com)

发行部 邮箱: [yhcqfxb01@126.com](mailto:yhcqfxb01@126.com)

电话: 发行部: 010—68532048

编辑室: 010—68534879 68523512

财务室: 010—68525374

办公室: 010—68522852

传 真: 010—68532569

广告经营许可证: 京西工商广字0296号

出版日期: 每月4日

定价: 6.90元

# 胡耀邦逝世前半年的心态

· 刘崇文

耀邦同志离开我们已经 20 年了。20 年前，他走得是那么突然，几乎谁都没有想到，完全出乎人们的意外。可是，他又走得是那么自然。当时，他身体状况很不好，1987 年冬党的十三大后他就病了，1988 年冬又得了一场肺炎，后来虽然康复，但食欲不好，吃东西很少，体重不断下降。当时，他对中央生活会的“揭发批判”还心有余悸，总觉得这件事可能还没完，他还没有得到真正的原谅和宽恕，因此心存恐惧。当时，国内政治、经济形势都比较复杂，社会上思潮起伏，议论纷纷，他是个心系天下、忧国忧民的人，内心很不平静而又无法抒发，因此感到郁闷压抑。身体不好，心有余悸，思想压抑，三者互为因果，互相影响，恶性循环，最终导致心脏病突发而去世，也就是很自然的事情。

## 希望调配一名政治秘书

1988 年 11 月下旬，刘少奇诞辰 90 周年学术研讨会在湖南长沙举行。我当时是中央文献研究室刘少奇研究组的组长，正在长沙具体负责主持这次研讨会。就在这同时，耀邦同志也在长沙休养。我们的会址是在蓉园，耀邦同志也住在蓉园的 9 所。参加研讨会的一些领导同志，如邓力群、于光远、杨波等，听说耀邦同志住在这里，都先后去看望他。我因为会务缠身，先打了个电话给他的警卫秘书李汉平，说会后再去看他。因此他知道我也来到了长沙。会议后期的一天，李汉平来找我。我同李汉平很熟，我以为他是来看我，找我叙叙家常。可这次他是奉耀邦之命，有事来找我的。他告诉我，耀邦同志身边现在除他之外，只有一个机要秘书，经常收到一些来信，都没个人替他答复；有些问题和想法希望有个人交谈、议论、讨论，还有些事情需要有人帮助做点记录，查点资料，整理点材料。因此想让我去当他的政治秘书，问我愿意不愿意。对此，我毫无思想准备，既感到突然，又感到惊喜。对于又能到耀邦同志身边工作，为他服务，我是很乐意的。自从 1959 年调离他身边之后，多少年来，我经常做梦又回到他身边，在关东店 20 号（耀邦同志当年生活和工作的地方，后来为赵紫阳居住）那熟悉的院落里工作。其实，当时我压根儿也没想过再去当他的秘书，但不知为什么会老做这样的梦？耀邦同志这个人是很强的人格魅力的，几乎在他领导下和同他接触过的人，包括对他有这样那样意见的人，都会不由自主地被他折服。他那无私忘我、全身心投入革命工作的精神，忧国忧民、以天下为己任的抱负，好学敏求、爱惜人才的热忱，深刻、敏锐、新鲜和活跃的思想，近乎天真、过于率直的性格，爱憎分明、襟怀坦荡的品德，就像巨大的磁石吸引着周围的人。我想大概就是这无形的磁力，在睡梦中把我吸引到他的身边。如今梦想竟将变成现实，我自然是喜出望外。只是文献研究室这边，我还担负着主编刘少奇年谱等一些有待完成的任务，一时恐难完全脱身。同时，我已年近 60 岁，身体又不大好，剩余的岁月和精力有限，而到耀邦同志身边工作，责任重大，他对工作，尤其是对文字工作又要求严格，标准很高，我害怕难以胜任，有负耀邦同志的期望。思忖再三，最后，考虑到耀邦同志当时的处境，以及我与他的关系（我从 1954 年到 1980

年一直在团中央工作,其间1957年到1959年担任他的秘书),他对我的了解和信任,我觉得他提出要我去当他的政治秘书是经过反复思量、认真考虑的,我义不容辞,没有理由不答应。只是暂时还得兼顾一下文献这边的工作,然后再逐步完全过渡到他那里去。李汉平将我的意见转告了耀邦同志,他很高兴。很快就让李汉平回北京,向当时的中央办公厅主任温家宝汇报(实际是通过他报告中央)经批准同意后,即正式办理调任我的手续。

## 不能释怀的政治心结

因李汉平要回北京,耀邦同志身边缺人,刘少奇学术研讨会也闭幕了,他们就要我暂时在长沙陪伴一下耀邦同志。于是,我就搬到9所,在那里呆了一个礼拜。

在这一周的时间里,我觉得耀邦同志的心情、身体都比较好。当时,不断有一些人来看望他,有亲友,有当地的干部,也有来湘工作或度假的领导人。他都热情、谦逊地接待大家。记得有一次正在长沙休假的倪志福同志要来看他,他坚持不让倪来,而要自己去看望,对方当然不同意,最后他们还是在9所相见。文献研究室来长沙开会的同志也希望看看他,耀邦同志欣然同意,并同大家亲切交谈、合影留念,给大家留下了很好的印象。

对于我的到来,耀邦同志流露出一种高兴的情绪。这一点不仅在我和他的接触中,通过他的言谈、举动、态度、表情可以感觉到,就是在他接见文献研究室同志的时候,有些人也感觉到了他对我的一种亲切、和蔼、关心的态度。我认为,这是由于他希望找个合适的人帮他做点事情的心愿,现在总算落实了下来,他有一种轻松的感觉。早在1987年他在天津休养时,叫我去陪他打桥牌,就曾对我说:有些事情我要跟你说说,不然以后就搞不清了,那是我在中央工作时的一些经历和决策,大约有那么十几、二十个问题,需要排排队,然后一个一个把它如实地说清楚。当时他说:这件事现在还不着急,先有这么个思想准备,作些酝酿和考虑,等以后再慢慢来。由此可见,他想要我去帮他完成这项工作,是早有考虑、酝酿已

久,只是由于主客观原因,一时还没拿定主意,直到这次才决定下来。在长沙,他又进一步对我说:我要跟你讲一些事,你记下来,不然将来我见马克思后就说不清楚了。如实记录,既不吹嘘自己,也不谄过于人。我从来反对美化自己,只是希望将是非曲直搞清楚。足见耀邦同志对这件事是何等的重视和关注。同时也反映了他对我所寄予的期望。

这段时间,他告诉我,1987年初下台后,他先是清理了这些年的讲话稿,然后就读马恩全集,前后8个月,闭门谢客。后来到了天津休养,李瑞环说他政治作用已经消失,要他找点精神寄托,他就作诗、写字。他问我:你说我还可以干什么?我想了一夜,第二天同他说:作诗写字作为一种修心养性的事,茶余饭后做做是可以的,但想在这方面做出成就,留下什么东西就很难了。正经还是把你的这段历史留下来,特别是三中全会后处于中国这样的一个大国大党的领导地位的这段经历留下来,这是非常有价值的。他说:我在中央工作的这段时间,也可以说是历史的重大转折关头,情况错综复杂,意见不尽相同,我经历了不少事情,面临着艰难的抉择。我希望如实地把这些事情说清楚,记录下来以备查证。

在长沙那几天,我将我写的纪念刘少奇诞辰90周年的论文请他看了。这篇文章《人民日报》已发表,但删去了前面分析形势的一部分。他看后说,前面这部分没什么问题嘛!我说可能他们觉得篇幅长了吧?于是我们就谈到少奇同志,我说少奇同志在50年代就有许多非常可贵的改革思想,人们还不大了解。又说到“文革”少奇同志无比悲惨的遭遇和所蒙受的巨大冤屈,现在把这些都归罪于“四人帮”,似乎不能令人信服。他沉吟片刻,然后若有所思地说:是啊!这个问题总应该有个说法。当时我理解他的意思是,中央虽然已为少奇同志彻底平反昭雪,但“文革”为什么要那样坚决、彻底地打倒刘少奇,“四人帮”又为什么能那样不择手段、肆无忌惮地恶毒诬陷、残酷迫害刘少奇,似乎还没有个明白的交待和说法。联系到他曾经自责在党的八届十二全会上,也违心地举手赞成把刘少奇永远开除出党,当时除陈少敏同志一人表示了无声的反对外,谁都没有也不敢表达自己真正的意见。因此他觉得我们党

在打倒刘少奇这件特大冤案上,还有深刻的经验教训需要总结。

耀邦同志是一位彻底的唯物主义者,仅就他在粉碎“四人帮”后,那么坚定不移、大刀阔斧、不顾一切地在那么短的时间内,彻底平反了中国共产党历史上一系列冤假错案,就足以证明他的大智大勇、有胆有识、无私无畏,也就理所当然地得到广大干部、中共党员、人民群众的感激、爱戴和敬佩。就在前两年我们去看望李昭同志时,还碰到有从海外归来的游子,带着父母的嘱托,来到耀邦同志遗像面前,鞠躬跪拜,默哀致敬,深深表达他们全家被洗雪冤屈之后的感激心情。但耀邦同志的思想并不只停留于此,从他对“文革”中为什么发生刘少奇这桩最大冤案总应有个说法的思考,说明他认为还要由此进一步深刻总结我们党和国家政治生活、政治制度、政治体制上的经验和教训。尤其是联系到他自己的政治命运和政治生涯,从他亲身的经历和遭遇中,他深切感受到,这是关系到我们党和国家长治久安、健康发展的根本所在。而这正是当时,也是他在去世前所萦系于心,不能释怀的最大心结。

耀邦同志对1987年初中央“生活会”对他的批判,以及他因此被迫辞职下台的事谈的很少,他更关心和忧虑的是党和国家的前途和发展。他只是觉得中央“生活会”是一个对他进行“揭发批判”的会议,人们什么意见都可以说,其中有许多不实之词,不能把这当作中央的正式结论。而对他在中央10年来的这段工作,是非功过,希望中央能有一个正式、公道的说法。他曾坦诚由衷地对我说:关于我的问题,我只希望中央能有个正式的说法,还历史一个公道。应该说,这是一个合情合理、合纪合法的心愿。

1988年,我因写纪念刘少奇诞辰90周年的文章,向耀邦同志请教一段马克思语录。不久,他就将这段语录亲自写好,让机要秘书张耀光同志给我寄来。这段语录是:“对历史事件不应当埋怨,相反地,应当努力去理解它们的原因,以及它们的还远远没有完全显示出来的后果。施纳普汉斯基·利希诺夫斯基在法兰克福议会中大声说道:历史权利没有任何日期。他说得多么正确。它确实是从来就没有日期的!”这就是耀邦同志对在刘少奇和他自己身上所发生的历史事件,所抱

的马克思主义的态度和观点。

## 向秘书交待三项任务

我从长沙回到北京后,温家宝同志即派中办人事局局长到文献研究室,商量调任我的事情,并找我谈话征求意见。文献研究室的领导对此都非常支持,并且表示,虽然刘崇文目前暂时还两边兼顾,但主要服从耀邦同志的需要。我当然没有什么意见。这样,很快就正式下了调令。

这段时间,耀邦同志在长沙生了一场病,然后就转到广西南宁休养,因南宁的冬天比长沙暖和。过了春节,我就奉命去了南宁。

到南宁后不久,1989年2月22日的晚饭后,汉平来说耀邦同志找我。我们三个人就在一个小会议室坐下,由耀邦同志正式同我谈话。

这次谈话是从7时半看完新闻联播开始的,直谈到晚上9点多钟。回来后,我马上就在保密本上将耀邦同志谈话的要点追记了下来。为了如实反映那次谈话的内容,现在就把当时追记的全文抄录如下:

耀邦同志说:欢迎你来。三件事:

一、有些政治性的事情需要处理、商量、研究、答复、解决、办理,如有些来信,政治性的,需要人帮我起草个回信,商量个答复意见;中央有些会议,有些问题,需要有人商量、议论,我还是政治局委员。总之,政治秘书的任务。这类事不多,一个礼拜一两件。

二、我已经退出政治舞台,但政治生命并没有结束。1987年初下来后,先用3个月清理了我的讲话稿,有几百万字。德平(注:耀邦同志的长子)也帮助看了看,他说没有错误。后来又用5个月翻了马恩全集,以前看了40多卷,做了些记号,这次写了笔记。那8个月是过于劳累,影响了身体。十三大以后就生病了。我也不会发难,有家庭妻儿子女,不能舍得一身剐了。同时也不做坏事,不做丑事,从来也不做坏事,基本不做丑事。去年到天津,李瑞环说,你政治上的作用已消失,应找点精神寄托。我就写诗,在山东写了十几首,家里人看了觉得不错,可送给一些专家看了,认为不行,意思可以,但不合韵律。后找了王力的诗词格律看了,再看别人的诗,现在不敢写了。

我参加革命至今已 60 年,想从近到远,即先从下台一段开始,逐步往前,一段一段把一些事情记录下来。需要有人帮助查点材料,排点顺序。我讲,你帮助追记,以备将来查阅,有些事情我不说就没人知道了。不吹嘘自己,不委过于人,如实记录,我从来反对美化自己,只是希望将是非曲直搞清楚。我还有许多批示。60 多年,逐步往前讲,有经历,有风险,有趣闻。

回忆录现在不写。

这件事也不着急,慢慢来。只是备查性质,也不搞什么东西。但要帮我排排时间。

三、我现在也写不出什么东西了,但对一些重要问题还有些看法、观点、意见。对这些需有人帮我一起议论,记录下来,如成熟可以写点东西。比如对物价问题的意见,我一直是不主张全面涨价的。周杰告我:紫阳在一次小组会上就说过,耀邦同志一直不同意涨价。十三大政治报告,紫阳要我谈谈意见。我说给写作班子谈不好,我同郑必坚谈。我认真看了几遍,同郑秘书边谈边议了三天半。我问他同意不同意我的意见,他说同意,他也做了点记录,但后来他说只简单转告了几句。赵后来问我看后意见如何,我说同郑说了,但没说议了三天半。

就这三件事,是否还有第四、第五件事?

### 体重下降 心有余悸 思想压抑

跟我谈话后,我觉得他似乎轻松些了。第二天上午他就挥毫写字,写了几幅唐诗,字写得相当流畅、漂亮。本来我想请他为我写幅字,但心想我刚来到他身边,就开口要他的字,似乎不合适,反正来日方长,以后再说。他大概看出了我的心思,就笑着说,你看哪幅好就拿去做个纪念。于是我就留下了他写的“但使龙城飞将在,不教胡马度阴山”的条幅。

即使如此,直到这时,耀邦同志仍心有余悸,尚存畏惧,颇多顾忌。本来他最关心的是在中央工作期间的一些事情,觉得他要是不说就没人知道,将来是非曲直就搞不清楚了。可是他却说要记录参加革命 60 年的经历,从近到远,逐步往前,一段一段展开。自然,耀邦同志也有将他一生经历记录下来的想法,但同时他也有借此以掩人

耳目的意思。而且,他又一再声明,现在不写回忆录,只是为了备查,并不想写什么东西,就是怕引起猜疑,招来麻烦。正如他所说的“我也不会发难,有家庭妻儿子女,不能舍得一身剐了!”更明显的是,找我谈话后,他并不急于开始进行这件事,而是不断说不着急,慢慢来。我当时就觉得他还存有顾虑,认为时机还不成熟。迫使他下台的那次生活会的阴影,一直还笼罩在他的脑海里。对于党内斗争,耀邦同志一生经历的太多,留下了难以磨灭和忘怀的印记。刚参加革命,他还是个红小鬼,在江西瑞金就碰上抓 AB 团,差一点送了性命。“左”倾路线的残酷斗争、无情打击,后来的延安整风,解放后的历次政治运动,他都是过来人。特别是“文革”前,他在担任西北局书记处书记和陕西省委第一书记时,被当时西北局发动的对他的批斗,整得体重下降到不到 50 公斤。后来还是叶帅(叶剑英)把他接回了北京。这次中央生活会,他当然知道,其严重程度,与陕西相比,不可同日而语。他总觉得这件事可能还没完,他还没有得到真正的宽恕和原谅。在他下台前后,小平同志曾对他说,你的问题揭到哪里算哪里,让大家揭。还说:你总觉得我妨碍了你!你老想树立自己的形象!生活会后,他曾同李昭去看望过邓小平一次,谈了 15 分钟左右,邓很冷淡。在我们日常的交谈中,他尽量回避提到小平和陈云同志,万不得已时也从直呼他们的名字,而是用摸右边耳朵代表指小平,摸左边耳朵代表指陈云,可见其之噤若寒蝉。他还告诉我,有一次,他去拜访叶帅,在他俩谈话时,叶帅把收音机开得大大的,唯恐被人听到。正是在这种恐惧心理状态下,他并不急于跟我谈他想谈的那些问题。他自己完全没有想到,我们大家也万万没有想到,此后不久,他就突发心脏病而与世长辞,他晚年的这一心愿竟成泡影,实在是无法弥补的历史遗憾!

在那段时间,他一方面还心有余悸,唯恐再有什么闪失,又招致不测,另一方面对于当时国内复杂的政治、经济形势,他又不能无动于衷。1989 年的春天,国内形势很复杂,社会上思潮起伏,有些动荡不安,知识界、思想界议论纷纭,异常活跃,经济形势也比较严峻。中央内参每天都反映不少这方面的动态。他是一个时时刻刻都不

忘国是的人,包括在下放干校劳动改造时,他都不忘关心国家大事,当时被人们讥笑为不识时务,批判他是不老老实实劳动改造。可作为一个把自己的全部生命都融入了党和人民事业的革命者,这就是他的一种本能,一种历史责任和生活信念的本能。可这时他的处境,他的身份,他的地位,又不允许也没有可能让他发表意见。他心潮起伏,又十分压抑。记得当时中央决定4月份在京召开政治局会议,议程是讨论研究教育问题。耀邦同志收到通知后,觉得教育问题今天已不是热门话题,而且也拿不出多少钱来。关键还是经济问题,要好好把粮食和多种经营搞上去。他认为,不要出的题目太多。如果问题一时解决不了,今年可以少开一次全会。今年是建国40周年,9月还要开一次全会,不知道40周年还能拿出点什么东西来?卖些黄金?我们的黄金也不多,卖不了多少钱。他还说,国庆40周年要开个干部大会,由紫阳作报告,总结建国40年的经验,不拿出一个好报告怎么行?当时我曾对他说,回京后,紫阳同志可能来看你,征求你的意见,你要有些准备。他说,他不会来看我,如果来征求我的意见,我先问他对当前形势的看法。我说,现在形势非常复杂,你还是以不讲话发表意见为好。他当即回答说:惹不起,躲得起。我可以学陈云同志,不说话。

到南宁后,我觉得耀邦同志的身体和心情都不如在长沙。特别是他食欲不好,吃东西不多。他的牙齿一直不好,脱落不少,但他又不愿拔掉重镶,主要靠牙龈咀嚼,这也影响他进食。我们劝过他多次,他怕疼,也怕麻烦,就是不同意拔牙镶牙,对此我们都很担心。其实我们每天的伙食都很好,可他就是没胃口,也嚼不动,只是对一种酸甜的小菜感兴趣,可那又有多少营养?他的体重不断下降,我们为此都非常忧心。大家想方设法帮他增加些营养,就让厨房做些鱼糜、肉糜的粥食给他吃,但也没有多少效果。

拖着病弱的身子,带着心存的余悸,怀着压抑的苦闷,3月底,耀邦同志从南宁回到了北京。他是回来参加人代大会和政治局会议的。回京后,因为他要参加会议,又不断有人来看望他,我没多少事,就先回文献研究室处理一些刘少奇研究组的事情,但隔几天去看看他。

就在他参加政治局会议突发心脏病的前两天,他对我说:我不想呆在北京,开完会我们还是到下面去。同时,他又犯愁地说:到哪里去呢?不知道人家欢不欢迎我?因为有这个顾虑,他还是想到天津去,觉得和李瑞环比较熟悉,去他那儿可能方便一些,但仍然担心李瑞环是不是欢迎他。我当时对他说,你这是多虑了,不仅李瑞环会欢迎你,你到哪里去,人家都会非常欢迎的。这也反映了他当时的心情,总觉得自己现在还是“待罪”之身,深怕连累、影响了别人,给人家带来困难和麻烦。

4月8日,李汉平打电话告诉我,说耀邦同志在参加政治局会议时突发心脏病,经抢救后住进了北京医院。我十分震惊,立即赶到医院,并在此后几天,同李汉平轮流守候在那里。那几天,他的病情反反复复、好好坏坏,我们的心情也是起伏伏、忧忧喜喜,但总觉得他会渡过难关,恢复健康。到第7天头上,我们更相信这一点了,因为据说急性心梗只要过了7天就相对安全了。可是,就在他发病后的第7天——4月15日,人们没能把他从死神手中夺过来,他就那样急促地离开了我们。

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我一直觉得,可以想象耀邦同志在政治局会议上是怎么突发心脏病的。他当时在那样一个场合和环境里,肯定是思绪万千,心潮起伏,他有许多话想说却又不能说,他忧国忧民却又一筹莫展。无比的忧伤苦恼,巨大的思想压力,不断冲击着他那病弱的身体,结果导致血压急剧升高,心脏大面积梗塞,终于一病不起。最后,这位协助邓小平开创了中国历史新纪元的中国共产党领导人,就这样带着悲哀和遗憾,很不心甘情愿地走完了他73年光辉的人生历程。

耀邦同志逝世后,中央为他举行了规模盛大的追悼会。中共中央的悼词,全面公正地评价了他伟大的一生,特别是他为中国改革开放事业做出的杰出贡献。在他90年诞辰时,中央又为他召开了隆重的纪念大会,再次肯定和颂扬了他的历史功绩。我相信,随着时代的进步,他生前的遗愿,终究都会一一实现,因为历史是无私、也是无情的。

2009年2月于广西北海

(责任编辑 徐庆全)

# 再说我的父亲陆定一

● 陆 德

坚持实事求是，文章“一个字不改”

父亲陆定一 1978 年 12 月 1 日出狱，被关押 13 年，身体坏得不成样子。刚刚出狱不久，在医院就接受报社要求写了《怀念人民的好总理——周恩来同志》的文章，并于 1979 年 3 月在《人民日报》和《光明日报》两报同时发表。

虽被关押 13 年，受尽凌辱和折磨，但父亲敢于直言的性格，始终没有变。文章在赞扬了周总理的优秀品德后，也对我党在建国后的若干政策进行了反思。其中，特别有两句话，一句是提出：“彭德怀同志的‘意见’是正确的，错误的不是彭德怀同志，而是反对彭德怀同志的人。”另一句是：指出我们党从庐山会议起就“愈搞愈‘左’，这种‘左’倾错误，后来发展成为路线，一直到 1976 年 10 月打倒‘四人帮’，才得以纠正”。这两个观点，现在普遍被接受了，但当时对所谓“大跃进”、“文化大革命”都还没有作出正确的结论，当时都还是“禁区”。父亲这种实事求是的看法，在党内是十分大胆和超前的，因而引起某些领导同志的不满，特别是军方。就连胡耀邦同志，在赞赏这篇文章的同时也说：把“错误的是反对彭德怀同志的人”这句删去就好了。很多同志来打招呼，希望把这两句话删去。父亲虽深感压力，但决意不删，他说：“我们再不能搞‘两个凡是’了”，并亲自打电话给《人民日报》总编秦川同志说：“这篇文章，你一个字也不要改。”

这篇文章在党内外引起了很大的反响，党内的指责声也一直不断。直到两年多后的 1981 年 6 月，全党通过了《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和为彭德怀同志平反后，才统一了认识。

1991 年，前《光明日报》副总编陈清泉同志

编辑《陆定一文集》时，问父亲这篇文章要不要修改，父亲亦说：“一个字也不要改。”

拍案而起，率先为乡镇企业正名

改革开放初期，农村实行“联产承包责任制”，生产力得到解放，农民生活提高，又促进了社队企业的发展。但当时中央政策并不明朗，有人认为这是“扰乱经济秩序”，是“长途贩运”，是“投机倒把”，“抢占国家资源”，是“地下工厂”，受到打击，视为“违法行为”。有一位领导同志，甚至主张把社队企业一下子砍掉百分之五十到七十。1981 年，河北省一夜间就抓捕 200 多位企业家，包括马胜利。父亲这年视察工作到家乡，得知家乡无锡两位企业家上吊自杀了。他拍案而起，给总书记胡耀邦同志写信，表示家乡人均仅有四分地，不扶植农村企业就富裕不起来，并表示我们不能仿效资本主义初期让农民大量破产的经济发展模式，而应大力发展农村企业，使农民“离土不离乡”。他在信中明确提出：“谁打击社队企业，谁就是打击农民！”他敢于站出来，对当时的相关政策提出了质疑，为民请愿，而不怕得罪中央的一些同志。胡耀邦总书记十分重视，并批转印发给 1982 年上半年出席全国经济工作会议的代表（当然，会上引起一片哗然）。终于，三年之后，1984 年中央发布了新的农村政策，为社队企业（后称“乡镇企业”）正名，终于第一次把“支持和扶植农村乡镇企业”写上了中央文件。以后每年的“中央一号”文件，都明确提出要支持乡镇企业发展。从此，江苏的乡镇企业以每年 47% 的速度增长，许多家乡的企业家见到父亲，都激动得跪下，说：“是您老救了我们全家”。中央下达了支持乡镇企业的文件，看到乡镇企业的蓬勃发展，我们大家都很高兴，但也为这几年父亲所受的压力

感到心痛，而父亲却含笑着对我说：“这种事，总是需要有人先提出来的啊！”

## 提出“新闻定义”，强调“事实”是“本源”

父亲主管党的宣传工作达 22 年，时间之长，在国际共运中绝无仅有。在党中央的领导下，他不仅提出了“双百”方针、“教育方针”，在宣传领域中他还提出了我党的“新闻定义”。

1943 年 8 月，父亲在延安提出了我党的“新闻定义”。

父亲认为，“新闻的本源乃是物质的东西，乃是事实。”故此他提出了唯物主义的新闻定义：“新闻就是新近发生的事实的报导。”短短 14 个字，是现今大学新闻系教科书上所列 10 余种国内外新闻定义中最短的一个定义，但却蕴含了全部的新闻要素。

父亲“新闻定义”的一个最突出特点，是在对“新闻”与“事实”及“政治”关系上的论述。父亲认为：“事实”是第一性的，是客观存在的，而“新闻”则是第二性的，“政治”也是第二性的，因为其中增加了人为的因素，这就涉及到立场、观点、修养、道德、目的等，以人的意志和社会需要转移成了多种多样的新闻作品。他始终认为：“新闻真实性，是无产阶级新闻学的根本原则。”“一定要认识事实是第一性的，一切‘性质’，包括‘政治性’在内，与事实比起来都是派生的、被决定的、第二性的。”

父亲不赞同在没有第一性和第二性“前提条件”下笼统提“新闻为政治服务”这个口号，他说：是否为了所谓政治，为了政绩，就能去报喜不报忧，就能去欺上瞒下，就能说假话？这是在强奸民意！混账新闻！我们党在这方面的教训还少吗？！集团有集团的“政治”，地方有地方的“政治”，而无产阶级的政治是实事求是。

1945 年 3 月，父亲撰写《解放日报》社论——《新闻必须完全真实》。1946 年 1 月，父亲就《新华日报》创刊 8 周年之际，又著写文章《报纸应革除专制主义者不许人民说话和造谣欺骗人民的歪风》，再一次提出：“报纸有两种，一种是人民大众的报纸，告诉人民以真实的消息，启发

人民民主的思想，叫人民聪明起来。另一种是新专制主义者的报纸，告诉人民以谣言，闭塞人民的思想，使人民变得愚蠢。……它对于社会，对于人民，对于国家民族，是一种毒药。”

晚年的父亲，又曾多次对相关同志说：“新闻工作搞来搞去还是个真实问题。新闻学千头万绪，根本性的还是这个问题。有了这一条，就有信用了，有信用，报纸就有人看了。”

强调新闻工作者要实事求是，这一理念陆定一一生都没有改变。这与一些党风不正的“假大空”宣传和一些人将“政治性”提高到“第一位”的观点，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 面对腐败，提出惩治腐败需用“外力”

改革开放、市场经济，给国家带来了生机，但一些不健康的东西，如贪污腐败、钱权交易、权力寻租等也随之在侵蚀着肌体。父亲在 1992 年就心痛地对党内同志讲：“我们党已经开始腐败了！”

执政党的腐败，是关系到党和国家生死存亡的问题，父亲对此问题十分关心。

父亲对我讲：这一问题，列宁从建立苏维埃政权起就一直十分重视，并在党内建立专门机构监督和解决。但是，反腐机构也是由党来领导的，如果是党的领导人甚至是一把手也腐败了，那该由谁来管？对这个问题，列宁也始终没有提出解决的办法来。

父亲又讲：毛主席也提出“中央出了修正主义，你们怎么办？”他老人家是主张用“大民主”和“（文化）大革命”的办法去解决。当然，如果是整个党变质了，那么采用“二次革命”的办法推翻腐败政权，当然是对的，历史上历来如此。但是，如果全党不是这种状态，只是个别或局部问题，我们就不能使用“革命”和“暴力”的这种手段来解决。“文化大革命”，就是个惨痛的教训。此时“专政”的主要职能，应逐渐转向对外，而对内部，则是要建立民主政治，要靠社会主义民主和社会主义法制的力量，来解决腐败问题。

对于当前党内采用“自律”的方法，父亲讲：采用“自律”解决党内的腐败，当然是个好办法。

但是,光靠自律,是不能彻底解决腐败问题的。反腐中,自己既是“运动员”,又当“裁判员”,这在管理中就会出现(功能的)“缺失”,达不到预期的管理效果。

所以,父亲主张:“党的反腐问题,其‘裁判权’和‘监督权’,一定要放在外部。在自律的基础上,再加上群众监督和舆论监督的作用,才能更上一层楼。”而且“反腐的效果好不好,也要民众说了才算,而不是自己。”“对于执政党,它掌握着全部的‘政府资源’,所以,一定要强化外部的监督和制衡,才能有效抵制腐败现象。”

父亲认为:“这种监督利大于弊,不要怕别人讲话。对于群众的意见和不满,不要压制,压是解决不了问题的。”“不管是好的意见还是坏的意见,都要妥善处理”,“要学大禹(注:因势利导)而不要学他的父亲鲧(注:围、堵)。”

父亲说:“要加强这两种监督,就必须首先要加强我国的‘民主政治’建设,这是个必要条件。”

父亲在多次会议及与有关同志的交谈中,都坚持了这一观点。

1980年6月,为了保障各级人大和政协对党和政府的监督作用,父亲乘《新宪法》修订时期,向党中央呈书,要求在修订《新宪法》时,将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在正式会议上的发言,要给予“免责”权,列入到宪法的保护中,使其受到法律的保障(注:见中央文献出版社《邓小平年谱》)。但此呈请最终没有获准,失去了一次难得的历史机遇。

## 晚年反思,严于律己

父亲在“文革”中受林彪、“四人帮”迫害,是最早被打倒、批斗的领导人之一,在狱中又被吊起来刑讯逼供,关押了13年,许多亲属也被株连迫害,甚至惨死狱中。但是,他在总结毛主席所犯错误的时候,却又做了认真的自我批评,从来没有把自己当作“局外人”,从不推卸自己的责任。

他对我说:社会主义建设,我们没有经验,全党幼稚,理论也不成熟。我们跟着主席,向前探索,很多东西是马列没有讲过的。探索的过程,有的成功了,是“丰功伟绩”;有的不成功,犯了错误。毛主席的错误,在《决议》(注:指《关于建国以来

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中已经分析了。但毛主席所犯的错误的,不是他一个人的错误,历史不是一个人走出来的,我们都拥护、支持和执行过,是全党一起走的。我是中央的领导成员之一,主管文教和宣传工作,主席在这方面的错误,我也有份,有着不可推卸的责任。《决议》中对历史问题的批评,也是对我的批评。我们不能抱着“局外人”的态度。

“毛主席的错误,党作了决议,批评了他,我陆定一也犯了重大错误,没有人批评我,只好我自己骂自己了。”(注:摘自与于光远等同志的谈话)

“我做中央宣传部长这么久,我的工作犯了很多左的错误,斗这个斗那个,一直没有停。许多是毛泽东同志嘱咐的,我照办了,我有对毛泽东同志个人崇拜的错误。也有一部分是自己搞的,当然由我负全责。”(注:摘自在中央顾问委员会上的讲话)

## 关心党的前途,晚年提出“十大反思”

父亲晚年,对他的工作和党在社会主义革命及建设中的一些经验和教训,从认识上和理论上,进行了深刻反思。他从阶级斗争、无产阶级专政、党的民主集中制度、国家的民主政治、惩治腐败、“双百”方针、共产主义过渡期、中国改革模式等诸方面和领域,都诚恳地提出了自己的认识和看法。

比如,在“党的领导”问题上,他提出:

党的领导,有个党内民主和党与群众的关系这样“两个问题”。

党的集中,应是以党的民主为基础。要坚决克服和杜绝“家长制”和“一言堂”。

党与群众的关系,党是要为群众服务,而不是群众为党服务。

比如,在“无产阶级专政”问题上,他提出:

无产阶级专政,一定要搞社会主义民主。它应该是在人民民主基础上的专政。专制下的民主,不是真正的民主。

现在我们没有解决的问题,就是如何去实行社会主义的民主。

父亲主张:放开言论,推进政治体制改革。

比如,对“民主和自由”的问题,父亲指出:

民主和自由，是共产主义运动中的核心价值部分，故对民主和自由，我们应该是“扬弃”而不应该是“抛弃”。

比如，1992年我国经济发展中出现贫富差距过大，已超过了(基尼系数)0.4的“警戒线”，他在“反思”中指出：

资本主义在“原始资本积累”阶段，是采用扩大贫富差距、加大剥削和社会不公来实现积累过程。我们是社会主义的国家，工人、农民是国家的主人，他们应该是“改革”的最大受益者。我国的改革，也需要资本积累，但我们是否也要走“资本主义原始积累”的老路，用加大贫富差距和社会矛盾(的办法)去解决？！

等等。

在父亲去世10周年前夕，我整理出来他的十大“反思”，上呈胡锦涛等中央领导同志。2008年夏，中央党校李景田常务副校长和李君如副校长分别约见了，对我的整理工作表示“感谢”，并说这(反思)是对我党总结建国60年和改革开放30年的“一份宝贵财富”。

## 对子女言传身教，“不要去当官”

因为工作忙，父亲和我们的直接交流机会并不多。尤其是建国后，父亲的上班时间和主席的工作时间是对应的。主席是晚上工作白天休息，父亲白天黑夜都要工作，只是早上8点才起床，我们上学看不到他。当时他担任中宣部的部长，人民日报的社论必须在他签字后才能发稿。《人民日报》每天凌晨2点开始排版，所以他必须两点前把文章批完。父亲每晚都要两点以后才能睡觉。孩子们和他最多只能一起吃一顿晚饭。也只有这时，他才有空问问孩子们的学习情况。

父亲和我交流最长的一次，是1961年我去哈军工上大学之前，他专门抽出两天时间给我讲了一本老子《道德经》。他认为《道德经》里充满了辩证思想，年轻人要独立思考、辩证思维，不能再是1加1等于2，很多事情都是发展变化的。他还



1957年4月，陆定一(左)与毛泽东在杭州举行的部分省市市委书记会议上

让我重点看了毛主席的《实践论》和《矛盾论》，特别是其中“矛盾的双方在一定条件下向它的反面变化”的理念，他说你们走上社会必须学会辩证地看问题。

父亲是一个学者，他一辈子都在看书学习。直到他去世前三天还在病床上看书。他对我们子女的要求就是好好学习，将来才能为建设新社会贡献自己的能力。但他不希望我们走仕途，他60年代在我上大学时就告诫我们：“不要去当官。要好好学习科学技术。”如今，我们三个孩子都是技术型的干部，没有一个是企图走仕途的。

我们孩子们都把父亲当作心中的行为典范，没有文字的照本宣科，在日常生活中模仿着父亲的一言一行，规范着自己的道德行为。作为党和国家领导人，陆定一在外面视察，接见工人和农民时都是主动两只手握过去。有时候别人也会提醒，身为国家高级领导人，不需要那么谦卑。陆定一回答说：“民以食为天，他们是我们的衣食父母，最值得尊重。”建国初期，我们的党风是十分好的。可能现在的年轻人都不相信，那时父亲的车只供父亲公务使用，子女是不许坐的，哪有“车接车送”的事，母亲上班和我们上学，都是自己骑自行车去。“三年自然灾害”期，毛主席听说饿死了人，主动两年多不吃肉，中南海的首长们也纷纷主动减量，每天只供一两肉，同时父母的口粮

也减至 26 斤和 25 斤,除此,再也没有其它供应。要知道,这些人若在古代就是“皇帝”和“重臣”啊,全国再有困难,也不可能会饿着他们。但是,这些党的领导们就是要与群众同甘共苦,与群众一起共渡难关。虽然一些“左”的政策使国家和人民遭受了损失,但看出他们是要继续革命的,党风是廉政为民的。周总理参加外事活动最多,一出去就要显得仪表堂堂,气势不凡,但他那套服装一直穿了十多年都不许换,里面的衬衣是打了补丁的,只是袖口和领口,为了外事需要而拆换成新的。这是父亲亲口对我讲的事。打倒“四人帮”,在改革开放后,父亲到各地视察,都会特别叮嘱不要搞形式,不需要“警车开道”,不需要保镖和官员的“前呼后拥”。他曾说“安全和接近群众,到底哪一个更重要?我们不能和群众的距离越来越远。”他从来不去摆谱,不铺张。据父亲随身工作人员说:就连出席正式场合穿的衣服,陆老直到去世也就那么一身。联想到社会上的一些贪腐官员,真是无法与第一代吃过苦、打出来的开国元老们相比!

1984 年,我要到外地河南工作,要离开父母的身边了。为此父亲专门题了一幅字给我,作为他对我工作的嘱咐。题词上写:

一切从实际出发  
调查研究实事求是  
同工农和知识分子交朋友  
过则勿惮改(编者著:有过失不要惧怕改正)。  
这是他对我做人做事的要求,也是对他一生的写照。

我在外工作,做出些成绩,也遇不少困难。对有些现象,我不理解,也很委屈,回京与父亲交流时甚至流了眼泪。父亲说:“要完成革命事业,就会付出代价。革命战争中是生命的代价,改革开放也会付出代价的。你是党员,要有为事业不惜一切,甚至牺牲生命的思想准备。有了这种准备,还怕什么困难和委屈?!”随后,他又送我一幅字,上题:

千锤万击出深山 烈火焚烧只等闲  
粉骨碎身全不惜 要留清白在人间

这是对我的精神激励,也是父亲作为一个知识分子铮铮铁骨,刚正不阿,坚持真理从不退却的一种信条。一生中,父亲就送我这两幅字,但每当我见到这两幅字时,就像父亲他老人家站在我面前。

二〇〇九年四月于北京  
(国务院特殊津贴专家、亚洲院士)  
(责任编辑 徐庆全)

(上接 39 页) 此前没有一套周密准备的步骤,是难以想象的。

这套运作方式,以康濯这样级别的干部哪里能够解其堂奥?这就难怪在时过境迁之后康濯要发出“我怎么知道,我的意见变成了丁玲个人和党的关系的问题。你们把我摆在起义的位置上让我下不了台”的抱怨了。

但,问题还有另一面。尽管康濯不了解这套运作方式,但他对作协内部周扬、刘白羽与丁玲“话语权”的争夺,则应十分了解。从维护党的领导立场出发,康濯显然对丁玲等人的举动有不满,这才能有在党组会上谈并随后写出揭发材料的举动,而他还一度与丁玲在文学研究所有过亲密的合作关系来说,他写揭发材料自然不排除自保的个人考虑。《关于丁玲、陈企霞等进行反党小集团活动及对他们处理意见的报告》中说:“康濯同志在一个时候(主要是指他担任中央文学研究所秘书长期间)也曾参加了这个小集团的活

动,但他在检查《文艺报》的斗争中,以及后来在肃清胡风集团及其它一切反革命的斗争中是表现积极的,他在运动中提高了自己的认识,感觉到了丁玲过去不少言行是反党的,他和丁玲的关系是不正常的,因此他在会前就自动向党提供了丁玲的材料,在会上对自己的错误作了严肃的自我批评。”这就为康濯解脱了责任。

在这个报告送交中央前后,康濯在所写的一份题为《我在和丁玲关系上所犯错误的检查》中说:以丁玲和陈企霞的互相结合为基础的小集团,是一个“反党的小集团”,而他自己就是这个小集团的成员之一,是“陈企霞式的打手”,是个“文官”。自己和丁玲的“反党关系”是“相互影响和助长的”,因而在和丁玲反党的问题上,他是“自觉的,有意识的”。

身为“反戈一击”者,仍然需要这样来检讨自己才能过关,康濯所扮演的历史角色是多么勉为其难!

# 龚育之和我的文字交

● 朱正

回忆起来,我和龚育之同志,有整整二十年的交往。只是在记忆中,许多往事都已经模糊了。

交往的开始,很有一点意外。那是1987年《光明日报》图书评论版征文,我写了一篇《关于〈毛泽东著作选读〉的注释》寄去,8月27日的报纸就登出来。谈的全是技术问题,既谈到了它比旧版注释的进步,也提出了一些还可以改善之处。而我这篇议论别人长短的文章,本身就有可议之处。我批评《选读》没有注明汪精卫的《夹攻中之奋斗》的出处,以为它是出自陈独秀在《布尔塞维克》杂志上的一则“寸铁”。刊出之后,我收到了两封指出我这错误的信,一位是当年《布尔塞维克》的编辑郑超麟同志,他信中说,汪精卫的这篇“是1927年7月15日或其后一二日发表在汉口《民国日报》第一版上的。这就是汪精卫的分共反共的公开宣言,当时知道的人很多。”另一位来信者就是龚育之同志了。他在1987年9月25日给我的信中说:“汪精卫《夹攻中之奋斗》注释未注明出处,是一缺陷。当时未能查到原始出处(现在仍未查到),但此文收在汪氏文集中,日期署16年7月25日,较你指出的题辞(10月10日)为早。估计你未见到这篇文章,现附上复印件一份,供你参阅。”随信寄来的复印件有:一、汉口《民国日报》所载汪精卫《夹攻中之奋斗》全文,在这篇之后,还有孙科的《打倒蒋中正以后》一文,以及《张(作霖)蒋妥协条件之内容》、《吴佩孚将赴万县》等新闻报道。二、上海中山书店印行的《汪精卫先生的文集》第81至第84页,题为《夹攻中之奋斗》,署(民国)16年7月25日。三、上海光明书局印行的《汪精卫集》第三册,题为《夹攻中之奋斗》。我看了一下,

报纸所载的,大约是原始的出处。那时武汉国民政府还没有公开放弃反蒋的口号,所以文章一开头就是“自从蒋介石反叛以来,我们同志,正在专心致志,和反叛的蒋介石作殊死战。”等到编入文集的时候,宁汉已经合流,所以这些指名道姓谴责蒋介石的字句就全都删去了。这样就帮助我弄明白了这一句引语的出处。这样我就开始了和龚育之同志的交往。

1987年10月,他参加全国政协的参观团到了长沙,我到宾馆去看他。也不记得谈了些什么。他送了一本《毛泽东的读书生活》给我。这本署名“八七年十月于长沙”的赠书,现在还在我的书架上。

1997年我出版了随笔集《思想的风景》,龚育之同志在收到赠书给我的回信(3月23日)中表示看重书中《唐纵日记中所见的一次没有实行的改革》那篇,他说,“唐纵日记,听你和金冲及谈到过,你的文章引起我一定要找到一本看看。也许该让更多的人看看这本日记和你的文章。”书中还有一篇《搔痒》,表示不能赞成把那些造成了严重后果的“反右派斗争”“大跃进”等等都“说成是为了探索不同于苏联的道路”。他却表示了异议,信中说:“还有一点不完全相同的意见,即‘探索论’。你知道,我也是持‘探索论’的。你的论点也给我教益,注意在讲‘探索’的时候,不要使它成为替历史错误作曲意回护。搔痒的比喻也很机智。但是,从如何建设社会主义这一崭新任务来说,的确有‘探索’的问题,有一些大的失误(不是每一项)也的确有探索这个大背景。是不是呢?我看你在谈郑超麟诗词的那篇文章(按:指书中所收《只凭余事作诗人》一文)中引用苏联史家的论点,也谈到‘郑重探索中犯下的



龚育之夫妇

错误’的。”我倒觉得，我和他的意见并没有根本的分歧。使我反感的是以“探索论”为名而“替历史错误作曲意回护”而已。

1993年这一年，我没有干别的事，从年头到年尾，写出了《反右派斗争始末》的初稿。从1994年开始，我就一面不断的修订增补，一面给它找个出版的地方。先后找个好几家出版社商谈，结果都不得要领。大约是1995年末或1996年初，我的老师李锐同志向河南人民出版社推荐了，这部书稿才算有了着落。

这时，龚育之同志表示想看看这部稿子，我就给他送去了一份复印件。他看过了，还来的时候，他和夫人孙小礼同志分提着袋子，他说：这稿子很重。小礼同志应声补充说：写的是我们党史上沉重的一页。我想一千来页A4复印纸，的确是颇有一点斤两的，一人提着颇有点吃力，才两人合力提着吧。

龚育之同志说：“作为一个读者，我喜欢看这样的书。只是你为什么送审呢？出了不就出了吗？比方说《顾准文集》，如果要送审，就不容易通过的，它不送审，出了，比香港版的还多收了一篇。”我说：“又不是我要送审，是出版社要送审呀！”交谈中，他问我：“你自己觉得能够出

版吗？”我应声答道：“如果我觉得不能出版，我就不会进行了。”现在想来，他这问题提得够水平的，而我的回答也可说是旗鼓相当了。

河南人民出版社即按照程序申报选题，送审书稿。新闻出版署图书管理司将书稿送交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党史研究室科研管理部最后提出了这样的审查意见：

新闻出版署图书管理司：

河南人民出版社送来的朱正著《1957年的夏季：反右派斗争本末》书稿，已由我室室务委员石仲泉研究员，第二研究部主任杨先材教授，科研部主任王朝美教授再次进行审读。现将三同志的审读意见综述如下：

总体上看，该书资料丰富，述之有据，历史线索清楚，对深入研究反右派斗争问题有一定的学术价值，文字亦具有可读性。作者的写作态度也是严肃认真的。

鉴于反右派斗争是一个比较复杂的、政治敏感性强的历史课题，在国内出版这类书籍要特别注意对历史采取实事求是的分析态度，重在总结历史经验和教训。书稿中有以下问题应予以注意：

一、全书所反映的作者对反右派斗争的反思和认识的基调，是可以理解的。但是，对于1981年“历史决议”中关于反右派斗争的必要性的精神，尚需有必要的、实事求是的反映。

二、书中大量引用了未经正式发表的毛泽东著作和言论以及党的内部文献（如毛泽东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讲话、在中央宣传工作会议上的讲话、到外地视察时的一些讲话等等），对此宜慎重处理。过去中央有过要求，仍须执行。建议作者最好不要采用直接地、大段大段地摘引的方法，尽管这些内容在海外已广泛流传，但在国内至今未公布这些文献档案。

其中有些分析和评论也需要再斟酌。例如：

P179—180、187，对于毛泽东的讲话在公开发表时作了修改的原因的分析似欠妥。

P184—186，在论述六条政治标准时，联系1979年提出的四项基本原则，说“需要研究一下的倒是坚持社会主义道路这一条。因为对社会主义道路的理解并不总是很确定的。……在一

段较短的时间里来看,社会主义道路这一条的含义似乎还是相当确定的,而如果放在一段较长的时间里看,它却是颇为不确定的了。为了不触犯这一条,稳妥的办法是把社会主义道路理解为现行政策的同义语。”此处的立论和分析似欠妥。对于“有利于社会主义的国际团结”这一条标准,书中说“是写给赫鲁晓夫看的”,是“在明知破裂不可避免的时候,又要将日后破裂的责任归之于对方”,是“作出一个维持团结的姿态”,此说亦似欠妥。

三、书中写了一些对毛泽东的心理分析,应当注意分寸。例如,P.94——96.认为罗隆基讲的小知识分子和大知识分子的问题,使“中师毕业的毛受到刺激”,“触及毛的自卑感和自尊心”,这种说法似欠妥。还有一些用语也要斟酌,如称毛泽东的“臣民”等。

四、书中直接点名的人物众多,需要注意区别对待,评述得当。对于当年错划为“右派”的人,介绍其历史情况,可以起到澄清事实以正视听的作用。但是,对于当年参加批判右派的人、特别是有社会影响的知名人士,大量引用其批判发言,并夹有带讽刺挖苦语气的许多议论(较为突出的例子,如P.118对周建人的评述),恐将产生较大的负面影响。这类问题应本着“宜粗不宜细”,“团结一致向前看”的精神妥善处理。

五、P.464——465,在分析叶笃义在人大会议上的检讨时,说:“他应该明白,软弱无力,正是长期共存的前提。强大了,有力了,共存的前提也就不存在了”。此处涉及对中共与民主党派长期共存的理解,评述欠妥。

总之,此书尚待作者参考上述意见对书稿作进一步修改,使其在总体上更能体现《历史决议》的精神之后,方可出版。

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科研部

1996年4月8日

我以为这份审稿意见反映了当时担任党史研究室副主任的龚育之同志的态度。最重要的是给它放了一条生路,没有说不准出版,只说经修改后“方可出版”,其次是用字的分寸,全文没有用一个“错误”、“失实”这一类重字,只说“欠妥”,甚至“似欠妥”。而且在四页之中,还写了三行肯定的话,像“资料丰富,述之有据,历史线索

清楚”这些话,看了很觉得舒服的。

出版社于是就要求我按照这审稿意见来修改书稿了。这修改其实很简单,把审稿者指为“欠妥”或“似欠妥”的地方一概删去就是了。

除此之外我也别无他法,假如我把这些地方改写成审稿者认为“甚妥”或“似甚妥”了,我就没必要写这本书了。只有一处地方,我不能用这种简单切除的外科手术,那就是我在书稿中曾大量直接引用毛泽东在最高国务会议上讲《如何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原始记录稿,审稿意见说:“建议作者最好不要采用直接地、大段大段地摘引的方法,尽管这些内容在海外已广为流传,但在国内至今尚未公布这些文献档案。”怎么办呢?2月27日毛讲这篇话,6月19日正式发表这篇讲话的修订稿,是两件事,是任何一本写反右史的书中都必须清楚叙述的两件事。假如我只是将这些直接引文删去,用什么办法表明这次讲话和后来发表的完全不同呢?我挖空心思,终于想出了一条妙计,就是利用当年4月份《人民日报》发表的那一系列宣传新方针的社论:《继续放手,贯彻“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10日)、《怎样对待人民内部的矛盾》(13日)、《从团结的愿望出发》(17日)、《工商业者要继续改造,积极工作》(22日)、《全党必须认真学习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的矛盾》(23日)、《从各民主党派的会议谈“长期共存、互相监督”》(26日)。我把这六篇社论和《毛选》五卷中所收二月、三月的两篇讲话的改定稿相对照,摘录出相应的段落,比较其异同,从两者相同之处,证明了“这些社论是为了向广大公众传达毛的讲话内容而写的,相当准确地介绍了讲话的内容”,在做到了这一点之后,又从两者相异之处,即在社论中引人注目的一些意见却不见于《毛选》中了,即可以推知毛修改讲话稿的倾向和目的。这样做虽说不如直接引用讲话原文那样干脆和有力,也大体上可以说出我要说的意思了。

修改之后,书很快就出了(1998年5月)。出版社将书名改为《1957年的夏季:从百家争鸣到两家争鸣》。一时还颇受读书界的重视。民营的席殊书屋评1998年的好书,文学类、非文学类各十本,我的这一本列入非文学类之中。他们为宣布这评定的结果开了一次会,那天,龚育之同志

去了,李锐同志,于光远同志也都去了,都作了简短的发言。

也就是这本书出版以后,一天我去看他,交谈中,他忽然转过身去拿来一张《文摘报》送给我,说这个材料可以补充到你的书里面去。我一看,它讲的是《徐秋影案件》平反的事。《徐秋影案件》是一部著名的反特故事片,它的“本事”却是哈尔滨市公安局用逼供诱供的手段制造出来的一起冤案。法院认为证据不足,退回检察院复查,市检察院审判监督处的杨同喜奉命复查此案,他在查阅卷宗提讯在押人员之后排除了当事人的特务嫌疑。本来这一冤案是可望避免的了,可是在不久之后的反右派斗争中,杨同喜等人却因为复查此案被划为右派分子。一切都翻了过来,此案在1959年4月公开宣判,处死了两个无辜的涉案人,还有被判处死缓和徒刑的,这是反右派斗争破坏法制的典型事件。直到1987年7月才由最高人民法院平反了此案。2004年我这本书以“反右派斗争始末”为书名在香港明报出版社出版,增写了“为了法制”一章,将这一材料补充进去了。

那时韩钢同志在中央党史研究室工作,他也为促成这本书的出版帮了不少忙。书出了,他也很高兴。一天,他邀我到党史研究室去和他的几位同事座谈反右斗争。在座的都是研究党史的专家,在交谈中使我获益不少。记得王素莉同志说,我书中说的划右的人数552877人肯定少了。她说了河南省的情况,为了给开除了公职的右派分子恢复工作,河南一省就需要多少多少干部指标。这样推算起来,全国怎么会只有五十多万呢。还有一些人也提了些很好的意见,对我进一步思考这个题目很有启发。可是不久之后我就在一份什么报刊(刊名已忘)上看到,有人说朱正应邀到党史研究室去讲反右派斗争。这就未免太离谱了。我想,如果要求更正,似乎又是一次张扬,真不知怎么办。于是我就写信给龚育之同志,说明此事的原委。他给我回了封短信(1999年2月9日):“收到来信。此事没有什么,别人记事不准确,所在多有。既非原则问题,又非重大问题,没有更正的必要。便中我当同党史室有关同志说明一声。”

1997年首都师范大学数学系张怡慈教授将

他祖父张东荪诗稿复印了一份给我。我读了,写了一篇《亦儒亦侠是吾师——张东荪诗里的梁任公》,由这些诗谈到当年梁启超的《复张东荪书论社会主义运动》,又由此谈到《新青年》杂志上“关于社会主义的讨论”,梁、张二人都认为当时中国生产力发展水平低下,还不具备实行社会主义的条件。拿现在的话说,就是“生产力标准问题”。在当年那一场讨论里,至少在这一个问题上不能说他们错了。在文章里,我从《邓选》第三卷里引证了几段也是谈“生产力标准”问题的语录,并说在《毛选》里我还没有找到适当的引文。我将这篇稿子寄给龚育之同志请教。他在回信中(1997年5月22日)说,毛在《论联合政府》中有两处地方表示了要发展生产力的意思。他说:“七大上毛还有许多内部讲话,讲得更透彻。我在《求是》去年九月号上发表《读〈毛泽东在七大的报告和讲话集〉》,即阐发此理,已遭《真理的追求》批判,我没有睬它。”这篇文章收在《龚育之文存》下卷第1241页。一个对自己论点有自信心的作者,本来是不必理睬那种牛二买刀(用《水浒传》的典故)式的“批判”的。

有一回,我到北京有什么事,他到国谊宾馆来看我,谈到我不久前读过的《毛泽东读文史古籍批语集》,谈到书中注释有些没有做到位的地方(这些我后来写了文章发表)。说完这些之后,我说:“这些都是技术性的意见。内容方面,我也有一条意见。”于是我就说了:在《读〈聊斋志异〉批语》中,毛在《细侯》一篇上批了“资本主义萌芽”六个字。其实,小说中没有提到商业,没有提到交换,甚至喝的酒也不是酒肆沽来的,而是自种黍子自己酿造。小说中没有反映出城乡间社会分工的扩大,没有反映出商品经济的发展,从而破坏自然经济,没有反映出雇佣劳动者的出现,总之,马克思主义提出的标志资本主义萌芽的诸要素,在这篇小说中都没有出现。话我就只说到这里,我心里想,毛对马克思主义,也颇有不甚了了之处。那天交谈,没有把这个意思明白说出来。后来我写的《谈谈〈细侯〉》这篇,就指出:“这个批语只是表明:毛对资本主义,对资本主义萌芽,有着与众不同的独特的理解。他的一些在经济政策方面的反资本主义的措施,恐怕也只能从他的这种独特理解中求得解释吧。”

我把刊登这篇文章的刊物寄给龚育之同志看,他回信(1998年4月5日)说:“上次你来已谈过此事。我赞成你的意见。《读文史古籍批语集》附原文的时候,只引了女方的设计,而没有引男方关于自己家产状况的叙述‘薄田半顷’。而这四十亩的种植计划,是从‘半顷’而来的。此外,我想,这秀才大约是不会种地的,就算是自己也下一下地,一个人也种不了四十亩加十亩之多。按细侯的设计,按那时的习惯,大概是要雇工的。所以,这设计中,应该暗含了‘雇佣劳动者’,当然不是资本主义性质的‘雇佣劳动者’,而是封建土地制度下的雇农,长工或短工。”这是在表示了“我赞成你的意见”之后提出的讨论,是为了使我的考虑更深入更周密吧。

2002年,龚育之同志将他的长文《献疑和献曝》发给我看,其中谈到《胡乔木书信集》编注方面存在的一些问题。我看了,很佩服他读书的仔细。例如胡致杨尚昆一信,编者定此信为1949年所写,认为信中所写的六中全会为1938年举行的六届六中全会。龚育之同志考订出,这信其实是1955年所写,信中说的是七届六中全会。这样的考订功夫,我以为可作为读书方法的示例。这本书信集我也看过的,也觉得它编注工作留下了一些问题,就把我所见到的写了封信告诉他。这原不过是一封私人间的通信,却得到他的重视,推荐到《百年潮》发表了。后来在他的《党史札记二集》里,将我的这封信以及他写给《百年潮》编者的推荐信都作为附录收入书中了。

2003年底,人民文学出版社决定出版章诒和那本写大右派分子群像的《往事并不如烟》。责任编辑王培元同志和我说,想在封四印上几个著名评论家的评语,已经约请了严家炎和孙郁两位,还想找龚育之,但是不知道怎样去联系。我说,这我可以帮忙。我就给他打电话,将出版社想请他写评语的意思告诉他。他答应了。他的评语是这样写的:“作者写了大时代中一小群大知识分子的命运,是以晚辈的眼光来写父母的友人,其中有大名鼎鼎的人物,也有不那么有名以至全不为人知的人物。作者提供的不是他们的标准像,而是他们的侧影、背影,作者同她所写人物的合影、群影。你可以不必同意作者的

每一个观点,但你不能不被作者独特的视角、细致的笔触、巧妙的剪裁和历史的沉思所吸引。”这评语真是写得巧妙极了,既表示了“不必同意作者的每一个观点”,你尽可仍然坚持《历史决议》对反右派斗争的评价,可是又表示了对作者“历史的沉思”的肯定。只是出版社希望这些评语起一点保护作用的愿望还是落空了,不久即得到命令:售完之后不得再印(这也就为盗版的书商开辟了财源)。而各个媒体也奉令不得宣传此书。我虽然没有看到相关的文件,但是我亲身经历的一件事可以证明确有其事:一家报纸的副刊约我赶写了一篇书评,原说是星期五见报的,不料星期四晚上突然接到约稿编辑的电话:刚才接到上级的通知,任何关于此书的文章一概不许发表,说好说坏的都不行。

龚育之同志在病中还给我帮过一次忙。我有一部《中国二十世纪通鉴》,五大本。在使用中,我发现第四册少装了一个印张。像这样装订错误的残缺的书,按理说出版社或印刷厂是应该收回的。书是线装书局出的,我想去找他们调换一本不缺页的。可是打电话一直联系不上。弄了许久,毫无办法,后来我看书上印的名单,编委会主任就是龚育之,于是我就请他帮忙了。这时大概是2006年,他已经住院了。他大约是转托了编委会副主任魏久明同志,让出版社将一本不缺页的书送到我家里。这一部书现在我还常常用到,这也可以说是他留给我的一件纪念品。

龚育之同志比我才大一岁多,真没有想到他这么早就去世了。那天到八宝山给他送别,我猛然感到我失去了一位能够坦率地交换意见和心得的朋友,是我的一个大损失。

2009年5月20日  
(责任编辑 徐庆全)

## 启事

《炎黄春秋》1999年至2006年尚有少量刊物(不全)零售,有需要的读者可电话咨询或前往购买。

地点:北京市朝阳区城铁四惠东站B口往东20米报亭。

联系人:朱亮,电话:13552967836

# 国际反修斗争和“灰皮书”

• 张惠卿

上世纪60年代初开始,中共中央发动了一场针对苏共的世界范围的反对现代修正主义的斗争,声势浩大,全球瞩目。为了配合这场国际反修斗争,特别是中苏大论战的需要,根据中宣部的指示,在中央编译局等有关单位的共同合作和配合下,由人民出版社、商务印书馆、世界知识出版社和上海人民出版社四家出版单位组织翻译出版了一批所谓新老修正主义者和机会主义者的著作,作为“反面材料”,封面一律用灰色纸,不作任何装饰,大家习惯上就称为“灰皮书”。

“灰皮书”均为内部发行,封面和扉页上都印有“供内部参考”或“供批判之用”的字样,分甲、乙、丙三类,甲类最严,表示“反动性”最大,如伯恩斯坦、考茨基、托洛茨基等人的著作,购买和阅读对象都严格控制。

根据同样的目的,人民文学出版社则出版了一批供研究批判用的反映所谓修正主义文艺思潮的外国文学作品,如苏联在二战后出版的一些描写战争的残酷、恐怖、悲惨的反战小说和剧本,一些宣扬人性论、资产阶级人道主义的小说、诗歌、散文和评论等。这些书都是采用黄色纸作封面,故又称为“黄皮书”,它和“灰皮书”的性质相同,前者是文艺作品,后者是政治理论书籍。有关文艺领域,我这里就不涉及了。

“灰皮书”从1961年开始出版,1963和1964年是高峰期,出版数量最多,因为中苏大论战就是在此时展开的。到1966年上半年“文化大革命”开始被迫中断,1972年起又继续出版,到1980年结束,先后共出版了二百多种。

“灰皮书”出版的目,固然是为了配合国际反修斗争,但另一方面也无意中冲破了我国长期来文化禁锢政策的桎梏,为我国广大学者打开了一个了解外部世界不同信息的窗口,积累了许多

有用的思想资料,因而受到了学术理论界的普遍重视和欢迎,对于推动理论研究、促进学术文化所产生的积极作用和深远影响是大家始料不及的。这项工作发生在一个动荡的年代,它和当时国际国内的形势紧密相连,在我国现代出版史上具有特殊意义。

## “灰皮书”出版的背景

中苏两党之间的分歧,是从1956年苏共二十大以后开始的,核心问题是对斯大林的评价,并涉及到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一些重大问题的根本看法。我们根据列宁、斯大林的一贯学说和主张,从推进世界革命,消灭帝国主义、资本主义制度的革命立场出发,认定苏共背叛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本原则,走上了修正主义的道路。到了1958和1959年,矛盾和分歧已经越来越尖锐。1960年初毛泽东主席决定公开批判现代修正主义,这场国际反修斗争就此展开了。

在1960年4月列宁诞辰90周年之际,《红旗》杂志和《人民日报》分别发表了《列宁主义万岁》、《沿着伟大列宁的道路前进》和《在列宁的革命旗帜下团结起来》三篇批修文章,就有关时代特征、帝国主义性质以及和平共处、和平演变等一系列问题,用指名批判南斯拉夫铁托的方式,系统地批判了苏共赫鲁晓夫的“修正主义”。苏共很快也在报刊上发表文章反击,两党关系全面恶化。

同年6月,在布加勒斯特罗马尼亚工人党三大期间,苏共不经中共同意,就在那里召开世界各国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会议,在会上散发材料攻击中国共产党,我们进行了反驳。会后苏联领导把两党关系扩大为两国关系,片面撤走了在中

国的全部苏联专家，给中国经济造成了巨大损失。中共中央成立了以康生为组长的反修领导小组，并由中宣部调集理论界的许多精英人才组成写作班子，酝酿和苏共展开大论战。

“灰皮书”就是在这样的形势下应运而生了。因为要和别人论战，不清楚对方的立论和观点，也就无法深入分析。而要弄清以赫鲁晓夫为代表的现代修正主义（新修正主义），又必须知道他们的老祖宗以伯恩斯坦、考茨基为代表的第二国际修正主义（老修正主义）。可是我们过去对他们的著作讳莫如深，只知道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怎样批判他们，却完全不知道这些“反面人物”的具体观点和思想。现在要和苏共展开论战，要反对和批判修正主义，就必须了解新老修正主义者的主要著作和基本思想。

例如苏联报刊攻击我们搞托洛茨基主义，使中央领导同志十分恼火，邓小平同志说：“赫鲁晓夫诬蔑我们是托洛茨基主义，非写文章反驳不可。”可是我们过去紧跟斯大林反托、肃托几十年，却从未系统了解和研究过托洛茨基的思想和言论。因此毛主席特别指示，要尽快把托洛茨基的主要著作翻译出来参考。

## 想方设法寻找书源

出版“灰皮书”的工作由中宣部统一领导和部署。陆定一部长指定中宣部出版处处长包之静和副处长许力以同志具体负责，并在中宣部内专门设立了一个外国政治学术书籍编译办公室总司其职，任命人民出版社副总编辑范用同志为该室主任，冯修蕙同志为副主任。人民出版社也成立了国际政治编辑组，负责组织出版事宜，由我任组长。

承担这套“灰皮书”的规划和主要翻译任务的是中央编译局，当时中宣部副部长许立群同志兼任该局局长，王惠德同志任副局长，他们两人一直直接领导这项工作。

为了拟订这些“反面人物”的书目，中央编译局国际室的同志根据该局的现有资料，并查遍全国各大图书馆的中外目录，编印出一份《修正主义者、机会主义者著作目录》，收入了近四十名所谓修正主义者和机会主义者的著作，包括蒲鲁

东、拉萨尔、巴枯宁、伯恩斯坦、考茨基、福尔马尔、阿德勒、鲍威尔、希法亭、饶勒斯、米勒兰、王德威尔得、普列汉诺夫、托洛茨基、布哈林、季诺维也夫等人，都是20世纪30年代以前的人物，后来又增列了一大批苏联和南斯拉夫的书目，即所谓现代修正主义者的著作。

书目列出以后，找到原著至关重要，但这项工作进行起来相当困难，因为这些都是几十年前的著作，不要说国内，国外也很难找到。中央编译局和相关部门想尽了一切办法，除在国内各大图书馆，包括清华、北大、中国科学院等图书馆搜罗以外，还派人到国外去搜寻购买。

当时托洛茨基的著作最难获得，因为苏联从20世纪30年代起就把他的全部著作清除干净了，根本无法找到他的原著。中央编译局的同志只好从苏联几十年来出版的《真理报》、《布尔什维克》杂志和有关报刊上一页一页地翻找，终于找到了托洛茨基的一些重要报告和文章，但毕竟不是他的系统著作。

有人想到我国的托派组织过去翻译和出版过许多托洛茨基的著作。1952年12月，全国各地公安部门曾有一次统一的“肃托”行动，把在国内的“托派分子”一网打尽，全部逮捕收审，上海人数最多，也最集中，他们保留在家中的托洛茨基著作都被收缴，这些书当时如没有销毁，应当还在什么地方放着，这是一个重要来源。

1963年初我奉中宣部之命专程去了上海，向上海市公安局的有关同志说明了来意后，他们极为重视。但是事隔十年，这批书是否还在，放在何处，谁也记不清。后来总算找来了经手此事的同志，几经周折，终于在他们一间仓库的角落里找到了这批书，已积满了灰尘。我花了整整半天时间，一本一本地拣了出来，大多是解放前出版的托著的中译本，我记得有《十月的教训》、《俄国革命史》、《不断革命论》、《文学与革命》、《中国革命问题》、《被出卖的革命》等二十多种，还有几种法译本和英译本。我如获至宝。经市公安局同意，我把这些书全部拿回北京，总算不辱使命。后来我知道公安部所属的群众出版社也藏有若干托洛茨基的中译本。

还有一个意外的收获是，原中共“一大”代表刘仁静，他曾在1929年从苏联回国途中秘密到

土耳其去拜访过被斯大林驱逐出苏联的托洛茨基。刘当时被安排在人民出版社任特约翻译,当他得知我们正在准备出版托洛茨基著作而苦于找不到原著时,就主动将他保存了三十多年、托洛茨基本人赠给他的七卷《托洛茨基文集》原版奉献出来,虽然不全(托的这部文集共有十多卷),但十分珍贵,这些书后来都被用上了。

“灰皮书”的编译工作除中央编译局的同志参加外,我们几家出版社还组织了一批懂外文又熟悉理论的专家参加。因为许多著作内容深奥,又有好多不同的文种,所以很难翻译。当时南斯拉夫被当作一个重要靶子,为了直接从塞尔维亚文翻译他们的著作,还专门在中国人民大学开设了一个教授塞文的学习班,为一批懂俄文的译者(因俄文和塞文都是斯拉夫语系,很接近)培训学习。这些同志后来都成了难得的塞文人才。

第一本“灰皮书”是1961年人民出版社用三联书店名义出版的《伯恩斯坦、考茨基著作选录》。后来又陆续出版了十多种伯恩斯坦、考茨基的主要著作,其中有伯恩斯坦的《社会主义的前提和社会民主党的任务》、《社会主义的历史和理论》、《今天社会民主党的理论和实践》、《什么是社会主义》、《斐迪南·拉萨尔及其对工人阶级的意义》等,考茨基的《无产阶级专政》(因此书反对无产阶级专政而被列宁斥之为“叛徒考茨基”)、《恐怖主义和共产主义》、《帝国主义》、《国防问题和社会民主党》、《国际主义和战争》、《陷于绝境中的布尔什维主义》、《社会民主主义对抗共产主义》等。上海人民出版社组织翻译了考茨基两大卷的《唯物主义历史观》,分成六个分册(十二本),作为老修正主义哲学选辑出版。这些书今天看来,都有重要的理论参考价值。当年被列宁批倒批臭的所谓第二国际修正主义者,究竟是正确还是错误,几十年的历史风云和实践本身已经说明,真理不在列宁这一边。

另一个重点人物是托洛茨基,除中央编译局编译的《托洛茨基反动言论摘录》(上下两册)外,还出版了托洛茨基的《斯大林评传》、《不断革命论》、《俄国局势真相》、《被背叛了的革命(苏联的现状及其前途)》、《列宁以后的第三国际》、《苏联的发展问题》、《文学与革命》等单行本。托洛茨基有关中国革命的重要论述很多,“灰皮书”中则只

字未收。商务印书馆编译出版了一套《托派第四国际资料》,共五大册,全面提供了各国第四国际托派的情况资料。

被列宁当年誉为“俄国马克思主义之父”的普列汉诺夫也列入了机会主义人物之中,除编译出版了《普列汉诺夫机会主义文选》(上下两册)外,还出版了他的《论战争》、《在祖国的一年》等书作为反面教材。人民出版社多年来出版过大量普列汉诺夫的著作,后来均收入五卷本的《普列汉诺夫哲学著作选集》中,都是作为重要的马克思主义著作看待的。在后期他和列宁产生了意见分歧,受到列宁的批判,于是就被看成第二个考茨基了。

此外,还出版了一批各国的所谓修正主义著作,其中有:奥地利鲍威尔的《到社会主义之路》,意大利陶里亚蒂的《马克思早期思想研究》,比利时王德威尔得的《社会主义反对国家》,南斯拉夫弗兰尼茨基的《马克思主义史》和德热拉斯的《新阶级》、《同斯大林的谈话》,波兰沙夫的《人的哲学》、《马克思列宁主义真理的若干问题》,美国白劳德的《德黑兰》,法国列斐弗尔的《马克思主义的当前问题》,米勒兰的《法国的改良社会主义》,加罗蒂的《人的远景》、《马克思主义的人道主义》,日本贵岛正道等的《日本“结构改革”论》等等。

苏联一批知名学者的著作,如列昂节夫的《政治经济学初级教程》,尼基金的《政治经济学通俗教科书》,阿特拉斯基主编的《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德波林的《哲学和政治》,布尔拉茨基的《国家和共产主义》,奥伊则尔曼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形成》,瓦尔加的《现代资本主义的经济危机》和《二十世纪的资本主义》等等,都被列入“灰皮书”出版。

## 为“九评”的写作提供资料

1961年10月苏共召开二十二大。我们把二十二大概括为“三和(和平共处、和平竞赛、和平过渡)、两全(全民国家、全民党)”,认定赫鲁晓夫修正主义路线已经系统化和理论化。二十二大指责了阿尔巴尼亚党,我们则坚决维护和支持这个反对“苏修”的欧洲盟友,并认为欧洲各国的共产

党都已经变修,成了“修党”,漆黑一片,只剩下阿党这一盏“明灯”。

当时我国正处在三年困难时期,国民经济状况极端艰难。1962年初中联部部长王稼祥同志向中央提出了要在国际上缓和紧张局势,反对四面树敌,认为我们的对外方针首先应该是要为我国的社会主义建设争取一个和平的国际环境。这一正确意见在不久以后召开的党的八届十中全会上被看作是提倡“三和一少”的修正主义言论,最后又上纲到“三降一灭”,受到了毛泽东主席的严厉批评。并与此针锋相对,作出了坚决实行“三斗一多”的方针,即对帝国主义要斗,对修正主义要斗,对各国反动派要斗,要多援助革命的马列主义政党和派别。

1962年11月,欧洲几个国家的共产党分别召开了代表大会,在会上点名批评阿尔巴尼亚党的同时,也指责了中国共产党。我们立即予以反击。《人民日报》和《红旗》杂志连续发表了七篇文章,其中有两篇是指名批判意共总书记陶里亚蒂的,特别是第二篇《红旗》杂志分两期刊完的《再论陶里亚蒂和我们的分歧》,文章长达10万字,副题是“关于列宁主义在当代的若干问题”,把陶里亚蒂在二战后新的国际形势下提出的一些新思想和新概念,都作为违反列宁主义革命原则的修正主义观点加以批判,同时也再一次不指名地狠批了赫鲁晓夫。另外又专文分别点名批评了法共总书记多列士和美国共产党等。

1963年6月,中共中央发表了以实现世界革命为目标的《关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总路线的建议》。这篇反修斗争的纲领性文件,拉开了中苏大论战的序幕。接着7月中苏两党举行会谈,不欢而散。会后苏共中央发表了致中共中央的公开信。我们从9月开始直到1964年7月将近一年时间,用人民日报编辑部、红旗杂志编辑部共同署名,陆续发表了九篇评论苏共中央公开信的大论战文章,那就是著名的“九评”:一评《苏共领导同我们分歧的由来和发展》,二评《关于斯大林问题》,三评《南斯拉夫是社会主义国家吗?》,四评《新殖民主义的辩护士》,五评《在战争与和平问题上的两条路线》,六评《两种根本对立的和平共处政策》,七评《苏共领导是当代最大的分裂主义者》,八评《无产阶级革命和赫鲁晓夫修正主义》,

九评《关于赫鲁晓夫的假共产主义及其在世界历史上的教训》。

“九评”高屋建瓴,革命气势磅礴,当时在全国被看作是最高水平马列主义的典范佳作,大家都怀着自豪和激动的心情,认真学习和研读。今天重读,却令人吃惊地发现,文中许多问题都需要重新审视,当年认为天经地义、神圣不可侵犯的论据未必就是真理。

“九评”的所有文章中我们都把自己称作是马克思列宁主义者,或者以全世界一切马克思列宁主义者的名义,居高临下,始终站在正确一方,高举列宁主义的大旗,应用列宁的暴力革命、帝国主义论、阶级斗争、无产阶级专政等一整套学说,把苏共和我们的分歧,不符合列宁、斯大林一贯思想的观点,一律斥之为离经叛道、背叛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修正主义加以抨击和批判。

这场中苏大论战我们不仅是针对苏共,也针对凡和我们持不同观点的世界各国共产党,把他们全部看成是修正主义党。苏共也在不到一年的时间内发表了近一千篇文章,长篇累牍地阐明他们的观点,反驳我们的指责。中苏两党从此断绝了往来,随后我们又同全世界八十多个共产党中的七十多个党断绝了关系。

为了配合中央四面出击的国际反修斗争,“灰皮书”在1963年和1964年出版最多,超过了一百种。除了上面提到的一些带有学术理论性的“反面”著作外,很多都是有针对性的,以及时提供给反修写作班子撰写“九评”时的参考之用。如《苏联“全民党”问题文摘》、《苏联“全民国家”问题文摘》、《苏联发达社会主义的言论摘录》、《赫鲁晓夫等关于战争与和平问题的谬论》、《苏共领导和铁托集团等对资本主义世界的荒谬看法》、《现代修正主义关于国际形势和对外政策的言论》、《关于无产阶级革命和“和平过渡”问题的现代修正主义言论》、《第二国际修正主义者和托洛茨基关于无产阶级政党的反动言论》、《关于人道主义的现代修正主义言论》、《反对无产阶级专政、宣扬“全民国家”的现代修正主义言论》等等。其中不少是以《红旗》丛刊的名义由人民出版社出版的。世界知识出版社还先后编译出版了五大卷《苏联报刊反华言论》。

这里特别需要提一下的是,在这场国际反修

斗争中,我们把南斯拉夫和南共联盟看作是除苏共以外的最大敌人,甚至认为赫鲁晓夫是在向铁托学习,苏共的有些修正主义货色正是从他们那里贩卖来的。

请看我们“三评”一开头的话:“南斯拉夫是社会主义国家吗?……对于这个问题,苏共领导同我们,同全世界一切马克思列宁主义者,存在着根本分歧。”

接着说:“全世界马克思列宁主义者认为,南斯拉夫不是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南斯拉夫共产主义者联盟的领导集团,背叛了马克思列宁主义,背叛了南斯拉夫人民,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叛徒,是帝国主义的走狗。苏共领导却认为,南斯拉夫是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南斯拉夫共产主义者联盟是站在马克思列宁主义基础上,是兄弟党的一员,是反对帝国主义的力量。”

下面是这篇“三评”的小标题:南斯拉夫城市私人资本主义的发展,资本主义在南斯拉夫农村的泛滥,社会主义全民所有制经济蜕化为资本主义经济,美帝国主义的附庸,美帝国主义的反革命别动队;从无产阶级专政蜕变为资产阶级专政,中共对南斯拉夫问题的原则立场,是铁托“勾销了错误”,还是赫鲁晓夫以铁托为师呢?简短的结语。“三评”最后的结论是:南斯拉夫提供了一个资本主义复辟的典型。

南斯拉夫多年来实行的一系列社会改革措施,得到广大南斯拉夫人民的支持和拥护。诸如工人自治,搞市场经济,自由竞争,发展私人企业,引进外资,加工进口零部件,出口原料,农村实行自由贸易,容许发展个体经济等等,而这些都是我们看作是他们城乡资本主义泛滥复辟的典型事例,大肆挞伐,认定他们已从社会主义国家蜕变成了资本主义国家。

这两年针对南斯拉夫的所谓反面教材——“灰皮书”出版了二十多种,部分书目如下:《南斯拉夫铁托集团关于战争与和平问题的反动言论》、《南斯拉夫铁托集团关于民族解放运动的反动言论》、《铁托集团有关帝国主义问题的言论》、《铁托集团关于无产阶级专政和过渡时期阶级斗争的反动言论》、《铁托集团关于无产阶级革命的修正主义观点》、《南斯拉夫铁托集团、第二国际修正主义者和社会党人有关人道主义的言论》、

《铁托言论选》、《南斯拉夫社会主义联邦共和国宪法》、《南斯拉夫国家结构和社会结构》、《南斯拉夫的社会自治》、《工人委员会的十年》、《南斯拉夫的经济政策》、《南斯拉夫的集体经济》、《南共联盟纲领和思想斗争“尖锐化”》等等,涉及南斯拉夫国际国内方方面面的问题。今天完全可以说,我们是把是非黑白全部颠倒了。

1964年10月赫鲁晓夫突然被苏共中央解职退出了领导岗位,引起了种种议论和猜测。我们当然是喜出望外,认为是中苏大论战把赫鲁晓夫打垮了。继“九评”之后,立即撰写了《赫鲁晓夫是怎样下台的》一文,用《红旗》社论的形式发表。文章一开始就断言:“赫鲁晓夫下台了……这是一件大好事。赫鲁晓夫的垮台是全世界马克思列宁主义者坚持反对修正主义斗争的伟大胜利,表明了现代修正主义的大破产、大失败。”文章按照我们自己的逻辑分析了赫鲁晓夫垮台的原因,列出了十二条,第一条也是最根本的一条就是“反对斯大林”。文章说:“他借口所谓‘反对个人迷信’,用最恶毒的语句大肆辱骂苏联共产党和苏联人民的领袖斯大林。他反对斯大林就是反对马克思列宁主义。”因而注定非失败不可。“反对斯大林就是反对马克思列宁主义”,这在“九评”中曾多次提到,这正是我们这次国际反修斗争的症结所在。苏共把斯大林这把刀子丢了,我们则要紧紧握住它。

但是令毛泽东主席和党中央十分失望的是,尽管赫鲁晓夫下台了,苏联的基本国策却并没有任何改变,苏共也没有把苏联人民深恶痛绝的斯大林这把刀子捡回来。赫鲁晓夫的继承者勃列日涅夫推行的仍然是“没有赫鲁晓夫的赫鲁晓夫主义”。因此我们的国际反修斗争任务没有完成,不过大论战结束了,热潮已经过去,“灰皮书”的出版也减缓了步伐,数量大大减少,主要目的也只是为了提供研究参考资料。

从整个“灰皮书”的出版状况可以看出,这几年大张旗鼓的反修斗争,问题究竟在哪里。尘埃落定,我们终于看清,这种加紧国际国内阶级斗争的决策和行动的严重后果,就是引来了“文化大革命”的十年浩劫。斗完了苏联的赫鲁晓夫,就来揪斗中国的赫鲁晓夫,国际反修斗争变成了国内反修斗争。(责任编辑 萧 徐)

# 文革中影响全国的『青岛事件』

· 丁龙嘉

## 毛泽东关注的“青岛事件”

“文革”初期,青岛市出现了中共党组织按照刘少奇的规则和传统做法领导运动和部分青年学生按照毛泽东的指引开展运动的现象,以及二者之间控制与反控制、压制与反压制的斗争。其间,发生了三次激烈的交锋,而在第二次交锋中出现的“青岛事件”,引起了毛泽东的关注,影响到山东全省和全国。

1966年6月中旬,中共青岛市委成立了以第一书记张敬焘为组长的“文革”领导小组,确定了开展运动的步骤,又召开了6万人的动员大会,号召将“文革”进行到底。

然而,全市的运动并非都按照市委的部署进行。6月1日毛泽东指示向全国、全世界广播北京大学聂元梓等人把矛头指向学校党委的大字报,第二天《人民日报》全文刊载了这张大字报,同时发表了由中央文革小组成员王力、关锋起草的署名评论员的文章《欢呼北大的一张大字报》,6月1日由中央文革小组组长陈伯达率领的工作组掌控的《人民日报》发表了《横扫一切牛鬼蛇神》的社论,此时,青岛市的医学院、海洋学院、化工学院三大院校及部分中等学校的学生,迅速掀起了揪批本单位的“重点人物”、“反动学术权威”、“牛鬼蛇神”的高潮。其中,有的批判了党组织及其领导干部,有的自发成立了组织。这时,发生了青岛木器一厂部分职工拿出武装部的枪支保卫大字报的事件。

青岛市委为了控制局势,效仿中央向北京大学等单位派工作组的做法,从6月19日开始向青岛医学院等大专院校、青岛市第二中学等中等学校、《青岛日报》社等文化单位以及青岛木器一厂等单位派出了92个工作组或观察组,并要求工作组按照刘少奇制定的《中央八条》和刘少奇以中央名义转发的《北京大学文化革命简报(第九号)》开展工作。工作组进驻各单位后,取缔了学生、群众中自发成立的各种组织,批斗了带头起来造反、批判党组织和领导干部的人,当时称为“反击”。

这期间的6月25日,发生了一件谁也没有预料到的、诱发了后来震惊全国的“青岛事件”的事情。当天,正在青岛市立医院实习的青岛医学院部分学生,给院党委和第七病房贴出大字报。部分医院职工认为大字报与事实不符,就与学生展开了辩论。经过当时主持医院工作的党委副书记张秀文做双方面的工作,使辩论暂时平息下来,但并未解决矛盾。

7月28日,中共北京市委根据毛泽东的工作组“起坏作用,阻碍运动”,“不要工作组,要由革命师生自己闹革命”的指示,决定撤销各学校工作组。8月4日,青岛市委决定撤销派出的所有工作组。这一时间青岛市委与起来造反的学生、群众的斗争,被称为第一次交锋。

8月1日至12日,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召开。会议通过的关于“文革”的《十六条》,规定运动的重点是整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正式确立了“文革”的“左”倾指导方针。全会之后,青岛市的党政当局和起来造反的学生,都以极快的速度和空前的规模开展运动。8月20日,青岛市委举行了有10万人参加的庆祝八届十一中全会召开的大会,会后进行了声势浩大的游行。8月23日,各学校刚刚成立的红卫兵,在《人民日报》的报道和《好得很》的社论的鼓动下,仿效北京的红卫兵,杀向社会,疯狂地破所谓的“旧思想,旧文化,旧

风俗,旧习惯”,从城里赶走所谓的“牛鬼蛇神”。

8月中旬,青岛医学院的部分师生散发了《给全市革命同志的一封公开信》,指出“市委有很多严重的问题,要想把本单位的革命搞到底,必须首先搞清市委的问题。”还有部分学生贴出大字报,认为市委“怕”字当头,使“青岛市的文化大革命冷冷清清”。在前段时间受到学校当局和工作组批判和处理的部分学生到市委追查后台。这样,几部分学生将斗争的矛头指向了市委。由于《十六条》明确提出学生的革命的“大方向始终是正确的”,中央又明文规定“不要限制学生”,所以,市委虽然受到了威胁,却显得束手无策。

8月24日,青岛医学院的部分医生和教职工,针对他们认为是青岛市委几年中推行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和在“文革”中压制群众、包庇镇压群众运动的市立医院党委副书记张秀文等问题,贴出了几十张大字报;另有100多名学生到市立医院贴出大字报,要求澄清“六二五”事情的真相。当晚,这些学生又联合海洋学院、化工学院等学校的400多名学生到市委,要求撤销张秀文的一切职务,并静坐示威,施加压力。市委常委连夜召开会议,决定撤销张秀文的一切职务。这实际是丢卒保帅。然而,抛出一个卒子就能保全自己吗?学生在得知这一消息后,立即到市立医院,在没有找到张秀文的情况下,武斗了9名医务人员。

8月25日,这些学生揪斗了张秀文,同时,散发了《坚决造青岛市委的反》的传单。消息很快传遍开来。张秀文的被撤职和被揪斗,引起了医务界和社会上部分干部和群众的不满,青岛市开始出现了以三大院校为代表的学生、红卫兵与部分干部、群众的对立。

当天上午,社会上流传着三大院校的学生要在晚上召开万人大会,砸烂市委的消息。这个消息,是实情还是谣言,来自何处,至今还是个谜。下午,市委常委召开紧急会议,商讨应对之策。据副市长王效禹后来说,张敬焘在会议中说:“我是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你们是什么?”会议认为问题出在《十六条》没有深入人心上,决定当晚在全市掀起一个学习、宣传《十六条》的高潮,并分别向全市各大系统部署立即上街开展宣传活动。这一决定,打的旗号是学习、宣传《十六条》,实际是

要粉碎传说中的学生召开万人大会和砸烂市委的行动。这必然会激化双方的矛盾。今天看来,确非明智之举。晚间,数万名干部、工人、市民与三大院校上街的学生相遇,还有部分干部、工人、市民包围青岛医学院,双方展开激烈辩论并发生局部的肢体冲突。对立情绪严重升级。

8月26日凌晨,张敬焘出面接见了学生,回答了学生提出的为什么要上街宣传《十六条》和有关市立医院的质问,同时,表示支持学生的革命行动,又要求学生按《十六条》办事。张敬焘的接见,表明他已经看到了这种混乱情况的危险性。当天,市委发出四条指示,<sup>注1</sup>要求工农支持学生的革命行动,不准斗学生;干部、工人一律不参加学生的活动;所有机关干部去说服工人、市民撤出医学院周围地区;大型的宣传《十六条》的活动一律停下来。经过干部的劝解工作,到28日,宣传《十六条》的活动基本停止了。但是为时已晚,在宣传《十六条》的活动中陷于孤立的学生,已于26日向全国各高校发出了“紧急呼吁”,诉说“遭到了武装警察和工人、群众的围攻”,有“140名师生被打伤”。“紧急呼吁”发出后,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山东大学等20多所外地大学的1000多名师生赶到青岛进行支援。事态扩大了。

8月27日,中共山东省委书记谭启龙赶到青岛,了解情况,之后向中央作了汇报。29日,青岛三大院校及外地到青岛支持的学生召开了“革命造反誓师大会”。会上,给张敬焘戴上了“镇压学生运动的反革命分子”的木牌和大纸帽子,进行罚跪批斗,同时宣读了中共山东省委责令张敬焘向三大院校师生做检查、听取批评的电报。30日,谭启龙受中共中央的委托,率领工作组到青岛解决问题。当日,部分学生再次揪斗了张敬焘。学生野蛮揪斗张敬焘,无疑刺激了部分干部、工人、市民的对立情绪。

8月31日晚,谭启龙在大专院校学生代表大会上宣布:省委已请示中央批准,撤销张敬焘的市委第一书记的职务。这时,正有部分干部、工人、市民聚集在市委门前,要求省委工作组澄清“八二五”事件真相,确保张敬焘人身安全。消息传来,立即引起了这些人不满情绪的爆炸。他们成立了服务小组,召开了大会,并向中共中央发去了要求“做出正确决定”的急电。9月1日凌晨

3时,谭启龙到市委门前传达了刚刚收到的中央指示:“青岛市发生的问题,由全市工农兵学等各界群众代表会议讨论决定”,“张敬焘同志的错误问题,由代表大会讨论决定”,“要文斗,不要武斗”<sup>注2</sup>。中央指示传达后,大会作出了恢复张敬焘职务、严惩右派学生的“六项决议”。

9月1日上午,青岛全市流传着“中央决定恢复张敬焘市委第一书记”的谣言和传单,而且《青岛日报》竟为这一假消息出了“号外”。

谣言满天飞后,各单位纷纷到市委给张敬焘送慰问信,形成了“自发庆祝游行”,游行的规模,有10万至40万人的各种说法不等。这中间,部分干部、工人、市民冲进青岛医学院,高呼“抓右派学生”等口号,形成围攻之势。更有甚者,青岛市北区的法院和检察院勒令师生在24小时内投案自首,“否则将受到最严厉的惩处”。

9月1日当晚,青岛市委召开全市各界群众和高校师生有线广播大会,谭启龙就青岛的形势和张敬焘没有恢复第一书记职务等问题讲了话,实际上是辟谣。但是,部分人不满意,拒绝离开会场,又形成了有4万多人参加的静坐大会。静坐大会连续向中共中央发出了三封十万火急的电报,要求中央撤销山东省委对张敬焘的处分决定。2日上午,中共中央办公厅复电称:“中央领导同志非常关心青岛的问题,待研究后一定给你们作答复。”此时,青岛静坐大会又作出了一个与前一个“六项决议”相类似的“六项决议”。9月4日,中央正式作出了对青岛问题的处理意见,中心内容是,中央委托谭启龙妥善解决问题;工人和学生要团结一致<sup>注3</sup>。谭启龙随即提出了分两步走解决青岛问题,首先解决工人与学生之间的纠纷,然后解决市委领导班子的问题。

青岛市9月1日前后发生的一系列事件,称



毛泽东接见王效禹(右一)

为“青岛事件”。引发9月1日“自发庆祝游行”的是一则谣言。这则谣言来自何处?《青岛日报》为什么敢为谣言印“号外”?时至今日仍是个谜。有些人把庆祝游行说成是“自发”的,显然站不住脚。参加游行的人数达10万至40万之多,占青岛市100万人口中除去老人、小孩之外的近半数或超半数,如此大的规模,没有人组织是不可信的。况且,游行队伍井然有序,向中央施加压力的目的十分明确,这不是“自发”所能做到的。至于谁是组织者,尽管此后造反派进行了追究,但始终没有得到确凿的证据。不过,有一个合乎逻辑的判断标准,那就是庆祝游行对谁有利。显然,对以张敬焘为代表的群体有利。所以,有人认为各级共产党和共青团组织起到了一定的作用,应该是有道理的。说“自发”的人,一方面是为了掩盖事实真相,另一方面是为了宣传张敬焘深得民心,撤销张敬焘的职务是错误的。

9月7日,毛泽东对“青岛事件”作出批示,批示是写在青岛市副市长,中共青岛市委崂山县“四清”工作团副书记、副团长王效禹9月4日给中央文革小组的报告上。这个报告是反对调动工农干预学生运动的。批示如下:“林彪、恩来、陶铸、伯达、康生、富春、任重、江青各同志:此件请一看。青岛、长沙、西安等地的情况是一样的,都是组织工农反学生。这样下去,是不能解决问题的。似宜由中央发一指示,不准各地这样做,然后

再写一篇社论,劝工农不要干预学生运动,北京就没有调动工农整学生,除人民大学曾调六百农民入城保郭影秋,其他都没有,以北京的经验告地方照办。谭启龙和这个副市长的意见,我看是正确的,请您们商议一下,酌定政策。”<sup>注4</sup>

笔者保留的当年社会上流传的毛泽东的批示,与上述有一处不同,即在“都是组织工农反学生”后面还有一句话“都是错误的”。

9月11日,中共中央把毛泽东的批示和王效禹的报告转发各中央局、各省市自治区党委等,并对不准调动工农干预学生运动作出四条具体规定。同一天,《人民日报》发表了题为《工农群众和革命学生在毛泽东思想旗帜下团结起来》的社论。但令人不解的是,谭启龙当时没有在青岛传达毛泽东的上述批示。是中央不允许传达?还是为了限制王效禹的影响?

谭启龙根据中共中央关于协商解决青岛问题的指示,于9月20日召开了由工人、贫下中农、解放军、大中学校师生、干部等各方面代表1174人参加的协商会议。因为各方代表分歧意见甚大,会场秩序混乱,最后不得不以投票表决的方式通过了谭启龙的讲话和给中共中央、毛泽东的电报,以为回应。在会议期间,将持有不同意见的师生驱出了会场。协商会议没有解决问题,当然也不可能解决问题。不过,“青岛事件”是暂时平息下去了。9月24日,谭启龙返回了济南。

谭启龙在近一个月中三下青岛处理青岛问题,虽然解决了大规模围攻师生的问题,但对化解矛盾收效甚微。在“青岛事件”前后,有近千名师生被打成了反革命分子,9月1日之后的半个月,许多人感到处于“白色恐怖”之中。只是由于中共中央和毛泽东的指示,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文革小组顾问康生9月7日的公开支持,造反的师生才摆脱了困境,占据了上风。“青岛事件”中,市委及部分干部、工人、市民与造反师生、群众的斗争,被称为第二次交锋。

“文革”初期发生的“青岛事件”,表面上聚焦了以学生为代表的造反派与以党政领导机关干部为核心的当权派的矛盾和斗争,实质上反映了毛泽东及中央文革小组与党政体制内抵制“文革”的力量的矛盾和斗争。

“青岛事件”,极大降低了全市党政领导机关

的公信力,严重挫伤了以党政领导机关为代表的主流力量。此后,市委、市政府难以切实履行职责,而且随着运动的发展,一步步丧失了执政能力,逐渐陷入半瘫痪境地。所以,谭启龙说:“山东的‘文革’也可以说就是从这次事件开始的。”

## 毛泽东重视的王效禹“造反”

当青岛的少数的造反师生与庞大的党政机关及其领导的群众尖锐对立时,一个领导干部从后者的营垒中杀了出来,站到了造反师生一边,得到了毛泽东的肯定。他就是王效禹。王效禹的“造反”,引起了毛泽东的重视,影响到山东全省和全国。

王效禹,1914年生,山东省益都县(今青州市)人。其母是老共产党员,曾担任过村党支部书记。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后,王效禹在母亲影响下,积极投入抗日工作,于1938年春加入中国共产党。此后,历任中共村党支部书记、区委书记,中共益都县委组织部部长,中共渤海区委干部科科长,中共临淄县委书记,八路军清河军分区副政治委员兼团政治委员,中共博兴县委书记,八路军清河军分区第十四团政治委员,中共清河地委副书记、书记兼清河军分区政治委员。新中国成立后,先后任中共中央山东分局检查处处长,山东省人民检察院副检察长、党组副书记。1958年在整风反右补课中,被打成右派分子,受到留党查看两年的党内处分,降职到山东德州国棉一厂担任副厂长。1964年获平反,1965年6月起任青岛市副市长。

“青岛事件”发生时,王效禹正在青岛市的崂山县,担任中共崂山县“四清”工作团副书记、副团长,兼崂山县中小学教师训练班党委书记。

“八二五”事件发生后,青岛市第四十一中的部分教师写出呼吁书,要求革命、造反、投入到“文革”的洪流中。王效禹当即给以大力支持,并于8月31日上午在崂山县中小学教师会议上宣读了呼吁书,又于当天晚上在崂山县中学“文革”小组长会议上表态支持。王效禹指出:要敢于大胆怀疑,敢于丢掉“怕”字,敢于革命,崂山县四清工作团团团长周化南是保皇派,青岛市委有问题,山东省委有修正主义。王效禹表示,坚决支持四

十一中革命教师的革命行动,坚决支持三大院校革命师生的革命行动,坚决支持成立红卫兵。王效禹的行为,被许多干部认为是造青岛市委的反,与市委决裂,不可容忍。

“九一”事件发生后,据王效禹说,“四清”工作团团长周化南将他禁闭起来。周化南时任中共青岛市委副书记。而张敬焘后来说,不是禁闭,是看护。“当学生起来造反时,机关干部也发生了变化,其中有少数人响应,内外结合。当时的青岛市委副书记兼崂山县‘四清’工作团副团长王效禹,就公开表示支持学生造反。‘八二五’事件后,当他看到市委受到冲击,我被揪斗时,便在崂山县的教师训练班上发誓表态,与市委决裂,坚决和学生一起造反,许多不明真相的群众也跟着他起来造反。正在这时,发生了9月1日20几万人上街游行和静坐,要求中央撤销对我撤销职务的决定。这时王效禹吓得魂不附体,骂自己是老右派,不是人,要求戴高帽子游街,疯疯颠颠地一会儿道歉一会儿哭。周化南看他精神不正常,怕出事,就找项锡洲(当时是市委组织部党员管理科科长、崂山县委副书记)等四个人把他看护起来,在崂山县人委后面找了一间房子让他休息。”“9月3日,当他得知中央没有恢复我的职务时,在一个礼拜天,又趁人不注意跑到邮局向中央文革发电报,告了市委的状,说市委组织工农镇压学生,他支持学生造反被‘关押’。”<sup>注5</sup>谭启龙当时使用了“看管”两个字。不管是“禁闭”还是“看护”,或是“看管”,有一点是共同的,即限制了王效禹的人身自由,对党内的高级干部,不经过司法程序,就限制人身自由,可见当时中国的法制观点、法制建设是何等的薄弱。至于说王效禹“精神不正常”,那为什么不送精神病院?后来的事实表明王效禹精神很正常。

9月3日晨5时35分,王效禹给“四清”工作团写了一封信,通过看管人员黄兆顺递了出去。信的内容是:(一)质问:为什么对我采取这种措施?谁决定的?谁批准的?(二)要求:和全县机关干部见面,和全县教职员工见面,和全县贫下中农社员见面,和家属见面。<sup>注6</sup>接着,王效禹给中共中央发去了一封电报,内容是:中央,崂山县9月1日发生了严重的镇压革命的反革命事件。王效禹发于禁闭室。<sup>注7</sup>

9月4日凌晨2时,王效禹给中共中央文革小组拟了一份电报,内容如下:“中共中央文化革命小组:青岛市崂山县‘四清’工作团党委,自青岛事件以来,犯有逃跑主义的错误和严重的方向性错误,稍微一紧张就藏起来,不敢和群众见面。不是号召工农兵坚决支持学生的革命行动,而是多方阻挠,在农村提出的口号是‘热情欢迎,坚决支持,婉言谢绝’,并要工人、农民对学生进行教育,说吃着农民的饭,穿着工人做的衣服,不能去胡闹。对学生,不是要他们在游泳中学游泳,而是说服教育他们不要进城。这是和中央对立的。我提出过不同意见,做过争论,没解决问题。我在干部当中揭发这些错误,准备开始斗争,他们就把我关起来了,说我搞反革命暴动,组织大会斗争我。我不管几万人大会斗争,也要誓死批判这些错误,因为如不及早制止,将有发生流血的可能。望速处理。青岛的问题,我认为学生批判张敬焘同志的方向是对的,应该支持的;当然打人是错误的,应该进行正面教育。组织工人、农民支持张敬焘同志,这是方向的错误,是违背中央精神和《十六条》的,势必要把这事情搞得更为复杂。崂山县‘四清’工作团副团长王效禹发于禁闭室,九月四日二时。”<sup>注8</sup>9月4日是个星期天,白天,王效禹趁着看管人员不注意时通过邮局把电报发了出去。毛泽东9月7日的批示就是写在这份报告上的。笔者核对了《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十二册第125页中摘录王效禹报告的部分内容,是一致的。

9月4日晚8时,王效禹获得了自由。9月13日,王效禹给谭启龙写了一封信。也许王效禹此时还不知道毛泽东的批示。信中阐述了处理青岛问题的几点建议,一是要充分肯定、坚决支持三大院校革命师生的革命行动;二是要相信革命师生的绝大多数是听毛泽东的话,不能对革命师生采取对立态度和压制手段;三是要说服群众,首先要说服干部,因为许多错话出自干部之口,许多错事出自干部之手,“九一”事件是干部带的头。信中特别指出:“‘九一’事件是个反动事件。”<sup>注9</sup>

9月25日,青岛市首批2700多名红卫兵乘专列赴北京,一是参加国庆18周年活动,二是参观、学习首都“文革”运动。王效禹写了三封信由



1967年1月22日,青岛市革命造反委员会宣告成立,夺取中共青岛市委和市政府的大权

青岛医学院红卫兵负责人张汉祥代送康生、王力、关锋。康生和王力、关锋接见了张汉祥等人。王力、关锋时任中央文革小组成员,在革命战争年代,都在渤海解放区工作过,同王效禹熟悉。

王效禹致中央文革小组的电报,引起了毛泽东的重视;王效禹在电报中阐述的观点,得到了毛泽东的肯定,在那个个人迷信盛行的时代,影响是相当大的。应该说,这是王效禹所始料未及的。那么,王效禹的“造反”为什么能够得到毛泽东的支持呢?就王效禹方面来说,有三点原因。第一,王效禹一直信仰毛泽东的群众运动的理论,早在抗日战争时期,他就以毛泽东的《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的观点指导减租减息运动,9月13日,他在致谭启龙的信中又提出要用《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的观点、立场去解决对革命师生队伍不纯的认识问题;第二,王效禹在1958年被打成右派分子,受到不公正待遇;第三,由于上述两点,使他能够比较深刻地理解《五一六通知》和《十六条》中蕴含的毛泽东的意图。就毛泽东方面来说,他所发动的“文革”在运动初期遇到了来自干部队伍中的较大阻力,当时有很不理解、很不认真、很不得力之说,像王效禹这样支持“文革”的,是凤毛麟角,所以,他批示说:“谭启龙和这个副市长的意见,我看是正确的。”

10月初,毛泽东决定召开中共中央工作会议,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以进一步扫除“文革”的阻力。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要害是反群众路线,表现为挑动群众斗群众,支一派压一派。山东省出席会议的是谭启龙、省委书记处书记兼省长白如冰、省委书记处书记苏毅然。另外,中央指定王效禹出席会议。这显然是得到毛泽东同意的。但遇到了谭启龙的反对。中央没有采纳谭启龙的意见,王效禹出席了8月25日的中央工作会议。会议期间,王效禹的数次发言都遭到了谭启龙的

乱插话和乱打断。中央“破格”点名王效禹出席工作会议,无疑是为青岛市、山东省乃至全国的造反派树立起一面旗帜。

在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中,青岛市形成了以中学生为主体的保市委和以三大院校造反师生为主体的反市委的两大派红卫兵组织。保市委派得到了市委和各机关干部的支持。双方矛盾愈来愈尖锐,斗争愈来愈激烈,甚至发生了武斗。这期间的斗争,被称为第三次交锋。此时的青岛市委,从半瘫痪状态进一步陷入了瘫痪状态。

## 毛泽东批准的“青岛夺权”

进入1967年,中央文革小组副组长张春桥、成员姚文元奉命与上海造反派策划夺权。1月6日,上海市工总司等32个造反派组织召开了“打倒市委”大会,宣布夺了上海市的党政大权。11日,根据毛泽东的意见,由中央文革小组起草,以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的名义,给上海工总司等造反派组织发去贺电。16日,毛泽东批准了上海市的夺权。同日,《人民日报》刊登《红旗》杂志评论员文章《无产阶级革命派联合起来》。文章转达了毛泽东的意见:“从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手里夺权,是在无产阶

级专政条件下，一个阶级推翻一个阶级的革命，即无产阶级消灭资产阶级的革命。”文章指出，毛泽东“支持上海工人阶级同其他革命群众、革命干部联合起来，在一个市的范围内，从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和极少数坚持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顽固分子手里夺权的斗争”，“这是在新形势下所采取的又一个伟大的战略措施，这个措施将推动全国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来一个新的飞跃。”这样，毛泽东将上海的“一月夺权”树为全国的范例。“文革”进入了夺权的新阶段。

为了保障全面夺权的顺利实现，毛泽东批准采取了一系列非常措施。1月13日中共中央和国务院颁布的《公安六条》，旨在保卫以毛泽东为首的“无产阶级司令部”和夺权。1月23日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发布的《关于人民解放军坚决支持革命左派的决定》，决定了军队的支持是夺权能否成功的关键。

在张春桥、姚文元同上海造反派策划夺权之时，中央文革小组通过电话要求王效禹领导夺青岛市的党政大权。“青岛夺权”，得到了毛泽东的批准，影响到山东全省和全国。

1月6日，王效禹伙同一部分人向全市散发了《致青岛市各革命造反组织、革命同志的一封信》，鼓动各造反组织成立联合机构，接管青岛市委“文革”领导小组的一切工作。同日，他还以个人名义发出《给全市革命造反派同志们的一封信》，煽动造反派联合起来，造省、市委的反。在策划夺权的过程中，王效禹与三大院校部分造反师生产生了分歧。王效禹主张以工人造反组织为主联合学生造反组织夺权，后者主张以学生造反组织为主联合工人造反组织夺权。分歧导致了分裂，使原本筹划的1月中旬全市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大会出现了各自为战的局面。在这种情况下，王效禹采取了三项措施。一是派张子石等人赴京向中央文革小组汇报夺权的筹备情况。张子石是康生之子，在青岛市教育局工作。康生、王力、关锋均表示：以王效禹为核心，夺取青岛市的权。他们指示说：“支持你们夺权。青岛有利条件，一是经过三次反复，革命左派得到了锻炼；二是有个王效禹。”“不但要考虑青岛市夺权的问题，还要考虑山东省夺权的问题。”这显然不是康

生等有权决定的大问题。二是组织造反派，于1月11日夺取了《青岛日报》社和青岛人民广播电台的权，于1月13日夺了青岛市公安局的权，从而控制了舆论阵地和专政机关。三是策划轻工系统29个工厂企业的造反组织夺了青岛市轻工局的权，为全市夺权进行了一次预演。在三箭齐发皆中的形势下，王效禹于1月18日在《青岛日报》上发表了《坚决向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夺权》一文。青岛夺权的大幕正式拉开了。

1月22日，青岛东方红、全国革命造反红卫兵联络总部青岛轻工分部等23个造反组织召开大会，宣布成立青岛市革命造反委员会，夺取青岛市委、市政府的大权。大会发出了《给毛主席的致敬电》，宣读了《告青岛全市人民书》、《第一号通令》。《告青岛全市人民书》着重阐述了夺权的理由，目的是表明夺权的合法性。《第一号通令》规定：封闭青岛市委、市政府，停止其一切活动；一切权力归革命造反委员会。同时号召夺取中共山东省委、山东省人民政府的大权。当时，王效禹发表了《坚决支持青岛市革命造反委员会夺权》的声明。《声明》中说：“坚决支持和拥护青岛市革命造反委员会夺取了青岛的政治、经济、文化的大权”，“从今天起，辞去青岛市人民委员会副市长的职务，愿意在青岛市革命造反委员会领导下，当好普通一兵。”这份《声明》产生了一定的作用，一是凝聚了大部分造反派及中间派的力量，孤立了小部分分裂出去的造反派；二是分裂了保守派队伍；三是吸引了部分干部的支持。

尽管王效禹发表声明支持夺权，但他对夺取的权力能否保得住并不自信。夺权的第二天，他就致电中央文革小组，称权是夺过来了，目前看还有被夺回去的可能。建议中央尽快表态支持。

青岛市的新造反政权，确实遇到了挑战。挑战来自两个方面，一个方面是分裂出去的造反派，一个方面是保守派，但反对派的力量并不强大。一度出现的围攻《青岛日报》社和青岛人民广播电台的抗争，没有掀起大的波澜。

1月27日，关锋电话告知王效禹，中央已承认青岛的“一·二二夺权”。这时，毛泽东批准了青岛市的夺权，林彪直接指示驻青岛部队要支持青岛市的夺权，周恩来表扬了青岛市的夺权。

得到中共中央肯定的青岛市革命造反委员

会,于1月29日举行了“抓革命,促生产,粉碎反革命经济主义誓师大会”。王效禹在大会上讲话,强调“这个权夺得好,夺得对”,提出“防止阶级敌人的新反扑”,要求造反派“以团结为重”,指出“既然权力我们能够夺过来,我们必然把它管好,相信我们也一定能够把它管好”。驻青岛的陆军某部负责人和海军北海舰队负责人分别讲话,表示“坚决支持青岛市革命造反委员会的革命行动,坚决站在革命造反派一边”。一些造反组织的代表也讲话表示支持联合夺权。大会宣读了《给毛主席的致敬电》和《第二号通令》、《第三号通令》。同日,青岛市革命造反委员会发出了《第一号紧急通告》,要求只准文斗,不许武斗;各个革命组织都应在大方向一致的前提下,加强团结,共同对敌,把挑动武斗和制造分裂的幕后策划者揪出来,依法严厉惩处,抓革命,促生产。《第一号紧急通告》表明,这个造反政权要以强力维护社会和经济秩序,也就是维护自己的稳定。

1月29日晚上,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广播了青岛夺权的消息。1月30日,《人民日报》针对青岛夺权发表了《关键在于大联合》的社论。社论赞扬青岛夺权“是继上海、山西无产阶级革命造反派成功地夺权之后,毛泽东思想的又一次伟大胜利”,指出青岛夺权的经验“是多方面的,其中最重要的一条就是实现了无产阶级革命造反派在毛泽东思想基础上的大联合”;号召一切真正的无产阶级革命造反派“实现最广泛最紧密的大联合,夺取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新胜利”!青岛夺权消息播出和《人民日报》社论发表之后,全市造反派组织,特别是驻青岛的解放军部队,立即走上街头,举行庆祝游行,欢庆夺权的胜利。1月30日出版的《青岛日报》,发表了王效禹1月22日的《声明》和空军战斗英雄舒积成的文章《百分之百地支持革命造反派》,以示革命干部与人民解放军对夺权的支持。自此,青岛市革命造反委员会,后改为青岛市革命委员会,取得了合法地位。

“青岛夺权”,为什么比较顺利且取得成功,笔者认为有以下六条原因。(一)造反派得到了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共中央的强有力的支持。事实表明,造反派从“青岛事件”到“青岛夺权”,都得到了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共中央的支持。现在一些著作和文章说是造反派仅仅得到了康生的支

持,是不全面的。(二)造反派经受了斗争的磨炼。事实表明,造反派经过半年中的三次交锋斗争,经受了风雨,积累了经验,增长了本领。(三)王效禹发挥了核心作用。事实表明,因为王效禹反对调动工农干预学生运动的观点得到毛泽东的肯定,与中央文革小组的康生、王力、关锋保持着直接的联系,有着比较丰富的政治斗争经验,所以他能够发挥也确实发挥了核心作用。(四)反对派力量较弱。事实表明,保守派在半年中的三次交锋斗争中,连续遭到打击;分裂出去的造反派的力量和影响力都不大,而两者又不可能联合起来,所以无法形成强有力的对抗力量。(五)夺权采用了闪电战术。事实表明,夺权前后的每个步骤都相当紧凑,夺权之后王效禹即建议中共中央尽快表态支持。从宣布夺权到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报道夺权消息,仅仅7天时间,这就使反对派没有时间形成抗衡力量。这被王效禹后来称之为闪电战术。应该承认,因为王效禹在革命战争时期长期担任军队领导人,所以有着比较丰富的军事斗争经验,他把军事斗争中的闪电战术用在了夺权上。此后他在夺取山东省党政大权时依然采取了闪电战术,不过就没有这么奏效了。(六)军队的大力支持。事实表明,军队尽管是在夺权之后奉命支持的,但其威慑作用是不可低估的。

1967年1月31日,遵照中央的指示,王效禹率领青岛市革命造反委员会夺山东省委、省人委大权赴济南代表团到达省会济南,展开了又一场夺权斗争。

注释:

注1、2、3 中共青岛市委党史研究:《中共青岛地方史大事记》,中共党史出版社2000年8月第1版180页、181页、181页。

注4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十二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年1月1版124页。

注5 张敬焘:《难忘的岁月》,载中共青岛市委党史研究室编《回忆与思考》第一辑第31页。

注6、7、8、9 山东海洋学院“王效禹同志问题调查小组”、“革命造反战斗队”,《王效禹同志问题调查报告》(1966年11月7日)

(作者为中共山东省党史研究室原副主任、教授) (责任编辑 萧 徐)

# 第一届政协秘书处工作琐忆

• 孙小礼

有生以来，与国家命运相联系的最令我高兴、振奋的第一件事是1945年抗日战争胜利，第二件事是1949年新中国诞生，第三件事是1976年打倒“四人帮”。而新中国的诞生尤其是我最难忘的历史时刻，因为我有一段在新政协（后来改称为中国第一届人民政协）秘书处工作的经历，亲身参加了筹备新中国成立的人民政协会议的一些会务工作。那团结、欢腾的热烈场面，那忙碌、激动的日日夜夜，至今记忆犹新。

## 进入中南海

1949年夏，我从北平贝满女中高中毕业。8月中旬的一天，北平团市委通知我说：中央有一项紧急政治任务，需要从高中毕业生中抽调20名党团员去参加工作，我是其中的党员之一。要我准备好被褥和必要的衣物，在8月20日中午1时到团市委门口集合，有车送我们到工作地点，是什么地方到那里就知道了。我从这位干部的谈话口吻中感觉到是要去一个神圣的崇高的革命岗位，正有紧张的战斗任务在等待着我们。

我准时到东单的团市委集合，20个人陆续到齐，有19名男生，只有我1人是女生。我们各自提着行李上了一辆大卡车，卡车经过东交民巷，西交民巷，一直开到中南海的东门。进门后卡车沿着湖边的小道缓缓而行，最后停在了勤政殿。一位穿灰色制服的男同志招呼我们下车，把我们领进勤政殿的一个会议室。啊！原来我们的工作地点是在中南海。

## 丁大姐的叮嘱

在会议室坐下之后，一位胖胖的女同志站起来向我们讲话。她首先代表新政治协商会议筹备会秘书处欢迎我们来工作，接着介绍筹备会的机

构设置概况：秘书长是李维汉，副秘书长有孙起孟、阎宝航、宦乡、连贯、罗叔章、齐燕铭等人。秘书处的工作由齐燕铭直接领导。然后她介绍自己叫丁洁如，是秘书处副处长。她说，新政协还有一个半月就要开会了，筹备工作非常紧张，人手不够，所以从大学生和高中毕业生中抽调一批党团员来补充秘书处的力量。她恳切地鼓励我们：“你们是先进的优秀青年，相信你们能全心全意地为为人民服务，作为一批得力的生力军，你们一定能为新政协的召开，为成立统一的新中国做出贡献。”她叮嘱说：“我们所从事的是一项非常严肃、非常重要的政治任务，不但要认真地工作，还要严格地遵守组织纪律，不该去的地方不要去，不该问的事情不要问，不该拿的东西不要拿……”最后她宣布对我们的工作分配，在念到去议事科工作的人员名单时，听到了我的名字。

## 分到议事科

我们一批分到议事科的人立即跟着一位年轻同志到了勤政殿西北侧的办公室。

议事科科长孙传禄，副科长迟先达、李鸿礼，记录组组长左达，副组长陈然等人已在办公室等着我们。孙科长向我们解释“议事科”是什么意思，所谓“议事”就是会议的各种事务。例如，制作会议代表名册、发会议通知书、安排会议代表报到、在各种大大小小的会议上做记录、大会投票时统计票数，以及会议上的各种临时性任务。他要我们做好思想准备，任务非常繁重，经常要开夜车。但是当天首先要把食宿安顿好。

孙科长还说，李维汉同志过几天要和筹备会全体工作人员见面。但是8月下旬，李维汉摔伤了腿，就由林伯渠代理秘书长了。林伯渠同志向全体工作人员讲了一次话，勉励大家努力工作，

一定要把这次有重大历史意义的新政协会议开好。在这次会议上我们见到了六位副秘书长。

### 住进西芭所

那天下午,议事科的同志带我们到住处西芭所,走进里面的一个四合院,男士们都住进了那间大北屋,而我一个人被安排在西厢房,房里有两张床,一个桌子和两把椅子,土地很潮湿,墙边长着长长短短的青草。我把行李打开,把床铺好,把衣服和洗漱用具分别放在椅子和桌子上。接着,我们被领去食堂吃饭。食堂设在瀛台,这是从前慈禧太后幽禁光绪皇帝的地方。

晚饭以后,我们这批新来的人一起到海边散步,直到天色已黑才回到西芭所。我刚进屋,一位中年妇女端着脸盆进来了,后面还有人帮她抱着铺盖卷。她一见我就说:“你就是新来的吧,领导叫我搬到这里来住,就是为了陪你!”她边说边整理东西,不几分钟,说了一句“我正忙着呢!”就走了。我和她共住一屋两个来月,每天各自早出晚归,我经常半夜才回来,或者她已经睡了,或者她还没有回来;早上我一睁眼就起床,赶紧往食堂或办公室跑,或者她已走了,或者她还在睡着,几乎没有见面说话的机会,以致我始终不知道她的名字。

### 多给我5斤小米

第二天早上,科里发给我们每人一套灰布制服,一枚印着“中南海”三个红字的银灰色圆形徽章,还有8月份的津贴。这是我平生第一次领工作服,第一次领津贴,美滋滋的感觉溢于言表。

当时实行供给制,男同志每月20斤小米,女同志则每月25斤小米,因为每斤小米的市场价是1角钱,所以发给我2.5元,而他们男士都只有2元。他们很不理解地问我:“为什么你的津贴比我们多?”有一个人不服气地问:“凭什么多给你五斤小米?”我无言以对,因为我也感到很奇怪。这时,科长走过来向大家解释:“照顾女同志是我们革命队伍的传统,在政协这里也是一样,给女同志补贴5斤小米,这叫妇女卫生费。”科长虽然做了说明,好像这些小青年还是不很明白,或者说,心理仍不太平衡,以后还时不时唠叨两句。有一天路过小卖部时,他们半开玩笑地对我

说:“你的钱多,你得请我们吃花生米!”我二话没有,马上买了一包花生米请大家吃。还有一次大家一起打扫卫生,还剩一条走廊没人扫,一位男士也笑对我说:“这应该归你扫!”我也二话没有,乖乖地把这条走廊扫干净。我觉得:多得应该多劳。

### 开始工作了

我们穿上了灰色干部服,佩带上中南海的徽章,等待着给我们布置工作。迟先达同志在桌上铺了一张大纸,准备好了笔墨,让我们每个人都用毛笔签名,于是我们一一写了自己的名字。

接着,左达和陈然带我们分别去参加会议,发给我们纸笔,要我们在会议上尽可能作详细记录。我是跟着陈然去的。会议开始了,我一心想做详细记录,但心情非常紧张,越想记全,却越是记不全。会散了,陈然收去我的记录,我歉意地说:“我没有记好。”我为自己没有做好记录而十分懊丧。

第二天早上,科长向我们宣布分工:夏国治、高镇宁、梁秀峰和大学生张敦礼等人到记录组,显然他们是记录得比较好的,左达、陈然把他们带到东边的办公室去谈工作了。毛世民、张允、李希玉和我四人就留在科长办公室,由迟先达副科长指导我们工作。在靠门口的地方为我们摆了两两相对的四张办公桌。

迟先达同志对我们说:“你们几个人毛笔字写得不错,现在给你们的第一项任务就是写信封。”他发给我们每人一份“参加新政治协商会议的各单位代表名单”和一大摞信封。要我们立刻就动笔,因为要给代表发会议通知书。

从这一天起,我们作为工作人员就真格的忙碌不停了,几乎天天要开夜车。有时已困倦不堪,但每天夜晚食堂都把一大盆煮好的挂面作为夜宵送到办公室,只要一碗热乎乎的挂面吃下肚,我们又精神抖擞起来了。

### 背代表名单

对于写毛笔字,我不发怵,因为从小就习惯用毛笔,但是写这样重要的会议通知书信封,觉得要尽可能写得好一些,迟先达同志也要求我们必须把字写得端正清楚,所以我总是认认真真一

笔一划地写,速度当然快不了。不料还经常会出错,错了一个字,涂改太难看,只能重写,更是忙上加忙。任务常常很紧急,越急越爱出错。因为速度慢,我们只能加班加点,连连开夜车以便按时完成任务。

孙传禄科长看出了我们的毛病,他说:“你们要熟悉代表的名字,应该把各单位代表的名字都记熟,这样可以减少错误。”我们觉得他说的对极了,于是下决心把全部代表名单背下来:新政协筹备会有23个单位共134位代表;第一届人民政协全体会议则有46个单位662位代表。我们反复念,反复背,还反复地互相考问,以增强记忆。经过一番艰苦的努力,我们对代表名字熟悉多了,但还是有记不住的情况出现。

有一天,孙传禄科长笑话我们说:“看你们背得好苦啊,我记这些名字,从来不用这样死记硬背。”我们异口同声地称赞他记性真好,从心里佩服他的记性好!但他却说:“你们搞错了,不是我的记性好,是我的政治经验比你们多,所以很多名字我不用背就自然而然地记住了。”

### 毛泽东报到

人民政协开会之前要组织好六百多名代表的报到。这项任务由丁洁如大姐总负责,动员了许多同志参加,具体分工时,让我分管中国共产党代表的报到,我表示一定要尽心尽力做好。

代表报到的签名纸已经印好,是白色宣纸,上端印着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的会徽,中间印了一个大方框,内分五行。迟先达同志交代说:代表签名一律用毛笔,第一行写单位名称,由各单位的首席代表写;第二行是首席代表签名;自第三行起是各单位的其他代表签名,每行上下可写两个名字。

政协代表报到处分设在勤政殿、怀仁堂等几处地方。各党派代表的报到处设在勤政殿正门内的大厅里。中国共产党的正式代表16人,候补代表2人。陈云同志是第一个来报到的,我请他在第三行上端签了名。之后,刘少奇、周恩来等代表都先后来报到签名,首席代表毛泽东是最后一位报到的。

9月17日上午,迟先达同志通知我:“今晚7时毛泽东主席来勤政殿开会,同时就来报到。有

摄影记者拍照,可能还要拍电影,你要做好准备。”于是我忙着挑选最好的毛笔、最好的砚台、最好的墨,……。突然,我想起一个问题:毛主席在前两行写字,而后面三行已经写满了名字,这样拍摄出来是不是不太好看?我问先达同志怎么办?他想了一下,要我给他一张未用过的签到纸,他沿着第三行的竖道把纸折叠起来,盖上已签满名字的后三行,这样乍一看,就像一张崭新的签到纸了。我很高兴,佩服先达同志真聪明,但我又想到一个问题:“如果毛主席大笔一挥,把字写到盖在上面的白纸上,岂不糟糕啦!”他笑着对我说:“这就是你的事了,你必须对毛主席讲清楚,只能把字写在前两行之内。”

晚上我提前到了签到处,等着毛主席来报到。那天许多人已先来到勤政殿,毛主席一进门就被他们围住了,一一与毛主席握手问好,过了好一会儿,毛主席才来到报到处,郭沫若、李济深、马寅初、乌兰夫等人跟着簇拥到他的身旁,说要看毛主席写字。这时四周灯光齐亮,好几个摄像机镜头已对准毛主席。待他一坐下来,我就大声地说:“毛主席,请你在第一行写党派名称:中国共产党,在第二行写名字,请不要写到第三行里去。”他诧异地问我:“什么,到底要我怎么写?”我又大声地重说了一遍,最后干脆补了一句:“就是只在这两行之内写,不要写到上面这张纸上。”他笑了笑,像是看穿了我们所做的手脚,说:“好吧,我照你说的写。”他在第一行写了“中国共产党”,在第二行内写了“毛泽东”。然后他放下笔起身离开,周围的人也同时散去。啊!这时我才松了一口气,终于完成了中国共产党代表的签到任务。

后来,在70年代和80年代的两次有关的展览会上,我看到了毛主席在新政协签到的照片,解说词中都说毛主席作为中共代表第一个报到。其实应该把“第一个”三字去掉才符合史实,作为当事人的我,心里很明白,但是别人哪能知道这个过程的底细呢。

### 宋庆龄报到

第一届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有“特别邀请人士”75人,为了工作方便,秘书处把“特别邀请人士”也算作一个单位,即第46个单位,第一名

就是举世闻名的宋庆龄女士。

宋庆龄是从上海专程来北平参加人民政协会议的,由邓颖超、廖梦醒和管易文陪同她乘坐火车于8月28日下午抵达北平。毛泽东、朱德、周恩来、林伯渠、董必武和各个民主党派的负责人李济深、何香凝、沈钧儒等,以及无党派人士、各人民团体的代表郭沫若、蔡畅等数十人到车站迎接,在北平火车站举行了隆重的欢迎仪式。

领导通知我荆惕华,由我们两位女同志来负责宋庆龄的报到,我们高兴地接受了这一任务。在我的心目中,宋庆龄从来就有着极为崇高的形象,过去我们都称孙中山为“国父”,孙夫人为“国母”,但是却没有机会见到她,现在要亲自接待她来签到,怎能不兴奋呢!

在准备过程中,迟先达同志告诉我们一个情况:宋庆龄不习惯用毛笔写字。他说:“我们应该尊重她的习惯,为她的签到准备一支钢笔。”为此,我们在签到的宣纸上试用了好几支笔,才挑出一支比较合适的钢笔。

9月中旬末的一天,天气晴朗宜人,我们在怀仁堂门口的报到处等待着。宋庆龄由管易文陪同着来签到了,她用钢笔很工整地写下了自己的名字。然后我们目送她走进一辆小汽车,随即驶离了怀仁堂。

在9月22日的《人民日报》上,有一整版刊登人民政协会议的照片,其中有宋庆龄到政协报到的照片,照片中有荆惕华和我站立在签到桌旁。周围的同志指着这张照片对我说:“呦!你们两人竟被拍摄进了这个历史的镜头!”

30多年以后,在1983年参观宋庆龄故居的时候,我又看到了这张照片,我对同去的朋友说:“那就是我。”这话被宋庆龄故居负责人杜述周同志听到了,他立即向我询问起来,感叹道:“好多年了,一直不知道这两位女同志是谁!他热情地让我留下姓名和地址,可惜我已不知道荆惕华的去向。他说:‘你们自己也保存有这张照片吧!’”我说:“没有,那时工作很忙,纪律又严,我们不敢去要照片。其实我们常碰到摄影记者侯波、陈正清等人,但从来没有向她(他)们提出过要求。”他表示一定要翻拍寄给我。果然,几天以后,我收到了杜述周同志寄来的两张五寸的翻印照片,让我留作纪念。

## 大会开幕

中国人民政协第一届全体会议于9月21日晚七时在怀仁堂开幕。

开会期间,我们的任务是每次会前在会场单双号两个入口处向代表们收签到卡,根据收到的签到卡来统计到会的代表人数,向领导报告。然后我们进入会场,分别站到最后一排座位后面的一个固定位置,当会议议案交大会举手表决时,我们要做数票工作,每人分管几行,从后往前走三次,边走边数:赞成的多少,反对的多少,弃权的多少。为了做好数票工作,事前迟先达同志领着我们到怀仁堂实地演练过两回。

开幕式前,周恩来代表政协筹备会报告会议各类代表名额、大会主席团名单和会议秘书长人选(林伯渠),由全体代表举手表决。我们从后向前数了三遍,每个代表都举手赞成,无一人反对,无一人弃权,全体一致通过。记得后来几次大会的议案表决,情况也是同样,所以我们的数票工作很顺利,很轻松。

当主席团成员登上主席台后,政协筹备会常委会主任毛泽东就宣布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开幕,军乐队奏起人民解放军进行曲,会场外鸣起礼炮,全场代表起立,热烈鼓掌达五、六分钟之久。接着是毛泽东致开幕词,几乎是每讲一两句就要被热烈的掌声所打断。他说:“我们的会议是一个全国人民大团结的会议”,会议要制定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的组织法和共同纲领,选举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的全国委员会,制定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的组织法,选举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制定国旗、国徽;决定国都、年号;“我们的工作将写在人类的历史上,它将表明:占人类总数四分之一的中国人从此站立起来了。”这时全场欢声雷动,暴风雨般的掌声经久不息。开幕式上还有刘少奇、宋庆龄、何香凝、张澜、黄炎培等十二位代表作了热情洋溢的讲话,都讲到要把旧中国建设成独立、民主、和平、统一和富强的新中国。

自6月份起新政协筹委会的各个小组就为这些工作非常紧张地忙碌着。我常路过勤政殿里那个堆放国旗图案的房间,从全国各地以及海外不断寄来各种设计图案,图纸堆得很高很高,后

来知道有 2992 份。一个由马叙伦为组长，叶剑英、沈雁冰为副组长的十六人工作小组，认真地对所有图案一一审看、比较、筛选，到大会前夕选出了若干幅图案提交会议全体代表讨论、挑选，为公正起见，对图案只编号而隐去设计者姓名。经过激烈争论，直到 9 月 26 日国旗国徽国歌国歌都纪年方案审查委员会综合代表讨论意见，向大会提议采用经过修改的第 32 号图，即红地五星红旗作为国旗。在 9 月 27 日的大会上，这一提案在全场热烈掌声中一致举手通过。我至今还保存着一份当年印发的五星红旗图案。

### 为女代表服务

领导嘱咐我们，在会议期间，除了各项交办的任务，还要主动为代表做一些服务性的工作。科长特别嘱咐我：作为一名女工作人员，要多关照女代表的需要。

我向罗叙章副秘书长表示：女代表有事可多找我。她微笑着说：“你年纪很小嘛，就当工作人员啦！”我回答说：“我已十七岁，是秘书处议事科的。”也许这一对话被陆瑾代表听到了，她高兴地问我：“你能帮个忙吗，我有一些材料正要送给×××，不知他在哪里？”我跟着走到她的座位旁，她把一个文件袋写上名字交给了我，我随即根据大会的“代表席次表”找到了这位人士，转交了陆瑾代表的材料。

有一天会议休息时，张晓梅代表对我说：散了会她要去某处办事，不知怎么走？我打听清楚后，为她带了路。

我还为“子弟兵的母亲”戎冠秀抄写过发言稿。她于 1938 年在河北平山县农村参加共产党，曾先后送自己的儿子和孙子参军，在家乡组织妇女搞生产，做军鞋，救护伤病员，是著名的拥军模范。她识字不多，贡献很大，很受人们尊敬。为了她能在特邀人士的分组会上顺利发言，我将她的发言稿用毛笔把每一个字都写得很大、很工整。

### 周恩来的批评

对于周恩来的一次批评，我至今铭记在心。

一天，周恩来同志突然走进了怀仁堂旁边的平房，即会议工作人员的办公室。他看到散落在桌上和地上的回形针，拿起一个回形针对我们

说：“不要乱扔，还可以继续用嘛，你们要注意节约。”我认为这是对我们的严格要求和严厉批评。

一次开大会的时候，突然下起了滂沱大雨。听说周恩来传下话来，要秘书处立刻去买伞，以保证散会时人人都不淋雨。六百多名代表加上三百多名旁听的来宾和记者，共要买九百多把伞啊。幸好雨不久就停了。

这两件事使我懂得：该节约时必须节约，不能浪费，该花费时就得花费，不能吝啬。

### 会场花絮

代表们都喜气洋洋，会场一派欢乐景象。

有一天蔡畅同志穿得挺拔漂亮，与李富春同志手挽着手走进来，一位大姐说：“你们真像一对新婚夫妇啊！”蔡大姐高兴地说：“是吗，那今天就算是我和富春重新举行婚礼吧！”她说得轻松大方，而李富春却腼腆得不知如何是好，惹得大家都笑了，还有人鼓掌祝贺。

最为活泼的是廖承志，他是中华全国民主青年联合总会的首席代表，任何时候都是乐呵呵的，总爱开玩笑。在一次分组会议的签到簿上，他故意用毛笔尖把自己的名字写得比蚂蚁还细小，令人无不发笑。有一天，大会刚宣布休息，他就跑到新民主主义青年团的代表座位处，先摸摸胡耀邦的头，又揪揪蒋南翔的耳朵，再从后面用双手把冯文彬的眼睛蒙住，冯文彬好不容易才挣脱出来，又气恼又好笑地说：“你别再调皮捣蛋了，好不好！”一位老大姐说：“小廖啊，你还是这么爱打打闹闹，你真是青年人的头！”旁边一位代表纠正说：“是娃娃们的头！”

### 人民英雄纪念碑奠基与大会闭幕

9 月 30 日大会下午三点开始，会议的议程主要是两项选举，第一项是选举人民政协全国委员会，是用举手的方式；第二项是选举中央人民政府的主席、副主席和委员，是以无记名投票的方式。代表们投完了票，在检票人员统计票数期间，全体代表到天安门广场举行人民英雄纪念碑奠基典礼，我也随代表们去了。

大约在傍晚六时，首先由周恩来代表大会主席团致词：“我们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为号召人民纪念死者，鼓舞生者，特决

定在中华人民共和国首都北京建立一个为国牺牲的人民英雄纪念碑。现在,1949年9月30日,我们全体代表在天安门外举行这个纪念碑的奠基典礼。”接着全体代表静默志哀。默哀毕,毛泽东宣读纪念碑的碑文:

三年以来,在人民解放战争和人民革命中牺牲的人民英雄们永垂不朽!

三十年以来,在人民解放战争和人民革命中牺牲的人民英雄们永垂不朽!

由此上溯到一千八百四十年,从那时起,为了反对内外敌人,争取民族独立和人民自由幸福,在历次斗争中牺牲的人民英雄们永垂不朽!

最后,毛泽东大声喊道:请各单位首席代表到前面来!首席代表们排着队,每人用铁锹铲土奠基。

纪念碑奠基典礼完毕,代表们回到会场听取选举结果:毛泽东当选中央人民政府主席,朱德、刘少奇、宋庆龄、李济深、张澜、高岗当选为副主席,陈毅、贺龙等五十六人当选为中央人民政府委员。在全体代表热烈的欢呼声和掌声中,毛泽东主席宣布政协全体会议的闭幕式开始,朱德副主席致简短的闭幕词后,大会在《义勇军进行曲》的国歌声中庄严闭幕。

在历时十天的政协会议中,我的感受是:中国人民当家作主了,正在亲手缔造一个新的中国。

### 开国庆典

10月1日下午三时在天安门前举行开国庆典,作为工作人员,我们提前来到了天安门的城楼下。因为没有布置给我上天安门城楼的具体任务,所以我就一直站在城楼下的西侧,一手拿着“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成立典礼程序”表,一手拿着秘书处发给我们每个工作人员的一瓶汽水,未敢随便走动。

我站在那里,觉得自己好像是拿着一个“手榴弹”在保卫天安门。我看着典礼的程序一项接一项地进行:中央人民政府主席宣布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成立;升国旗,奏国歌,鸣礼炮;中央人民政府主席宣读中央人民政府公告;阅兵,游行。

快散会时,议事科的好多人从天安门城楼下

来了,问我为什么不上去?我说:我以为我没有城楼上的任务就不该上去。他们说他们也并非都有任务,只要是工作人员都能上去,笑话我太呆太傻了。我也为自己错失在天安门上俯视庆典壮观场面的机会而深感遗憾。

我和议事科的同志们一起步行回中南海,也像是一个小小的游行队伍。天已黑了,我们刚走进中南海大门,只见五彩缤纷的烟花腾空而起,天空美极了,我们高兴极了,情不自禁地欢呼:中华人民共和国万岁!

### 告别中南海

第一届人民政协会议结束以后,我们只有一些收尾性和过渡性的工作了。告别中南海的日子已经临近,产生了依依不舍的心情。记得我曾对科长说:“下次政协开会,我们愿意再来服务,一定会比这次工作得好。”

孙传禄科长召开了一个告别性的会,他恳切地对我们说:“秘书处的的工作已告一段落,从各地抽调来的同志都要回去了,你们也要离开了。你们还很年轻,应该继续到大学学习,多学些本领参加新中国的建设。”会后,议事科的全体同志在怀仁堂门前摄影留念,同志们相互道别。

平时和李鸿礼同志工作联系少,但毕竟在同一办公室,他的俄文很好,他把新翻译出版的关于东欧的两个小册子签名送我,作为临别礼物。迟先达同志在一张政协代表签到纸上为我题字:“为人民服务要忘掉自己”,作为临别赠言。

我们20名高中毕业生大部分人上了大学的理工科。

### 六十年后感言

六十年的道路是艰难曲折的。

我在心中已为人民英雄纪念碑增添了一句话:六十年来,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前进道路上牺牲的人民英雄们永垂不朽!

新中国的六十年已经写在人类的历史上。

中国的前程会更加光辉灿烂,应该更为完满地写在人类的历史上!

(责任编辑 萧 徐)

# 康濯何以揭发丁玲

● 徐庆全

## 问题的提出

丁玲、陈企霞“反党小集团”冤案，发生在1955年肃反期间。到1956年肃反甄别阶段，由中宣部常务副部长、中宣部肃反“五人小组”组长张际春负责的审查小组，经过查实，认为“反党小集团”的结论不能成立，重新审定，改写结论。1957年反右开始后，改写的结论被废弃，丁玲、陈企霞反而加码成为文艺界知名的大右派。1979年后，这个冤案才彻底平反。

从文艺界一些老前辈及当年参与处理此事的当事人的回忆来看，丁玲、陈企霞“反党小集团”的发轫，始于作家康濯的一份对丁玲的揭发材料：

曾长期在中宣部文艺处工作的黎之回忆说：

1955年6月底，关于胡风的第三批材料公布后不久，作协一位党组副书记和党总支书记共同署名向中央宣传部写报告“揭发”丁玲、陈企霞等人的问题，并附了有关丁玲、陈企霞等人的材料。7月下旬，陆定一署名向中央写了《中共中央宣传部关于中国作家协会党组准备对丁玲等人的错误思想作风进行批判》的报告。（翻印件[58]印字62号）（黎之：《文坛风云录》（郑州：河南人民出版社，1998），页101）

黎之所说的“作协一位党组副书记”是刘白羽，而“党总支书记”则是阮章竞。刘白羽和阮章竞联名的报告所附“有关丁玲、陈企霞等人的材料”，则来自康濯。张僖回忆说：

反“胡风反党集团”时，作协《新观察》编辑部的戈阳提出，我们党内有一股暗流，反党，点了舒群、罗烽、白朗、丁玲、陈企霞等人的名字。康濯接着说，我们这里有两个独立王国，他指的就是《文艺报》和文学讲习所。

丁、陈集团的事情，主要是康濯的揭发。这个会议以后，康濯写了一份材料交给了刘白羽同志。康濯写了一个材料，说丁、陈搞独立王国，并把材料送给了刘白羽。去年（指1998年——引者）刘白羽找我去回忆时，我说，我听说有这么个材料，但是当时你没有给我们看。当时，刘白羽看了材料后对阮章竞说：康濯有一个材料，要转给陆定一部长，你在上面签个名。也是去年，我与阮章竞回忆这件事时，老阮说，当时也没有看这材料是什么内容，当时刘白羽让签名，我就签了。这个材料，就直接送给定一同志（1999年2月25日采访张僖记录）。

1955年7月25日，这份材料送给陆定一后，陆定一向中央写了《中央宣传部关于中国作家协会党组准备对丁玲等人的错误思想作风进行批判》的署名报告。8月3日，中国作家协会党组即开始了对丁玲和陈企霞的批判。

上述回忆的确说明，对丁玲、陈企霞的批判，康濯的揭发材料是个引线。而康濯为何要写揭发材料？一份揭发材料何以就能导致一场对当年国内外著名的作家丁玲的批判？亲历者对这两个比较关键的问题并没有答案。本文试着就这两个问题作一探讨，以就教于文艺界的老前辈和文学史研究专家。

## 康濯的知情者身份

在当年那场揭发批判中，丁玲、陈企霞被称之为“反党小集团”的重要“罪证”，来自于他们在两个单位的作为，一是中央文学研究所，一是《文艺报》。揭发丁玲的康濯，恰恰都跟这两个单位有着较深的渊源。

早在1946年，在阜平县抬头湾村主编《时代青年》杂志时，康濯与在那里写《桑干河上》的丁



丁玲

玲住在一村子里,那时,陈企霞也在华北联合大学。几个月间,康濯与丁玲及陈企霞两家过往甚密。1949年后,丁玲发起筹备文学研究所时,就把康濯拉来一起筹备。文学所挂牌后,丁玲为所长,康濯是第一副秘书长,实际上是具体领导文研所工作的第一把手。因此,他对丁玲在文学研究所的作为,有相当的发言权。

《文艺报》原本为一本内部刊物,第一次文代会结束后,丁玲接手过来,办成了一份指导文艺批评的权威刊物,在延安时就与丁玲相熟的陈企霞,与丁玲一起担任主编。1952年,丁玲退出,冯雪峰担任主编,陈企霞仍在。康濯此前与《文艺报》没有联系,到1954年,冯雪峰遭批判后,他才成为“负主要责任”者。

而伴随着康濯成为《文艺报》“负主要责任”的过程,也是冯雪峰被批判,进而上挂下连到丁玲和陈企霞——二人在《文艺报》搞“独立王国”罪名被坐实的过程。

1954年,“两个小人物”蓝翎、李希凡写出一篇对俞平伯《红楼梦研究》的批评文章,据说被《文艺报》拒绝而在《文史哲》刊登。毛泽东读到

后,写了著名的《关于红楼梦研究的一封信》,对“两个小人物”的文章大加赞赏,对《文艺报》“压制新生力量”的举动表示不满,进而在文化思想界引发了一场“批判红楼梦研究的运动”。

根据毛泽东的指示,中宣部多次召开部务扩大会议,批判《文艺报》“压制新生力量”的错误。据康濯回忆,在中宣部召集的“矛头”“主要直指《文艺报》”的部务会扩大会议上,“文联、作协、文化部许多党员负责干部参加,陆定一同志(时任中宣部部长——引者注)主持,开了多次,主要批评了《文艺报》负责人冯雪峰、陈企霞以及前期负责人丁玲,周扬同志也受了批评,他们并都做了检讨”(康濯:《〈文艺报〉与胡风冤案》,载季羨林主编:《枝蔓丛丛的回忆》,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2001年版,页535)。

中宣部召开多次会议后揭发出来的事实,认为《文艺报》的错误是严重的。“除了投降和袒护资产阶级错误思想,压制马克思主义者的新生力量外,还发表了许多宣传错误理论的粗暴的武断的文艺批评,对文艺创作造成了极大的伤害。”甚至说它“已变成一个违抗党的文艺方针和拒绝党的领导的独立王国”。因此,指定了由林默涵、刘白羽、康濯、张光年、严文井、袁水拍、钟惦棐等参加的一个专门的检查小组,检查和整顿《文艺报》。12月4日,中宣部在给中央的报告中提出,《文艺报》新的编委会拟由康濯、刘白羽、侯金镜、黄药眠、王瑶、冯雪峰、秦兆阳等7人组成,由康濯负主要责任,不设主编(陈清泉宋广渭:《陆定一传》,中共党史出版社1999年版,页394)。康濯由此与《文艺报》工作有了联系。

当年被批判的陈企霞,在后来写出的《陈述书》中写道:“这些会议,已把我的问题提到反党、反中央、反领导,独立王国,骄傲自大的这一类范围上了。”“譬如说在中宣部会上,其实并无什么根据,竟有人说我是文艺界的高岗。譬如说,前文艺报的编委张光年(光未然)提出建议,他认为文艺报整个文艺方向和路线(在我们党团生活的习惯中,一提到方向路线,完全是能使人觉得严重的,这也是应该如此的)有问题,要求组织一个专门委员(会)审查,这委员(会)也在大会上产生了(附带说一下,这委员会并无任何审查结果的报告,至少作为文艺报负责人之一的我,完全不知

道这委员会如何工作的，有什么结果)”(胡平、晓山编《名人与冤案——中国文坛档案实录(二)》，群众出版社1998年版，页417—418)。

这里有两点值得注意：一是，在检查《文艺报》时，“反党”、“独立王国”的罪名就已经提出来了。虽然作为前主编的丁玲也受到了批评，并作了检讨，只不过是当时“独立王国”的帽子没有公开给受到牵连的丁玲而给了陈企霞而已。二是，中宣部成立检查《文艺报》的专门小组。这个小组并不像陈企霞所说“并无任何审查结果的报告”，没有做什么工作，而是作了大量的工作。把陈的问题“提到反党、反中央、反领导，独立王国，骄傲自大的这一类范围上了”，这就是这个小组的工作“成绩”；而且，这个小组也已经把矛头引向丁玲了。曾任丁玲秘书的张凤珠回忆说：

1955年春，有一天我遇到马烽，马烽和我说：你给丁玲写封信，告诉她，如果作协通知她回来，立刻就回，不要推托(丁玲在1955年2月到无锡写作《在严寒的日子里》——引者)。我不大明白马烽的意思。后来才清楚原来马烽已看出批判的潮头推向丁玲了(张凤珠：《我感到评论界对她不公正》，载汪洪编：《左右说丁玲》，中国工人出版社2002年版，页265)。

批判《文艺报》，康濯是重要的参与者之一。既然这次批判已经坐实了丁玲、陈企霞搞“独立王国”的罪名，康濯要写揭发材料，还不是手到拈来？揭发材料自然会有“震撼”的作用。

可遗憾的是，我们至今没有看到这份揭发材料。

在1956年的肃反甄别阶段，丁玲、陈企霞要求为此案平反时，康濯曾就这份材料对人解释过。他说，当时那些人对他的揭发有所歪曲。我是在跟党组谈话时，一是说丁玲有严重的自由主义。二是说你们作家协会领导同志之间不够团结。建议你们开个会，把三十年代的问题也一块谈。我怎么知道，我的意见变成了丁玲个人和党的关系的问题。你们把我摆在起义的位置上让我下不了台(邢小群：《丁玲与文学研究所的兴衰》，山东画报出版社2003年版，页88)。

康濯的叙述，当然有些避重就轻，但从中也可看出，他首先是在与作协党组谈话时谈到丁玲的情况，党组认为他所说的情况很严重，要他写

成书面揭发材料的。而从前引张僖的回忆看，康是在作协党组批判胡风的党组扩大会议上先讲的。

康濯所言的“丁玲有严重的自由主义”是什么？当年担任中国作家协会文学讲习所所长的公木，在1957年的讲话中披露了概要的内容：

据KZ(指康濯——引者)同志检查：文研所的干部，至少在以下三点上，是在丁玲思想影响下，又帮助丁玲扩大了消极影响：(1)提倡对丁玲的个人崇拜、从创办的传奇到挂像，一直到教学计划中“五四”以来新文学部分关于丁玲作品的课堂讲授。(2)宣扬文研所一贯正确。相形之下，别人都是累犯错误；宣扬文研所是文艺党校，是文艺的最高学府。使着不少人都有一登龙门便身价十倍之感。(3)把创作看得高于一切。万般皆下品，唯有创作高。对毕业学员也是片面地强调能写出作品来，实际上很少进行服从组织、做好工作的教育。凡此一切都是与文学的党性原则背道而驰的(张菱：《我的祖父诗人公木的风雨年轮》，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2004年版，页265—266)。

就这样几条——当然，还要加上检查《文艺报》时丁玲、陈企霞搞“独立王国”的“罪状”，就成为一个“反党小集团”的引线？现在看来，真是难以置信。但是，如果联系到当时作协内部复杂的具体情况来看，则就不奇怪了。

## 作协内部“话语权”的争夺

1955年10月到作协担任秘书长的郭小川，在“文化大革命”期间的一份交待材料中有这样一段话：

原来文化部方面是胡乔木管，后来由陆定一主管，拉来周扬。周扬有文艺界的实权是从54年或55年初开始的。当时周扬手上只有作协，当初只有作协归中宣部，其它协会归文化部管。

周扬要从作协打开缺口，掌握文艺界。55年底，康濯写了一个揭发丁玲的材料，说丁自由主义，攻击周扬。原来没有准备搞丁陈的，刘白羽来作协后鬼得很，野心勃勃，对丁陈斗争是刘搞的。他一来作协就感到作协有一派势力，要搞作协，必须把丁玲这一派打下去。

因为反周扬的人很多，打丁玲是杀鸡给吓

猴,把作协的阵地抓到手上。搞了丁玲,就要搞创作,搞出成绩给中央看(陈徒手:《人有病天知否——1949年后中国文坛》,人民文学出版社2000年版,页115。引文中的“1955年底”应为“1955年6月”)。

经历过那场批判的黄秋耘回忆说:

反右前后那个时候,作家协会的权力主要属于文艺官僚,像刘白羽等人,他们代表党来管作协,管文学。还有一些就是创作上的实力派,以丁玲为首,团结了一批真正写出了作品的作家,包括小说《小兵张嘎》的作者徐光耀等人。那个时候,这个文学创作上的实力派跟作协的当权派,跟刘白羽那些文艺官僚斗得很厉害。为什么对丁玲那个“一本书主义”批得那么厉害呢?丁玲不是说作家最要紧的是要有一本书,有了一本书你就站住了吗?这确实说出了她的心里话。她拿这个作本钱来反击刘白羽他们那些文艺官僚。刘白羽连《太阳照在桑干河上》那样的一本书都没有呀。他靠的是职务。他是军人呀,那他是什么样的军人呢?他并没有打过仗。他有的是职务、权力,“是中央派来的”,即周扬派来的。他靠的就是职务、权力这个东西!所以,矛盾就发生在争权(黄伟经:《文学路上六十年——老作家黄秋耘访谈录》,广东教育出版社1999年版,页48—49)。

郭小川和黄秋耘的记述相互印证,当年周扬、刘白羽与丁玲之间的“争权”是不容否定的事实。

但应该指出的是,这种“争权”与我们现今所看到的某些体制内的争权具有不同的性质。现今体制内某些人的争权,是为了“夺利”;而当年,是集体主义话语权张扬、个人自由主义遭唾弃的时代,作为有坚强党性的周扬、刘白羽等人,是从维护“党的领导”来争夺话语权力的。在中国作协党组对丁玲、陈企霞进行批判后,向中央写出的《关于丁玲、陈企霞等进行反党小集团活动及对他们处理意见的报告》中,罗列了丁、陈四大“罪状”:一、拒绝党的领导和监督,违抗党的方针、政策和指示;二、违反党的原则,进行感情拉拢以扩大反党小集团的势力;三、玩弄两面手法,挑拨离间,破坏党的团结;四、制造个人崇拜,散播资产阶级个人主义思想。“拒绝党的领导和监督,违抗党的方针、政策和指示”是这些“罪状”的核心。刘白羽之所以“必须把丁玲这一派打下去”,是因为在

他及周扬看来,丁玲的自由主义行为、以及由于她个人的威望所凝聚的一股力量,已经严重动摇了党在作协乃至中宣部的权威。

在后来对丁玲批判时,丁玲在文学研究所的所作所为被认定为“搞独立王国”,从周扬、刘白羽维护党的领导的立场来看,这样的认定并无错误,从文学研究所到“中国作协文学讲习所”的变化过程中就可以看出来。

1952年,中宣部副部长胡乔木提议停办文学研究所。胡乔木出于什么考虑,不得而知。据陈明回忆,最反对胡这个提议的是康濯。1952年冬天,田间、康濯两人到大连去找丁玲,说,听说文研所要被取消,他们两人很着急,也很气。丁玲说不了解情况,回去后了解一下再说(邢小群:《丁玲与文学研究所的兴衰》,山东画报出版社2003年版,页88)。丁玲回到北京后,与作协党组书记邵荃麟就此事交换意见,决定开一个党组会议讨论一下乔木这个提议。大概这次党组会议否定了胡乔木的提议,因而有了“会后乔木同志决定缩小编制,改为‘文讲所’”的结果。与此同时,丁玲并给刘少奇上书(由康濯执笔),要求把文研所办下去。尽管如此,胡乔木仍然“认为可以停办一期”,“准备教学力量,以便将来办成名副其实的有正规教学制度的训练创作人员的学校”(邢小群:《丁玲与文学研究所的兴衰》,页63)。不过,乔木这个建议也没有实行,1953年8月,第二期学员照常招生。这年秋天,丁玲辞去了文学研究所所长职务,改由田间担任。

丁玲辞职后,就出现文学研究所的人“集体撤退”的现象。1957年9月25日,公木在文学讲习所第八次部分毕业生座谈会的讲话中谈到了这一点:

1953年中央提出暂时停办函授、筹办正规学校的建议,因为不符合丁玲的想法(这时丁玲的想法是要办文学合作社,拉一批人在这里搞创作,实际上是培植自己的势力,作为对党闹独立性的资本)。所以就抵制,并散布不满。后来文学合作社的想法行不通,就用包袱纷纷撤退。直到第二期中途,丁玲时代的所有负责同志都完全退光了。后走的,差不多都去找丁玲商量,走私人路线离开文讲所。……在撤退以前,丁玲在文研所以至文讲所是有很高的个人威信的,干部也帮她

“树立”威信。尊重领导并没有错,制造传奇故事,夸大事实真相,是带有个人崇拜意味的。这时期,有某些干部在丁玲的拉拢下,有感情结合的宗派情绪,挂像、发动写信以至集体撤退……都说明这一点(张菱:《我的祖父诗人公木的风雨年轮》页268)。

公木的话虽然带有批判的痕迹,但所说的事实并没有错。当时,“工作最积极的康濯沉着脸甩手不干了,以后调到作协搞创作。马烽调到作协创作委员会任副主任。陈学昭、严辰、逯斐、李纳调到作协搞创作。西戎调到山西省作协,雷加带着一些创作研究室的人到了北京市文联。教务处主任石丁调到中央戏剧学院文学系当主任”。到1953年冬至1954年春,文学研究所“一些了解底细的领导人”,又“相继要求调走”。副所长田家调北京市文联,邢野调电影局,田间去搞专职创作。至此,文学研究所的主要成员都撤离了,唱起了“空城计”。

为此,中国作协党组接管了文学研究所。1954年2月,改中央文学研究所为中国作家协会文学讲习所,这才达到了胡乔木“缩小规模”的目的。文学讲习所人员由作协党组来调配,任命吴伯箫为所长,萧殷为副所长。萧殷离开后,10月,周扬出面,调在东北的公木来担任副所长。此后,公木又担任所长。

在上述过程中,丁玲先是要求作协党组开会讨论胡乔木的建议并同时给刘少奇写信,以抵制胡乔木的建议。而在此前的一两年中,胡乔木颇倚重丁玲,甚至希望丁玲取代周扬,用现在官场上常说的对话是丁玲有“知遇之恩”,但丁玲为保存文研所这块地盘却忤逆胡的建议。丁玲此举的后果有多严重,不好率意揣测,但以前胡乔木对丁玲的赏识与后来对丁玲的批判时一言不发的反差来看,至少丁玲已经淡出他的视野了。其后,丁玲的辞职带动了文研所骨干力量的“纷纷撤退”——不管这种情况的出现与丁玲是否有关系,或者说有多大的关系,但把它归结到丁玲身上引起的连锁反应,丁玲就是“跳进黄河也洗不清”。连当时的一般工作人员都认为,上述过程中丁玲的举动是在与周扬叫板。孟冰就直截了当对徐刚说:“我不做天平上丁玲这一边的筹码,她怎么能和周扬比?”(邢小群:《丁玲与文学研究所的兴

衰》,页113、115)

对于直接领导文研所的中宣部和中国作协的领导人来说,上述过程中丁玲的种种表现,不是对抗党的领导是什么?从后来中宣部部长陆定一接到刘白羽和阮章竞的联名上报的康濯的材料后,不耽搁地上报中央并立刻命令周扬部署对丁玲的批判来说,丁玲的种种表现早已在他的视野范围之内了。

## 康濯勉为其难的角色

在当年的话语体制下,一个人被认定为对抗党的领导,此人的政治生命基本上就结束了。但何时对此人采取措施,采取怎样的方式结束他的政治生命,需要按照党内的一套运作体制来周密准备和布置。首先,要有合理合法的大环境,1955年全国批判胡风所引发的肃反运动,提供了这样的大环境。其次,最重要的是要寻找一个突破口。康濯的适时出现(不管是被动的还是主动的)或者说“起义”,对丁玲的批判就具有了重要地位。

在中宣部和中国作协领导人眼里,把康濯推出来作为批判丁玲、陈企霞的突破口,是再合适不过的人选了。前面说过,批判俞平伯的《红楼梦》研究》所引发的对《文艺报》的批判中,康濯成为检查和整顿《文艺报》专门检查小组的一员,又担任了《文艺报》编委,自然对《文艺报》的情况有所了解;而他又是文学研究所的主要创办人之一,与丁玲在一起工作三年多,文研所的事情可以说了如指掌。由他来写揭发信,丁玲担任两年主编的《文艺报》和担任三年多所长的文学研究所,就顺理成章地联系在一起了。

一直在第一线与丁玲这个实力派争夺权力并十分明了中宣部领导心思的刘白羽,岂能放过这个机会?

于是乎,此前周密准备的一套程序立刻运转起来了:康濯本来是在党组的谈话(或者说是在党组扩大会议上的讲话)就演变成揭发信了,接到康濯的揭发信后,刘白羽立刻找到阮章竞签名,甚至都不需要阮来看这个材料写的什么,就联名上报陆定一;陆定一接到刘、阮的上报材料后也不耽搁,立刻上报中央。7月25日报中央,8月3日就展开批判。这个速度,如果(下转10页)

# “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另一种解读

## ——从文明到文化的转向

• 子明

1995年初,笔者写了《梁启超与五四运动》一文,其宗旨之一就是切割(作为学生爱国运动和国民外交运动的)五四运动与“新文化运动”。本文的宗旨,则是在此基础上,对于“新文化运动”进行深入剖析。

### 五四没有“新文化运动”

“五四新文化运动”现在已经是一种司空见惯的说法,指的是“五四运动前后的新文化运动”。彭明在《五四运动史》中写道:“新文化运动的兴起以《新青年》杂志的创办为标志。《新青年》是在一九一五年九月创刊的。”周策纵在《五四运动:现代中国的思想革命》中认为,新文化运动始于“新知识界领导人1917年云集于《新青年》杂志和北京大学”。其实,一直到五四运动爆发,后来所谓“新文化运动”的发起者们,还不知道有这种运动。

1919年5月18日,5月4日北京学生游行刚刚过去两周,就有了“五四运动”的命名。而在1915年之后四年或者1917年之后两年,还没有“新文化运动”的说法。在五四运动之前,胡适、陈独秀等人的文章中多使用“文明”一词,而很少使用“文化”。当时喜欢谈论“文化”的是辜鸿铭这样的文化保守主义者和杜亚泉这样的文化调和主义者。在1919年底以前,有新文学运动的说法,也有新思潮运动的说法,还有胡适喜欢说的“中国文艺复兴运动”,就是没有“新文化运动”。

1919年12月1日,陈独秀在《新青年》一则“随感录”中提到“我们新文化运动”。同月,《新潮》杂志编者在答读者问的时候,也以“新文化运动”自命。1920年1月29日,孙中山在《致海外

国民党同志函》中说:“此种新文化运动在我国今日诚思想界空前之大变动。推原其始,不过由于出版界一二觉悟者从事提倡,遂至舆论界放大异彩,学潮弥漫全国,人皆激发天良,誓死为爱国之运动。”1920年3月20日,陈独秀在上海青年会25周年纪念会上以《新文化运动是什么》为题发表演说,其中提到“新文化运动这个名词现在很流行”。胡适在使用这个新名词上是持谨慎态度的,1920年9月17日,他在北京大学开学典礼上说:“十七省来的教员‘他们见面第一句就恭维我,说我是‘新文化运动’的领袖。我听了这话,真是‘惭愧无地’。因为我无论在何处,从来不曾敢说我做的是新文化运动。”“现在所谓新文化运动,实在说得痛快一点,就是新名词运动。”

“新文化运动”的忽然流行,并不仅仅是一种中国现象。1919年12月,蔡元培在《晨报》副刊上发表《文化运动不要忘了美育》一文,指出:“现在文化运动,已经由欧美各国传到中国了。解放呵!创造呵!新思潮呵!新生活呵!在各种周报上,已经数见不鲜了。”他一语道破天机:一战后欧美各国的“文化运动”传到中国,“新文化运动”便应运而生了,后者是前者所激起的一种涟漪。其间还经过一个思想中转站——日本。

### 世界范围的文化运动

“文明”与“文化”虽然在中国古文献中早已有之,其现代涵义却是由日本学者确立,分别用来移译西文中的civilization和culture,然后又由中国学者从日文中借用,作为新概念返回到中文。因此,要了解它们的确切涵义,必须先从西方文化中探其源头。

埃利亚斯指出:如果说“文明”概念是法国文化对人类的一种贡献,“文化”概念则更多地属于德国文化的贡献。要到18世纪末的德国,在赫尔德和他的同代人中,才能发现“文化”的现代用法。或许是康德最先将“文化”与“文明”表述为两个对立命题。1784年,他在《从世界公民的观点撰写世界通史的想法》一文中写道:“我们通过艺术和科学达到了很高的修养,我们太文明了,以至繁文缛节成了累赘”;“道德观念属于文化范畴”;“而这一思想的流行,只不过造就了那些追求名誉、追求表面的礼仪规范等所谓的德行,只不过推进了文明而已”。

埃利亚斯认为,当德国知识分子作为市民阶层代言人,大都还是“从世界公民的观点”来谈论问题的时候,“文明”与“文化”概念的对立首先是模糊地、仅在其第二层次的意义才涉及到民族问题,其表层意义所反映的则是一种社会内部的矛盾,这与法国的情况是类似的。但德国社会内部的矛盾以非常独特的方式孕育着民族问题的萌芽,即那些讲法语、按照法国模式“文明化”的德国宫廷贵族与讲德语、处于中等阶层的德国知识分子之间的矛盾。由于后者被远远地排斥在政治生活之外,因此他们不是在政治的范畴,而首先是胆怯地在民族的范畴里思考,他们本身的合法性和地位全部存在于他们的思想、科学和艺术成就之中。德国市民阶层的独特命运——政治上长期的软弱无力,民族长久的不统一等等,这种社会背景对“文化”概念在德国的形成过程中打下了影响深远的烙印。由于“文明的”和“文明”概念和法国人联系在一起,由于德国市民阶层不仅从反对宫廷贵族的斗争中证实自己,还进一步通过与其他与之竞争的民族划清界线

来证实自己,“文化”与“文明”这一对立概念的内容、意义与作用也随之发生了变化,从主要用于表现社会内部的对立发展为主要用于表现民族对立。洪堡写道,“在每一种语言中都包含着其特有的世界观”。赫尔德认为,地球上的所有民族都有自己独特的和不可替代的生存方式,它们“并没有相同的文化”。在德语中,人们用“文化”而不是“文明”来表现自我,来表现那种对自身特点及成就所感到的骄傲。在托马斯·曼看来,文化是自然的,真实的,因而也是德意志的,而文明则是异邦的,没有魂灵的,分裂的。

对于德国学者而言,“文化”概念首先强调的是一种差异性和区分性。虽然德国要向英法学习“文明”的政治与经济制度,但是这并不意味德国文化将会混同于异国文化,“德意志精神”是独一无二的,是贵族的德意志文化的本质特征。青年毛泽东曾赞美德国民族“为世界上最富于‘高’的精神的民族”,“最能排倒一切困苦,而惟求实现其所谓‘高’”,德国民族“有一种倔强的特质。一朝决裂,新剑发刃,几乎使全地球的人类都挡他不住”。其次,“文化”概念常常用来表述与“物质文明”相对而言的“精神文明”,即文明中最活跃、最富于创造性、最具有主观能动性的那一部分。埃利亚斯指出,德语中与“文明”相对立的“文化”概念在1919年以及这之前的几年里又重新活跃



“五四运动”中,北大示威游行队伍向天安门进发

起来,因为英法等国以“文明”的名义对德国进行了战争,而在凡尔赛和约以后所出现的新情况中,德国人必须重整自己的信心,用“文化”的力量来打败“文明”。

把“文明”一词引入了日语的,是被称为“日本伏尔泰”的福泽谕吉。他在《文明论概略》中写道:“所谓文明是指人的身体安乐,道德高尚,或者指衣食富足,品质高贵而说的。文明就是指人的安乐和精神的进步。但是,人的安乐和精神的进步是依靠人的智德而取得的。因此,归根结底,文明可以说是人类智德的进步。”他明确指出,日本的文明开化要“以西洋文明为目标”。在明治初期,日本人心目中的“西洋文明”,是以英法为楷模的。到了十九、二十世纪之交,新兴的德国取代英法,成为日本的指路明灯。1907年,相风御马在其所作早稻田大学校歌中写道:“将东西古今之文化潮流汇于一大岛国”,是在日本普及“文化”一词的开山之作。1919年,左右田喜一郎和桑本严翼先后以《文化主义之理》和《文化主义》为题发表演讲,正式倡导“文化主义”。左右田喜一郎认为,为了实现“文化价值”所进行的“所谓形而上学的努力”就是“文化主义”。桑本严翼则说,所谓“文化主义”就是要“使文化成为生活的中心的思想”。

一战以后,英法学界对于“十九世纪的文明”进行了深刻的自我反省,当时应邀来华讲学的罗素正是这一思潮的代表人物。德国、日本和苏俄的政府则或明或暗地推动了舆论界对于以英法为主要代表的“旧文明”的“文化批判运动”。在这样的世界大背景下,“新文化运动”在中国的兴起并迅速流行,就没有什么好奇怪的了。

## 两种“新文化运动”

林毓生认为,中国传统思想是一元论的和主观主义的,有一种根深抵固的、为儒家各派所公认的“藉思想文化以解决问题”的思想模式。清末民初中国知识分子的思想模式深受强调“政治—文化”是一元整体的传统文化影响,对思想变革的优先性深信不移。这种中国传统思想模式与新舶来的“文化运动”一拍即合,二者的混合物迅即成为“新文化运动”的思想资源。

如同宋明以后的“新儒学”分为“朱学”与“王学”二支,也如同一战以后反(英法)文明的文化运动分为“右翼”(德、日)和“左翼”(苏俄)二支,打着“新文化运动”旗号的,其实也有两种不同的文化运动。一种是以孙中山为代表的“新”文化运动,一种是以陈独秀为代表的“新文化”运动。

孙中山称赞“新文化运动”,着眼点并不在于“新文化”,而在于“文化运动”对于“革命”事业的价值。他看到“社会遂蒙绝大之影响。虽以顽劣之伪政府,犹且不敢撻其锋。”因而感叹:“倘能继长增高,其将来收效之伟大且久远者,可无疑也。吾党欲收革命之成功,必有赖于思想之变化。兵法攻心,语曰革心,皆此之故。故此种新文化运动实为最有价值之事。”思想的力量可以顶得上毛瑟枪,这是孙中山的一个新感悟。

五四前夕,孙中山正处于其政治生涯的低谷。新文学运动和五四运动在全国的巨大反响,激励孙中山重新诠释三民主义。此前,孙中山在1912年至1913年间曾把三民主义缩减为一民主义:“民族、民权二大主义均已达到目的,民生主义不难以平和办法,逐渐促社会之改良。”二次革命后,孙中山在中华革命党成立大会上公布手书的《中华革命党总章》,规定“以实行民权、民生两主义为宗旨”,仍然没有民族主义的位置。而在1920年代初期孙中山阐发的新三民主义中,反帝民族主义成为中心论旨。如果说“驱逐鞑虏”的革命宣传是孙中山的“旧”文化运动,“反对帝国主义”的意识形态鼓吹就是他的“新”文化运动。

孙中山说:“我们要挽救这种危亡,便要提倡民族主义,用民族精神来救国。民族主义这个东西,是国家图发达和种族图生存的宝贝。昨天有一位俄国人说,列宁为什么受世界列强的攻击呢?因为他敢说一句话,他说:世界上有两种人,一种是十二万万五千万人,一种是二万万五千万人,这十二万万五千万人,是受那二万万五千万人的压迫。列强因为恐怕我们有了这种思想,所以便生出一种似是似非的道理,主张世界主义来煽惑我们。说世界的文明要进步,人类的眼光要远大,民族主义过于狭隘,太不适宜,所以应该提倡世界主义。近日中国的新青年,主张新文化,反对民族主义,就是被这种道理所诱惑。”

孙中山牌号的“新”文化运动,是沿着德日学

者、辜鸿铭、杜亚泉、一战后的梁启超、梁漱溟这条线索而来,是从“世界主义”、“欧化”向“中体西用”的回归。他说:“我们现在要学欧洲,是要学中国没有的东西。中国没有的东西是科学,不是政治哲学。至于讲到政治哲学的真谛,欧洲人还要求之于中国,诸君都知道世界上学问最好的是德国,但是现在德国研究学问的人,还要研究中国的哲学,甚至于研究印度的佛理,去补救他们科学之偏。”这番话明显是受到梁启超和梁漱溟言论的影响。

晚年孙中山,愈来愈肯定中国的旧传统、旧道德,同时明确否定《新青年》所鼓吹的“新文化”——自由主义、世界主义。他的“新”文化运动,一方面与德日、中东、南亚的文化保守主义和文化复兴运动合拍,另一方面又登上了第三国际“反对帝国主义”的战车。胡适回忆1920年代历史时说:“孙中山先生屡次说起鲍洛庭同志劝他特别注重民族主义的策略,……十四年到十六年的国民革命大胜利,不能不说是民族主义的旗帜的大胜利”。所以戴季陶在挽联中如此评价孙中山:“继往开来,道统直承孔子;吊民伐罪,功业并美列宁。”这种“戴季陶主义”(“列宁—孔子主义”),可以说是几十年后的“毛泽东主义”(“斯大林—秦始皇主义”)的先声。

在“反对帝国主义”的政治路线上,陈独秀与孙中山是盟友,同为列宁的门徒;在对“新文化运动”的诠释上,二者则是“针尖对麦芒”,一个是向后退缩的文化运动,一个是向前跃进的文化运动。在笔者看来,陈独秀牌号“新文化”运动中的“新”,不是形容词,而是动词。当陈独秀提出“新文化运动”这个新名词的时候,他已经与曾经共同鼓吹“新思潮”的《新青年》伙伴分道扬镳。他自己在几年前热情赞美的“人权论”等“新文明”,此时已经成为不屑一顾的“旧文化”。不断革新,追求最新,这是一种“文化革命”的姿态。

当时胡适、梁启超、蔡元培等人,按照英美学者(主要是人类学家)的惯习,将文化与文明这两个概念的用法,逐渐混同起来。但是这不符合“文化革命”论者的需要。陈独秀反对“几位顶呱呱的中国头等学者”“这样说”,“把政治、实业、交通,都拉到文化里面了。我不知道他们因为何种心理看得文化如此广泛至于无所不包?”“文化是对军

事、政治(是指实际政治而言,至于政治哲学仍应该归到文化)、产业而言,……文化底内容,是包含着科学、宗教、道德、美术、文学、音乐这几样”。“大文化”概念利于守成,“小文化”概念利于革新。“新文化运动要注重创造的精神。创造就是进化,世界上不断的进化只是不断的创造,离开创造便没有进化了。我们不但对于旧文化不满足,对于新文化也要不满足才好;不但对于东方文化不满足,对于西洋文化也要不满足才好;不满足才有创造的余地,我们尽可前无古人,却不可后无来者;我们固然希望我们胜过我们的父亲,我们更希望我们不如我们的儿子。”在陈独秀看来,伦理道德和文化的觉悟是最后的觉悟。这种觉悟可以脱离政治、经济、社会的羁绊而独立发生,而且能够反过来影响和改造前者。他说:“新文化运动要影响到别的运动上面。新文化运动影响到军事上,最好能令战争止住;其次也要叫他做新文化运动底朋友,不是敌人。新文化运动影响到产业上,应该令劳动者觉悟他们自己的地位,令资本家要把劳动者当做同类的‘人’看待,不要当做机器、牛马、奴隶看待。新文化运动影响到政治上,是要创造新的政治理想,不要受现实政治底羁绊。譬如中国底现实政治,什么护法,什么统一,都是一班没有饭吃的无聊政客在那里造谣生事,和人民生活、政治理想都无关系,不过是各派的政客拥着各派的军人争权夺利,好像狗争骨头一般罢了。他们的争夺是狗的运动。新文化运动是人的运动,我们只应该拿人的运动来轰散那狗的运动,不应该抛弃我们人的运动去加入他们狗的运动!”这种文化、意识形态能动性和创造性的理念,在尼采那里达到一个高峰,在列宁那里达到一个新高峰,后来又被葛兰西发扬光大。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是战无不胜的“精神原子弹”,这是文革期间的流行话语。

几年前还被陈独秀高度重视的东西文明(文化)比较,现在已经被“新文化”运动抛在脑后。“新”的崇拜追求的就是日新月异、“今日之我否定昨日之我”。自认为掌握了历史唯物主义的社会进化论这一最新武器的陈独秀说了,对于新旧文化、东西文化都要“不满足”。瞿秋白说得更明白:“东西文化的差异,其实不过是时间上的”,“西方文化,现已经资本主义而至帝国主义,而东

方文化还停滞于宗法社会及封建制度之间。”二者均已过时，“新文化”运动的新偶像是当时尚未最终成型(因而对于全球知识分子保有一种令人兴奋的“神秘感”的)“无产阶级文化”、“社会主义文化”、“苏维埃文化”。

在充分了解孙中山的“新”文化运动和陈独秀的“新文化”运动之后,才可能摆正鲁迅和胡适在当时中国思想界的位置。

毛泽东说:鲁迅是中国文化革命的主将。在1980年代,颇有一些人想要摘掉鲁迅这个“主将”的帽子。现在看来,毛泽东对于鲁迅的评价并没有错。孙中山也好,陈独秀也好,在鼓吹“新文化运动”之前,都曾经是“西洋文明”的崇拜者,鲁迅则否。他在1907年的《文化偏至论》中写道:“彼所谓新文明者,举而纳之中国,而此迁流偏至之物,已陈旧于殊方者,馨香顶礼,吾又何为若是其芒芒哉!是何也?曰物质也,众数也,其道偏至。”笔者在《中国沉思——鲁迅读本》(内蒙古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的“老愚评注”中指出:“对于民主,鲁迅则毕生没有讲过一句好话。《文化偏至论》称:‘必借众以陵寡,托言众治,压制乃尤烈于暴君’;‘呜呼,古之临民者,一独夫也;由今之道,且顿变而为千万无赖之尤,民不堪命矣,于兴国究何与焉’。民主制度的建立,在西方是有其‘不得已’,若‘横取而施之中国则非也’;更何况即使成功引进,在西方却已成过时之物,‘使中国之人,由旧梦而入于新梦,冲决嚣叫,状犹狂醒。夫方贱古尊新,而所得既非新,又至偏而至伪,且复横决,浩乎难收,则一国之悲哀亦大矣。’”鲁迅力主以“二十世纪之新精神”来“立人”,必“与十九世纪之文明异趣”,“以反动破坏充其精神,以获新生为其希望,专向旧有之文明,而加之击扫荡焉”,“其将来之结果若何,盖未可以率测”。从尼采的“超人”到鲁迅的“立人”再到毛泽东的“社会主义新人”,构成一个完整的思想链条。陈独秀是“十九世纪之文明(或旧有之文明)”营垒的一员叛将,在同样从早年就推崇德意志文化的毛泽东看来,自然没有资格与鲁迅争夺“文化革命”的“主将”位置。

在1920年代,胡适不愿意承认自己是“‘新文化运动’的领袖”,显然是要与孙中山的“新”文化运动和陈独秀的“新文化”运动划清界限。胡适

多次强调“新思潮(或称中国文艺复兴运动)”的四重意义:“研究问题,输入学理,整理国故,再造文明”。他说:“通过严肃分析我们所面临的活生生问题,通过由输入的新学理、新观念、新思想来帮助我们了解和解决这些问题,同时通过以相同的批判的态度对我国固有文明的了解和重建,我们这一运动的结果,就会产生一个新的文明来。”“文明不是笼统造成的,是一点一滴的造成的。进化不是一晚上笼统进化的,是一点一滴的进化的。现今的人爱谈‘解放与改造’,须知解放不是笼统解放,改造也不是笼统改造。解放是这个那个制度的解放,这种那种思想的解放,这个那个人的解放,都是一点一滴的解放。改造是这个那个制度的改造,这种那种思想的改造,这个那个人的改造,是一点一滴的改造。再造文明的下手工夫,是这个那个问题的研究。再造文明的进行,是这个那个问题的解决。”当时胡适是两面作战,他既反对以“文化复兴”的名义来为专制独裁寻找新的借口,也反对以“文化革命”的心态来一古脑地“砸烂旧文明,创建新世界”。事实上,直到1930年代国民党当权者公开批判“新文化运动”之后,他才认领了已经被孙中山和陈独秀的政治继承人所抛弃的思想“弃儿”。此时的胡适说:“无疑的,民国六七年北京大学所提倡的新文化运动,无论形式上如何五花八门,意义上只是思想的解放与个人的解放。”

## 从抗拒文明到回归主流文明

胡适在1930年代的一篇日记中提出了一种现代思想的分期法:“(一)维多利亚思想时代,从梁任公到《新青年》,多是侧重个人的解放。(二)集体主义时代,1923年以后,其沦为民族主义运动,共产革命运动,皆属于这个反个人主义的倾向。”前一个思想时代的代表是梁启超、蔡元培、陈独秀、胡适;后一个思想时代的代表是孙中山、戴季陶、蒋介石、陈独秀、瞿秋白、毛泽东,五四以后梁启超本人的思想转变,也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胡适在1933年指出:“在三十年前,主张‘维新’的人,即是当日主张现代化的人,对于所谓‘新’,决没有我们今日这样的迟疑与矛盾。当日

虽然也有君主立宪与民主共和的争论,但在他们的想象中的西洋文明,却没有多大的疑义。试读梁任公先生的《新民说》,他那样热烈提倡的新民的新德性,如独立、自由、自治、自尊、自立、冒险、进步、尚武、爱国、权利思想,……无一不项不是那十九世纪的安格鲁撒克逊民族最自夸的德性。那时代的中国知识界的理想的西洋文明,只是所谓维多利亚时代的西欧文明,精神是爱自由的个人主义,生产方法是私人资本主义,政治组织是英国遗风的代议政治。当时的知识领袖对于西洋文明的认识本来还没有多大异议,所以当时能有梁先生那样热烈的、专一的信仰崇拜。”在1930年代,国民党人鼓吹“新生活运动”,共产党人鼓吹“新启蒙运动”,矛头都是针对“所谓维多利亚时代的西欧文明”,或者说“民国六七年北京大学所提倡的新文化运动”。

抗拒文明的“文化革命”,到毛泽东晚年达到了顶峰,随后迅速地跌入低谷。当今,孙中山牌号的“新”文化运动已经取代陈独秀牌号“新文化”运动,成为看家护院的宝贝。

“五四”之后最重要的历史转折点是“四五”。四五运动之后,冷落已久的“文明”,以“现代化”为中介,重新回到了思想政治舞台的中心。从“四个现代化”到“市场经济”、“私有财产”、“人权”入宪,到“与国际接轨”、“实现一个更加繁荣、稳定、安全和均衡的世界”,无不表明代表了人类进化结晶的维多利亚时代的文明正在卷土重来。

邓小平的功绩,是将毛泽东时代中国这个远远偏离人类文明主流的国家,纳入了文明的进程,确定了中国人发展的方向应与人类文明的主流相一致。虽然出现过严重的波折与倒退,但是回归主流文明的大方向仍然没有改变。

十年前,笔者在《世界文明中的中国文化》中指出:最初具有很强排他性的“文明世界”,随着文明的扩张、碰撞与融合,正在形成全球性的“世界文明”,原来一直独立存在与自主发展的“中国文明”,由于其制度特殊性的逐渐减少乃至消失,由于其不再继续是权力结构与文化认同的最高层级,正在向“世界文明中的中国文化”转化,而随着中国社会的现代化与后现代进程以及承认政治的兴起,文化整合逐渐让位于文化分化,大一统的中国文化日益显现出由地方性文化与各

种亚文化拼凑起来的文化马赛克形象。人们必须在“文明向上发展,文化向下发展”这个时代大背景下,来认识什么是世界文明,什么是中国文化。

20世纪的历史证明,“欲速则不达”,赶超型的德意日、苏联东欧现代化模式(即右翼和左翼的世界“新文化运动”)最终还是要回过头来补上自由民主这一课,向以英美法为代表的文明主流模式回归。其实,“融入文明主流”的说法可以进一步简化为“融入文明”。“文明”最初用法就是指以“有礼貌”的市民的生活方式来改造“野蛮”的乡下人,是西欧国家城市化的产物。选择“融入文明”,就是要通过城市化的道路迈向“社会的时代”,从“差序共同体”向个人与社团相对、多元一体的“社会”转型,从“头目们”可以自由解释的“默认一致”转变为“契约必须遵守”的法治社会与“学者共和国”为主体的公众舆论。胡适一贯反对赶时髦,诸如“迎头赶上”之类,而主张踏踏实实地前进。他在1930年代曾说:“我们此时还没有法子寻得一个‘形成之现代’做我们现代化的目标。我们至多只能指着一个‘正在萌芽的社会化’做我们的理想境界。”

在滕尼斯所谓“社会的时代”,世界城市是社会的最高形态,世界主义的生活是生活方式的最高层次。世界城市本身不仅包含着一个民族的社会精粹,而且也包含着一种各民族的整体即“世界”的精粹。世界城市能够为整个地球生产商品和科学,为一切民族制订适用的法律和制造公众舆论,它就是世界市场和世界交往。世界城市就是世界文明,也就是全球社会。前联邦德国总理、社会党国际主席勃兰特在其主持的关于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经济关系研究的报告中指出:国际社会已出现了一种新的认识的苗头,即认为人类正在成为一个统一的社会,因此,“我们的目的应该是实现一个建立在契约而不是地位、协商一致而不是强制基础上的全球社会。”新加坡前总理吴作栋也说:“我们别无选择,世界正变得越来越小,如果新加坡未来要想在新经济、新世界中立于不败之地,就必须欣然接受世界文明。我们欢迎全球化和信息技术革命,我们知道,它们带来的机遇要高于使我们付出的代价。”这一论断也完全适用于中国及其文化。 2009.6.29

(责任编辑 徐庆全)

# 民主与专制的百年迷途

● 邵 建

自《新青年》声张民主与科学，“民主”一词业已形成国人的世纪情结。此一情结，由于历史和现实的原因，至今依然有增无减。但《新青年》所倡导的民主导向是有问题的，它把专制作为自己的对立面，却忽略了民主自身亦有走向专制的可能。此一可能对于20世纪来说，业已成为历史。问题是，由此导致的历史苦果，至今并未使得参与这一历史构成的人所明白，当然也包括长期以来的我们。

1999年，比五四还年长两岁的李锐先生为纪念五四80周年，著文《又谈德先生》。该文的立论是：“民主的对立面是专制”。是的，把民主和专制对立起来，乃是当年《新青年》的作业；以民主反专制，更是由《新青年》发变而成的历史走向。在这一历史洪流中，无数的知识青年走上了以反专制为诉求的民主革命的道路。结果，一个世纪下来，当五四90周年时，我们依然没有走出《新青年》的历史格局，依然在这一格局中千呼万唤“德先生”，依然希图借五四之力，还民主之魂，驱专制之鬼。既如此，这个“德先生”就不仅是一种世纪情结了，更是一种我们到今天也未化解开的“世纪症结”。

解开这一症结，我以为，当把历史推到《新青年》之前，回到梁启超那个时代的公民常识和政治常识。1915年6月，亦即《新青年》诞生的前三个月，商务印书馆为中学生推出了一本类似公民教科书的《法制概要》。在介绍“国家”问题时，教材紧扣“国体”与“政体”而展开。这样的介绍框架、思路和内容，主要来自辛亥革命前的梁启超亦即包括他在内的立宪派。梁氏的思想作为法制常识普及给中学生，但它显然不如后起的《新青年》那样喧嚣夺人。在《新青年》看来，推翻专制，靠的是民主。因此它呼唤“直接行动”的国民运动乃至国民革命。但梁启超至少在辛亥前就指出，民主本身即有走向专制的可能，尤其是它需要用暴力革命的方式来实现时。

根据梁氏的立宪派，国家政治权力可以从两个角度去表述，如果国体用以表述“权力属于谁”，政体表述的则是“权力如何用（或：权力运用的表现形式）”。就国体而言，当时世界上的国家一般来说有两种，一是“主权在君”的君主国，如俄国、中国；一是“主权在民”的民主国，如美国、法国。转就政体言，也有两种形式，即专制与立宪。专制政体在权力运用上是权力者对于政权的全部垄断，立宪不然，它是打破垄断，把政权分解为立法权、行政权和司法权，并且它们俱受宪法制约。如果以这样的政治构成来看，《新青年》的“民主与专制”就不是对立的观念，它们不在一个范畴。真正和“民主”对立的是“君主”而不是“专制”，正如和“专制”对立的是“立宪”而不是君主。这就意味着作为国体概念的民主除了与君主对立外，它和政体范畴中的“专制与立宪”没有必然的联系因而也没有必然的对立，亦即它同时具有立宪和专制的两种可能。至于“民主的对立面是专制”，是由《新青年》导出的一个政治学误区，它直到今天还让我们认为：民主与专制势不两立，只要实现民主，专制就不复存在。

这不妨是一个逻辑矩阵，它上面两只角是国体中的“君主”与“民主”，下面两只角是政体中的“专制”与“立宪”。这四只角可以构成国体与政体间的逻辑交叉有四种。君主国体既可以是专制政体，即君主专制（如俄国）；也可以是立宪政体，即君主立宪（如英国）。同样，民主国体也可以既是立宪政体，即民主立宪（如美国），又可以是专制政体，即民主专制（如纳粹德国）。美、德同为民主国，如果美国的民主在制度上具有立宪性；纳粹虽凭选票上台，但，它的民主不是立宪民主而是专制民主。由于权力俱在希特勒之手，因此，这样的专制可称“民主专制”。“民主专制”这个词，我个人以为是梁启超的独特贡献，据我自己的阅读，它也许最

早出现在1906年的《开明专制论》中。当近世学者大都认为国家形态大略有民主立宪、君主立宪和君主专制时,梁启超独辟蹊径地指出:“专制者不独君主国,而民主国亦有非立宪者(有立宪之名,无立宪之实,则等于非立宪)。”非立宪的政体即专制政体。当一个国家获得民主后,如果权力运作没有做到法治意义上的“限权”与“分权”,它就是专制政体。有意味的是,如果考查20世纪方始出现的新型专制即“极权主义专制”,可以看到,无论是左的极权如前苏俄,还是右的极权如希特勒,俱出自号称民主的国家,而无一例是君主国。

一个世纪以来,国人如此痛恨专制,却不知道,在反专制的道路上,至少有立宪和民主两种不同的方式。比较之下,立宪的方式是改良,它不触动国体;民主的方式必须改变国体,因而是革命。革命的问题在于,革命者很难在成功之后做到自我立宪。当然,有这样一种理论,认为国体决定政体,比如君主必然专制,民主必然反专制。其实不然,解决国体问题,无以保证同时解决政体问题。倒是反过来,从政体问题入手,最后则必然触动国体的根基。以英国为例,保留君主的名分和权力,但条件是必须以议会限制君权。结果,看起来,国体未变,但,立宪之下,君就成了“虚君”,权却掌握在民的手里。梁启超将此称为无革命之名有革命之实,即形式上依然保持君的地位,但制度的性质却发生了革命性的变化。由此可见,只要走上立宪的道路,民主其实是迟早的事。但这个命题不能反过来,即只要是民主,就一定走向反专制或非专制。专制与否,只在立宪与否。如果立宪的根本是限权,那些经过疾风暴雨般的革命从而获致权力的民主国家,依其惯性,权力只会更放纵,却无以反身自噬。当年,梁启超言及“民主的专制国家”时,举例就是英国革命后的克伦威尔政权和法国革命后的罗伯斯庇尔政权。待至后来苏俄出现,所谓革命不过是更换了权力者,权力的性质却没有变。甚至,和当年君主的权力相比,布党的权力远远地超过它,直接垄断社会的一切。这样的民主,声称主权在民,但因为没立宪,民便成了“虚民”(这个词是我的一位朋友的说法,很准确)。

这样就可以看出梁启超的高明。辛亥革命前,他一人于《新民丛报》上和孙党往复辩论,力反革命而坚挺立宪。梁启超除了担心国体变更而于政

体无补外,按照一位日本学者的看法(佐藤慎一),梁启超的忧虑还在于“民主专制比君主专制更加危险”。“因为在民主专制下,由政治家煽动操纵的民意肆意地用暴力破坏既存的社会秩序而创造出无秩序状态,而且可以以民意为名使其正当化。”(《近代中国的知识分子与文明》)从后来的历史看,梁启超的担心一概变成了现实。

这是晚清革命党和立宪党的不同,革命党的革命首先是推翻满清(三民主义第一条就是排满的民族主义,梁启超将此称之为“种族革命”),而梁启超的立宪党才是和种族革命相对应的政治革命的反专制。在反专制的路径上,梁氏坚持认为政体比国体更重要,换言之,则立宪比民主更重要。用民主反专制,却可能走向专制,甚至是极权式的专制;但用立宪反专制,专制则无遁身之余地(哪怕国权仍然象征性地在君主之手)。梁启超明察如此。然而,在精神影响上,主导20世纪的,不是梁启超,而是《新青年》(亦即不是政体的改革,而是国体的革命)。北洋以后的中国历史是沿着《新青年》的方向延伸的,梁启超早已被历史边缘化,尽管他对历史的未来有着惊人的洞见。

“民主的对立面是专制”,业已构成一个百年迷途,我们至今尚未知返。如果《新青年》为其首途,那么,在政治学的识见上,《新青年》及其时代,委实是梁启超时代的倒退。当年,梁启超们解决了的问题,《新青年》却又把它搅混了。《新青年》的政治误区在于,北洋时代并不是专制时代,尽管有袁世凯、段祺瑞等人的独断专行,但这种擅权不是制度意义上的专制。《新青年》鼓吹民主,发起国民运动,后来更发展为推翻北洋的国民革命。那些读着《新青年》的青年们纷纷南下,投入国民革命的洪流,结果,非专制的北洋给推翻了,迎来的却是货真价实的专制(国民党一党专制)。然而,历史并不到此为止,国民党专制只是20世纪中国专制的一个驿站。受五四精神影响,一代又一代的年轻人走上了历史舞台,他们“踵其事而增华,变其本而加厉”,为反国民党专制,从事新民主主义革命,抛头颅洒热血。于是,种瓜得瓜,1949年,历史终于迎来了“Totalitarian society”中的另一种政体,这就是毛泽东称谓的“人民民主专政”,至今它依然悬在我们的宪法上。

(责任编辑 吴思)

# 我所了解的台湾农地改革

· 匡萃坚

1988年下半年,台湾当局开放大陆同胞赴台探亲。我以探望年逾八旬且行动困难的父亲为由,申请赴台;次年7月办妥一切手续,8月持中华人民共和国《往来港澳通行证》经香港抵达台湾。

赴台之前,我在高校从事中国现代历史的教学与科研工作20多年,知道台湾50年代成功地进行过土地改革,从根本上稳定了台湾局势,并对台湾经济起飞发挥了基础性作用,但对其了解不多、不具体,并存在许多疑问,因而有进一步探究的愿望。这样,抵台之后,我便利用和亲人团聚、畅叙情谊之余,赴有关研究机构、图书馆和农家进行查询、采访和观察,历时三个月。

我首先访问的是台湾地政研究所。这是台湾一所研究土地问题、推进土地政策、发展地政教育的最高学府。它1940年创办于重庆,招收大学毕业生,修业及研究期限二年。1963年在台湾恢复招生。1964年与中兴大学合作办理硕士班,1968年起改与政治大学合作,1981年起增设博士班。其创办人肖铮,曾为国民党六届中常委,经济专门委员会副主任委员,赴台后一直参与指导土地改革运动,被人尊称为“台湾土地改革之父”。我去拜访时,他已85岁高龄,可依然坚持到研究所上班。他热情接待了我,送了我几本他自己撰写的大部头著作,后又委托政治大学一位教授陪同我在所里考察。按肖老嘱咐,研究所的同仁为我取来了所内出版的两套杂志:《土地与人》、《地政论坛》;有些无法提供的资料,则帮助我在所内复印。以后,我凭“通行证”十余次赴台北图书馆查阅相关书刊并予以复印。在此基础上,再加本人平日和亲人、同乡前辈的零星交谈以及赴农家的观察,对于台湾50年代的土地改革获得了一些新的认识。

通常所说的台湾土地改革,实际讲的只是农村土地关系的变革,即仅仅是“农地改革”。严格地说,台湾的土地改革包括三个过程,一是农地改革——改革农村的封建土地制度,二是市地改革——改革城市的土地关系,三是土地重划——在更高阶段上的土地关系改革。如果说其50年代的农地改革是成功的,那么,市地改革和土地重划则问题多多。

(一)国民党50年代为什么能在台湾进行农地改革?

一是在大陆的惨败,使其领悟到解决土地问题的极端重要性。

国民党历来代表地主阶级利益,在大陆的数十年间,对于孙中山的“平均地权”纲领和“耕者有其田”口号,除为数不多的学人作过些学理的探讨,个别地区搞过点小型试验之外,在其领导层少有问津者。败退台湾之后,之所以取断然措施实行土改,可说是形势使然——既系被迫而为,也是顺应之举。

这时,国民党上层除个别人士外,较为普遍地清醒了起来,认识到在大陆的溃败不只是军事上的失败,更是政治上的失败,尤其是在农民政策和土地政策上的失败。用陈诚的话说就是,共产党不仅“巧妙地欺骗了学生”,还“成功地利用了农民”。就是说根本的问题在于,共产党发动农民搞了土改,而国民党拒绝土改。有的更以中国历史上治乱兴替的严酷事实为训,呼吁当局以史为鉴,面对现实,抓紧推行土改。<sup>注1</sup>美国学者也注意到,“40年代末,台湾政界人士从中国大陆所得到的教训是不少的。……许多人认为国民党政府与大陆对抗失败的原因是,国民党政府从未进行过全面的土地

改革。”<sup>注2</sup>在国民党高层中,陈诚是少数几个清醒最早、决心最大者之一。上个世纪50年代台湾的农地改革,就一直为他所主持。

二是台湾尖锐的社会矛盾,使其深感解决土地问题的迫切性。

“四十年代末的台湾几乎山穷水尽,一筹莫展。”<sup>注3</sup>陈诚写道:“时大陆局势日益恶化,台湾人心浮动,经济混乱,社会不安,随时有发生变乱之虞”;尤其是“农村不安现象,已极显著。大有‘一夫夜呼,乱者四应’之势”。他以为,求安定的根本之计在于解决民生问题,实行土地改革。当时的台湾地租极高,高利贷横行,佃农几无佃权,加上其他役使,这“重重压榨,几使佃农生活陷于绝境”。<sup>注4</sup>肖铮后来回顾说,当时“地主与佃农间不断发生纠纷,彼此利害冲突日趋严重,在农村中已造成普遍不安之现象。如不予遏制,势将危及社会之安定。”<sup>注5</sup>

当时还面临一个尖锐的实际问题:国民党军政人员及随同来台者为数众多,使台湾人口猛增200余万,达1/3,粮食供给问题由此十分突出;若靠进口,由于财政拮据,显然无力支付;因而只能靠调整土地关系,发展农业生产。

农地改革有什么好处?有位学者用外国人的话作出回答:“对真正的农民有经济上的好处,对国民党有政治上的好处。”他本人更认为,这既是“防堵中共的‘土改’攻势的应急之需”,也是“拯救危机、保卫台湾的必行政策”。<sup>注6</sup>

三是与台湾的土地没有瓜葛,为其消除了解决台湾土地问题的阻力。

国民党官员在大陆,本人就多系地主,对于土地改革的鼓吹和试验,多持反对态度;被扫地出门来到台湾,则一概已无尺寸之地,因而对台湾的农地改革能持较为超脱的态度。诚如外国学者所言:“因为迁台的政府与当地精英没有什么渊源,乃用以放手施行”。<sup>注7</sup>在台湾常有人打趣:“台湾的土地改革是大陆人慷他人之慨”。<sup>注8</sup>正因为有此一层,国民党当局在作出这一决策时就不会感觉特别困难,能表现出前所未有的果断。

四是国际的影响和压力,向其展示了解决土地问题的出路和前景。

农地改革从法国大革命以来推行了近200年,战后则几成时代潮流。尤其日本,战后在美国

占领下实行了较为彻底的土地改革,从1946—1950年内使所有的佃农都变成自耕农,以往盛行的不在地主的土地制度被清扫一空,促进了农业的发展,拯救了面临崩溃的经济。这为台湾提供了有益的经验。朝鲜战争爆发后,美国对台湾从抛弃转为利用,对其土改不断施加影响,透过头面人物予以督促,并通过美援机构农复会提供专家、顾问、资金等援助。当时农复会的主持人蒋梦麟对台湾土改的决策便发挥了重要作用。

## (二)台湾农地改革的进程

台湾农地改革大体分为三个阶段。

### 一、耕地三七五减租

1949年4月公布《私有耕地租用办法》,实行“耕地三七五减租”。其内容包括两个方面:一为减租,二为护佃。即一方面将租率限制在接近平均利润率的水平上,最高租额不得超过375‰;另一重要方面是保障佃权,实行书面契约,规定最短租期为6年,限制撤佃退耕。具体说就是:以主要作物正产品全年收获量为准,限定农地地租额,其约定超过者应减,不及者依其约定。所谓“主要作物”,指当地最为普遍的作物。所谓“正产品”指作物的主要产品,水田为稻谷,旱田为甘薯。所谓“全年收获量”,系各地斟酌实际情形报省核定的单位面积产量。4月至8月完成换约手续,随即举行大规模的实地检查,以纠正错误,取缔违法事件。1950年6月公布《耕地三七五减租条例》为之作出各项明确规定,借以提供强有力的法律保障。为示业佃关系之公平合理,是年还进行了地目等则的调整。1951年3月建立“耕地三七五减租”督导制度,分区派官督察辅导,防止业佃纠纷。1952年全省普遍成立县市与乡镇的耕地租佃委员会,由地主、佃农及自耕农按民主方式分别选出代表组成,共同处理有关租佃事宜。

作为农地改革的一个组成部分,“耕地三七五减租”的实质就是全面改革现有的不合理的租佃关系,变封建租佃制为自由契约的租佃制。有人认为,称之为“三七五减租”名实不符,确切的名称应为“租佃关系改革”。我以为,叫“三七五减租”突出“减租”也有道理,因为租额问题是业佃双方利益的集结点,租佃纠纷(如撤佃等)多由此引起,最令业佃关注的也是减租问题。还有人认

为,与历史上所提的“二五减租”比,“三七五减租”并不确切。因为“三七五”是地主所得的比率,即最高租率,实际是限租;“二五”才是租额减收的比率,称之为减租才名副其实。这有道理。不过,“三七五减租”跟原租率比也是减少了,所以名之为“减租”也过得去。

按 375% 的租率限租,租额是低了,还是高了?这不能一概而论。德国土地改革倡导者达马熙克曾说过,“375% 的地租实在太高了”。例如,日本战前的地租平均为 32%,战后农地改革中则限制为 25%。但他接着说,“这也许是中国的特殊情形”。<sup>注 9</sup> 的确如此。台湾之所以采取 375% 这种较高的租率,究其原因,一是从历史上看,中国历来租额偏高。历史上发动租佃关系改革的口号是“二五减租”,这样在对半租的基础上地主所得便是 375%。而实际流行的却常常是二八租(佃二业八),经二五减租,地主所得则是 60%,远高于 37.5%。二从现实上看,当时的台湾封建关系在农村居统治地位,地主阶级握有政治和经济垄断权,加上高利贷横行,地租水平一直居高难下,全省平均为 568%,其中,台中县竟高达 590%。三从政治上考虑,为了缓和业佃矛盾,稳定农村秩序,既要改善广大佃农的地位,又要兼顾地主的生活,惟有采取调和折中的办法,这就使提高者不急剧跃升,下降者又不骤然猛降。这样以尽管较高、但确已降低的 375% 为限,就可谓适得其中。

还有个技术性问题,在市场发育不全,难以颁行法定地价的条件下,地租只能按耕地正产物的年收获量计算。这就需要确定一个划一的标准收获量,若按实际收获量计算则将导致无休止的纷争,由此就需要拥有完备的地籍资料。台湾从日据时代起有地政工作的基础,有按不同等则土地确定标准收获量的传统,是以“耕地三七五减租”得以顺利推行。

通过“耕地三七五减租”,地租额虽然仍较高,但一是佃农得到了较为合理的耕作与经营收入,生活有保障,且有积蓄,用以维持和扩大再生产。二是维护了佃权,保障了佃农自由耕作的条件。三是计算地租额的标准产量固定,随着农业生产的发展,地租率实际就在不断下降,从而为农业的发展创造了条件。统计表明,从 1949 年至

1951 年,农业生产的单位生产量与总产量平均增加 25% 以上,佃农收入平均增加 30%;与此同时,地价亦下跌,1949 年 12 月与 1948 年 12 月相比,水田平均跌 19.4%,旱田平均跌 42.3%;加上农村社会日趋安定与繁荣,就为农地改革的进一步推行打下了基础。但是,在“耕地三七五减租”执行中,也有不少问题存在,尤其是地主因减租而撤佃升租事件“层出不穷”,“事态相当严重”。<sup>注 10</sup>

## 二、公地放领

这是从台湾情况出发的一种特殊安排。公地来自于没收日据时期的总督府所有地、军事用地、日人移民持有地、社团有地等,共计 18 万甲,占全省耕地 21%。在日据时期这些耕地多为地方豪绅、大企业、卸职官吏包揽,转租给农民。光复后,当局将这些耕地多数放租,也有自己经营的(如台糖公司)。由于租率较轻,出现转佃分租现象。“公地放领”即将这些公地,除必须保留者外,直接出售给承租的现耕农民。出售的地价按主要作物正产品全年收获总量的二倍半计算,分十年平均偿还。农民交付第一期地价后取得公地承领证书,交清地价后,换取土地所有权状,从而实现以“耕地农有制”替代“国家租佃制”。

为了配合“耕地有其田”政策的推行,着眼于“扶植自耕农”,在“公地放领”中确定每户农民承领面积的标准为,水田 5 分至 2 甲,或旱地 1 甲至 4 甲。“公地放领”,从 1948 年开始试办,1952 年积极推行,至 1953 年已放领耕地累计 6.3 万余甲,占公地的 1/3,至 1961 年放领耕地面积达 90.5%。这样台湾农民的土地问题就在相当程度上获得了解决。

通过“公地放领”,当局及地政人员取得了扶助自耕农的经验;同时,向社会各阶层显示了当局全面推进土地改革,实现耕者有田的决心,还为地主阶级作了示范:既然政府都不当地主了,地主也应放弃土地私有权。故有人说,“公地放领”乃“台湾土地改革三部曲之桥梁,承上启下”。<sup>注 11</sup>

## 三、耕者有其田

实施“耕者有其田”这是 50 年代农地改革的实体和核心,通常所说的农地改革,主要指的就是这一步骤的实施。“三七五减租”实施之后,租

佃制已趋合理,加上“公地放领”,土地问题已经缓解,农地改革还要不要向前推进?在《实施耕者有其田条例》的立法过程中,有过争论。有些“立法委员”认为,有“三七五减租已经够了”,“土地改革的目的已达,农民生活相当的好”,“何必找此麻烦”?<sup>注 12</sup>

实行“耕者有其田”,即地主出租的耕地除依法保留部分外,统由政府备价征收,转放现耕农民承领。在被征收范围内供佃农使用的房屋、晒场、池沼等地,也附带予以征收放领。祭祀公业与宗教团体的耕地加倍保留。在少量保留的租佃制中,《耕地三七五减租条例》仍然适用。

征收耕地的地价,以主要农作物生产量为标准,不以货币计算,标准比照公地放领额度。政府备价征收后转放现耕农民承领,其备价由放领时收回的地价来清偿。在给地主的清偿中,七成为依农作物计值的实物土地债券,由省政府委托台湾土地银行发行,年利率4%,本利合计于10年内分20期均等偿清;三成为公营事业股票,由转民营的水泥、纸业、农林、工矿四大公司发行,一次发清。放领地价照征收地价计算,按年利率4%加息,本利合计由承领农民于10年内分20期以实物或实物土地债券均等缴清。承领农民每年所付不超过每年的地租。

为了实行“耕者有其田”,此前作了多项准备工作:一是举办地籍总归户,清查各种土地所有权人及其土地面积处所,从1951年起至1952年月3日完成。二是于1953年1月正式通过公布《实施耕者有其田条例草案》,三是同时公布实物土地债券及公营事业移转民营两条例,做到整个过程有法可依。正式工作于1953年2月开始,经过复查、计算、审核、公告等程序,6月1日起办理耕地征收放领。到年底全部工作结束,计征收私有耕地143,568甲,承领农民194,823户,至此自耕农已占全省农户的84.7%。

在全面“实施耕者有其田”中,以上由政府直接征收超过保留限度的私有出租耕地、移归现耕农民所有,可谓第一步。第二步则是,一年后由政府贷款给现耕农民,购买地主保留的出租耕地。这时地主出卖保留耕地,其现耕农民有优先承购权。但保留地是否出卖,由地主自行决定。出租耕地之所有权人如为不在地主,或非自耕农、非老

弱孤寡残废及教育公益慈善团体借土地维持生活者,其承租人如继续耕作满8年以上,可请求政府代为照价收买其承租的耕地。不过,这种情形并不多见。

1989年9月中,我随本省籍亲戚在赴基隆途中,拜访了住在小山岭上的一农家,亲眼看到了实施“耕者有其田”30多年后,原本处于社会底层的农民生活的巨大变化。这农户家有汽车,有农机,户主与子女均在城里工作,农忙时雇人耕作,只留年近半百的妇人在家照料。家里住房宽敞,家用电器俱全,只缺空调——因为乡间空气清新、凉爽,实无必要。这真可谓是佃农世家的现代生活。20年后,此情此景仍历历在目。

可是,一些昔日的地主则多有不满。特别是在经济发展、地价飞涨、土地成了抢手的投机对象和暴富途径之后,他们怨恨国民党夺去了本该属于他们的发财机会。也有学者认为,实施“耕者有其田”后,政府没有随着经济发展、地价上涨实行“涨价归公”,反而免征地价税,甚至免征田赋,无异于火上加油,促成了土地的疯狂投机,由此凸显了地权变更的机会和结果的不公平,从而“引发部分‘旧地主’的积怨与反抗,种下地主子弟大搞台独活动的种子”。<sup>注 13</sup>

### (三)几点评说

#### 一、最突出的特征是和平推进

有学者称,“台湾的土地改革是相当和平的,几乎没有发生任何流血事件,和中共在大陆上所推行的土地改革恰成强烈的对比。”<sup>注 14</sup>台湾当局为什么要如此?又为什么能如此?

1、审时度势。当局对时局的认识较为清醒。陈诚写道,“当时台湾局势,风雨飘摇”,因而实行土地改革,“不宜操之过激”,只能“采取和平的与渐进的方法”。<sup>注 15</sup>

2、法理至上。国民党决策层坚信,地主是在“法律许可之下获得土地”的,“非由掠夺而来,自无予以没收之理由”。<sup>注 16</sup>这就是承认私有产权的神圣性,认定改革必须以此为前提。

3、政府居间。这是台湾当局处理基本社会群体之间矛盾的途径和原则。办法是,“由政府向地主征收土地,然后转放于现耕农民,在全部征收放领过程中,不使地主与佃农有任何直接接触。”<sup>注 17</sup>其直接效果是,避免地主与佃农在直接交涉

中发生种种流弊与纠纷,保证地权转移的“融和气氛”;深远的考虑是,在社会转型的过程中预防仇恨情绪的爆发与蔓延,避免阶级冲突,防止农村社会的分裂。

4、兼顾业佃。当政者在改革中极力取调和折中态度,在保障佃农利益的同时“兼顾地主利益”。办法是:对于拥有3甲以下耕地的小地主实行完全的保护,对于拥有3甲以上耕地的地主对其被征收的土地“补偿合理地价”;同时“准许地主保留合理面积耕地,以保障其生活”。<sup>注18</sup>其补偿部分则给实物债券而非现金,以免地主因货币贬值而受损。

5、循序渐进。有主有次,有先有后,逐步深入,有意识地走迂回曲折的道路,不急功近利,宁可慢,但求稳。遇重大事情则实行“一个原则,两种办法”。例如,对于地主取“买去”原则,即产权按地价有偿转移。办法是:基本部分由政府强制征收,按统一价格,部分保留地自由买卖,按商议价格。再如,“培植自耕”是原则,办法:一是基本部分,只认现耕,即凡现耕者均可承领土地,有劳动能力但非现耕者不得承领,二是变通部分,作为非耕者地主可保留部分土地,既可自耕亦可出租。

6、先礼后兵。这就是以强大的武力作后盾。当时,台湾人口600多万,国民党大兵即有60余万,足以应付一切,但不轻易动用,主要利用心理威慑,依靠政权机关,运用法制手段解决问题。蒋梦麟对此深有体会:“台湾固多开明地主,惟不明事理的地主也不乏其人,如果和他们去商量等于与虎谋皮是永不会成功的。”<sup>注19</sup>陈诚也曾公开说,“困难是有的,刁皮捣蛋、不要脸皮的人也许有,但是我相信不要命的人绝不会有的。”<sup>注20</sup>他在请求2/3由地主组成的省参议会通过“三七五减租案”时,口气就软中有硬。蒋梦麟评说:“握军政大权”的他,话中“到底含有几分‘先礼后兵’的意义”。<sup>注21</sup>对于反对土地改革的台湾第一名绅林献堂,陈诚先是礼送赴日,数年后又发表其次子一荣誉职务。而对于各县抗拒阻挠的地主则毫不手软,或予以拘留,或解送保安司令部。土生土长的台籍中老年人回忆说:“国民党在1947年到1948年所实施的镇压,……几乎波及台湾每一个家庭”,到“推行土地改革的时候,台湾人民

已经学到只要国民党认为有必要,他是不惜使用武力的,所以地主们才吭都不敢吭,乖乖地服从。”<sup>注22</sup>其中,高明者甚至主动献缴土地权状。

二、如何看待改革中的几大措施对台湾经济发展的影响?

1、无条件地维护现耕是否公平合理?这里的问题有:一是由于惟有现耕者才有权承领土地,一些有农耕能力和需求,但由于种种原因而未能成为现耕者,就几乎全然失去了农耕的权利和机会。二是没有限制现耕者的领地数额,就使部分佃农可能成为大量土地的拥有者,造成农村人口中的新的等差。这样是否公平合理?应该说,当局只承认现耕有权承领,不承认人人有权;只实行耕者领田,不搞“计口授田”,是有理由的。这里的出发点不是土地承领是否公平,而是土地的经营和利用是否合理。即一是维持现有的农地经营关系,不打乱均分,既有利于农业生产的持续,也有利于农村社会秩序的安定。二是通过维护现耕,一开始就限制劳动力向农业转移,而不是吸引已经离土的劳动力重新归农。在农村人口众多,劳动力充实的条件下,有利于提高农业的劳动生产率,并解决工商业发展所需的劳动力问题。既为现耕者,耕作能力自然就不成问题,故不限制领地数额不会影响农业生产,也有利于鼓励其依靠自身的农耕劳动在自有的土地上去致富。维护现耕,其宗旨就在于扶植自耕农。在手工农业时代,推行农地农有,消除租佃制,使土地的所有权与经营权得以结合,就能最大限度激发生产者的积极性,使地尽其利。而进入大工业时代,为了实现农业的机械化与现代化,就应鼓励以大农场经济取代小农经济,承认不加限制的自由租佃制。值得指出的是,当时台湾当局的维护现耕并不是绝对的。按规定,耕者承领土地的地权,十年后是可以转移的。这样就并未限制农有土地的开放,对于农地经营规模的扩大、农业的机械耕作等等,不致成为障碍,不致影响农业经济跟上工业时代的步伐。

2、地主的保留地多了还是少了?地主保留地的多少问题,在农地改革的立法过程中争论得很激烈。一些人认为,应参照日本的改革经验,坚持原省政方案地主只保留一甲水田,使其不能依靠地租生活,而被迫自食其力,或从事农耕,或出卖

土地、转营地业。他们认定,如此既可以较快地消灭租佃制度,消灭封建剥削,也有利于自耕农场的创建和扩大。但是,当局未采纳此说。当时全台农户平均占地已有 1.2663 甲<sup>注 23</sup>,如只保留一甲则低于平均数,不合其奉行的原则;故依据省议会意见,保留地限为三甲。这样于地主较为有利;但佃农的土地要求则未能充分满足,租佃制度在相当范围内仍然被保留。其影响如何?首先是,当局在政治上得到了好处,既受到 20 万领地佃农的拥护;也使 10 万余户小地主因得到保护而未予反对。至于租佃制度虽然拖了个尾巴,在经济上却并未造成多大恶果,而且其性质已在慢慢的转变之中。事实证明,台湾当今农村存在的土地问题和其他社会问题,主要是由于将原有租佃条例凝固化所致,并非由地主保留地而来。也有要求为地主保留四甲土地的,其理由就主要不是为照顾地主生活,而是要保存一个“乡村的中产阶级”<sup>注 24</sup>。但是,把中等地主作为农村的一个中产阶级保存起来,在这样一个时代显然是不合时宜的。

3、地价补偿部分取搭配国营公司股票方式有何作用?

在立法过程中,这也是一个曾引起激烈争论的问题。有人认为,把国营企业贴下去,转到地主手里变为私营,削弱了国营经济,违背了发达国家资本的原则。其实,当时国营企业的民营化仅是个开端,规模尚小。其时,国营企业资产总额据估计在 45 亿新台币以上。出售的股票仅 5 亿,略超出 10%,影响不大,此其一。其二,有此垫资,当局每年能收回资金 9 千万元,可用以重建工业,于发达国家资本无碍。其三,所售者部分系小企业,“此等小型工业交由民营,也许比较政府直接经营为佳,何必也要国营?”(黄季陆语)<sup>注 25</sup> 其四,借此促进民营经济发展,“以为民营企业开辟坦途”,<sup>注 26</sup>于整个国民经济有利。“在整个民生主义政策下,是不会也不怕发生新的资本家的”。(陈诚语)<sup>注 27</sup>可见,当局是把通过地价补偿让国营公司开放民营,当作实现工业化的一条重要途径看的。通过让出四大公司全部股票,移交民间经营,由股东自选董事长和总经理,组成股份有限公司,依公司法经营。这是一个重要契机,由此开了鼓励私人投资工商业的一代风气。

出售国营公司股票,是否真能达到引导地主转业的目的?这种怀疑有一定根据。最初的情况的确欠佳,经济状况不好,国营公司信誉不高,其股票市价超出面值者,仅有水泥公司一家,其他三公司均低。历年股息分配数额亦仅水泥公司较为优厚,其他三公司多无股息,工矿公司虽有,然其数额实在太低。<sup>注 28</sup>尤其小地主更为吃亏。他们被征收的地块本来不大,应得地价补偿数额不多,按三成搭发股票更为数无几;虽有股息可领,而为此付出高额的交通费也不经济。且小地主为自身的知识经验所限,加上小股东在公司中无地位可言,故其股票早就低价抛出。如此,其资金就仍然留在农村乃至农业之中。所以,对此举在吸引地主土地资金投入工商业中的作用,不能估计过高。不过,就大地主而言则不然。“大地主因为有足够的资本投注在工业和金融上,所以仍然财源滚滚”。<sup>注 29</sup>由于当时工商业有待发展,成功的机会多,许多人日后便成了大企业家。美国一研究机构在报告中称:“台湾的土改给人们带来一个大大出乎意料的结果,过去的地主以及其他人的兴趣逐渐由农业转向了制造业。”“这场土地改革使资本的拥有者认识到拥有股票和加入生产企业的益处。政府出售国营企业为土地改革提供了部分资金,一方面赔偿了地主的损失,另一方面又推动了台湾下一阶段的发展。”<sup>注 30</sup>可以说,转移地主土地资金投入工商业的目的,在相当程度上是达到了。

三、指导方针是孙中山的民生主义,还是西方的自由主义?

孙中山的民生主义的一项重要内容是“平均地权”。在农地改革过程中,台湾当局一直高举“平均地权”旗帜,将它视为“基本国策”。重要的智囊人物肖铮认为,台湾土地改革的理论依据就是:“国父平均地权之义理”。<sup>注 31</sup>黄通写道:台湾土地政策的目标就在于“建立平均权的土地制度”。<sup>注 32</sup>但是,我们只要拨开意识形态的迷雾,就可以看到,台湾的农地改革其实与孙中山的“平均地权”思想并无多大关系。

“三七五减租”只是确定最高租额并予以限制,没有涉及“地权”问题,更谈不上地权的平均。“耕者有其田”涉及到地权,实行的是“农地农有”,非农业人口并不包括在内,不是凡国人都同

等地拥有地权,谈不上地权在国民间的平均。孙中山的“平均地权”实际上只是从全民均等享有地租之权讲的,即通过政府征收地价税与土地增值税,实现“涨价归公”。这是新增的土地收益权归公,并非土地所有权归公。严格讲,这也谈不上是什么地权平均,只不过是全民共享级差地租罢了。

孙中山早年主张“土地国有”(或曰“公有”、“社会所有”)。他从自然法观点出发,认定土地只能归社会所有,不能、也不应私有——无论是地主私有,还是农民私有。“照价收买”是由政府收买,收买之后并无再卖给农民之说——只有战士授田和移民屯垦才属例外。台湾在“公地放领”中把国有土地卖给现耕农民私有,在实施“耕者有其田”中把地主的耕地照价收买之后再卖给现耕农民,变地主私有为农民私有。这些,与孙中山的上述主张显然不合。晚年,他在倡导“耕者有其田”时,已进一步看到解决农民土地问题的重要性与迫切性,才改为主张耕地由地主所有转归农民所有,即用小农制来取代租佃制,跨越了“涨价归公”式的“土地国有”。不过,这种土地国有思想在市地改革中是仍有意义的。

实施“耕者有其田”之后,地权就能平均吗?不能。这里,在实现地权转移时就已有种种差异,并未均等,也不可能均等。因此在这里遵循的原则是地权的合理化,而不是地权的平均化。农民承领的土地,当不再限制其地权转让后,就有可能由于种种原因再转卖出去,自耕之地又变为佃耕之地,租佃制度得以恢复。当然,在当局继续采取扶植小农,限制私有产权的条件下,这一分化过程不致很快;但这种历史趋势是不可阻挡的。其实,在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转变的过程中,农地的产权是应该开放的,只有市地产权才应加以限制。

那么,台湾农地改革实践的理论根据究竟是什么?答曰:比较复杂,但其主线是自由主义。

在实施“三七五减租”过程中,一方面限制租额,破坏高额的封建地租制,一方面保障佃权,破坏地主对于佃农的人身强制关系,这就使旧式租佃制的封建外壳得以打破;而在减租中公布固定租额标准,随着农业生产的发展,地租率实际上就在不断下降;当降到一般利息的水平时,自由

租佃制便开始出现。最后,随着工商业的发展,大量农业人口转向工商业,农民不再被束缚在土地上时,新的、自由契约式的租佃制度便得以完成。

通过实施“耕者有其田”,废除封建式的地权垄断制度,实现农地农有,其实质就是要建立近代式的自由地权制度。在一定时期限制地权的转移,正是为了防止封建式地权垄断制度的复活,而给佃农的自由地权制以保护。这种保护并不妨碍耕者本身的自由发展——先是在有限的土地上自由发展,往后,尤其是在地权转移的限制消失后,则可能在更广阔的土地上自由发展。这就是打破封建的地权垄断制,建立自由的地权制度。“耕者有其田”的理论根据应该是地尽其利,而不是地权平均。以土地私有为前提就谈不上地权的平均,私有与平均不能相容。这里走的本来就是一条自由经济之路,何必要给安上个“均权”之类的名目呢?

在实施“耕者有其田”时,政府以四大公营公司的股票抵偿地价,付给地主。这与地权的平均与否更全然无关。其出发点,一是为地主妥谋出路,二是促使地主将土地资金转投于工业,三是开拓公营公司转归民营的新路。由此自由企业制度的成长在台湾就走上了坦途。人们不难看到,这完全是与民生主义中的“节制资本”异趣的自由主义举措,与孙文主义何干!

不过,在西方自由主义大师哈耶克看来,台湾农地改革中的自由主义精神则是明显不足的。他访问台湾后,1965年底在《法兰克福报》发表文章,一方面肯定台湾是“自由经济发展的模范”,一方面又指称台湾当局“1949年第一次土改采取之办法,不免稍显激烈。”例如,在三七五减租中“无偿削减一般地主利益,……确属大胆行为”。不过,他对此表示理解,认为“惟此种手段,乃一时政治上权宜需要。”“为澄清当时农民间极度不满之情绪乃出于不得已,实属无可厚非。”<sup>注33</sup>

忠于孙文主义的理论家们持另一种看法。他们认为,后来台湾农地改革的实践是过于自由主义了,背离了三民主义。例如,肖铮说,台湾“现在的社会是美国式的自由经济社会”,“不是平均地权的社会”。<sup>注34</sup>高信也指出,台湾在土地政策的推行中,“许多执政同志”脑子里“充满了崇美思

想”，“以美国为样本”，“忘记了我们是三民主义立国，不是以资本主义立国”。<sup>注 35</sup>

反对农地改革的地主们的看法，自然完全相反。他们大骂执政者是“戴孙中山的帽子，穿共产党的靴子”。换句话说就是说，这些人是祭起孙文主义，抄袭共产主义，背离自由主义。

我以为，上述种种看法，均不无偏颇。可以承认，台湾农地改革的指导思想基本上是孙文主义，其某些主张，在彻底的自由主义者看来显得过于激进，但是其基调，实际仍然是温和的，与共产主义无缘。确切地说，它是自由主义、保守主义和形式上某种程度的空想社会主义的一种综合。

注释：

注 1、蒋梦麟写道：“土地问题，自汉代以来，就是循环不已的人民叛乱之源。好几个强大的朝代，为农民革命的浪潮所卷去”。《新潮》，载《传记文学》第 11 卷第 1 期，第 94 页

注 2、美国斯坦福国际研究院、华盛顿国际政策分析室撰：《关于台湾发展经验的报告》，中国科技促进发展研究中心编，1986 年，第 37 页

注 3、同注 2

注 4、陈诚：《台湾土地改革纪要》，台中华书局印行，1961 年 10 月，第 2 卷，第 42 页，第 19 页

注 5、肖铮：在台北国际性土地改革讨论会上的专题报告，1967 年 12 月 18 日

注 6、彭怀恩：《台湾政治变迁 40 年》，自立晚报社，1987 年 10 月，第 76、77 页

注 7、同注 6

注 8、《中国现代史专题研究报告第九辑》，第 230 页

注 9、转引自肖铮：《平均地权之理论体系》，中国地政研究所印行，1968 年 9 月，第 207 页

注 10、同注 4，第 28、30 页

注 11、《土地改革》第 2 卷，第 10 期，1952 年 6 月

注 12、转自徐实圃：《台湾实施耕者有其田经纬》，第 157 页

注 13、《人与地》，第 54 期，第 18 页，第 19 页

注 14、高棣民著：《台湾奇迹》，洞察出版社，1987 年 11 月，第 121 页

注 15、同注 4，第 3 页

注 16、同注 4，第 59 页

注 17、同注 4，第 63 页

注 18、同注 4，第 60 页

注 19、蒋梦麟：《台湾三七五减租因素及限田政策实施后的几个问题》，《土地改革》第 2 卷，第 20 期（1952 年 1 月），第 5 页

注 20、同注 6，第 77 页

注 21、同注 1，第 9 卷，第 1 期，第 54 页

注 22、同注 14

注 23、见黄大洲：《台湾农村建设的回顾》，载建国 70 周年纪念丛书，三民书局印行，1981 年，第 462 页

注 24、同注 12，第 154 页

注 25、同注 12，第 95 页，第 173 页，第 175 页

注 26、同注 4

注 27、同注 12，第 160 页

注 28、见《台湾土地及农业问题资料(1)》，第 40 页

注 29、同注 14

注 30、同注 2，第 41 页

注 31、肖铮：《平均地权之理论体系·再版自序》，中国地政研究所印行，1968 年

注 32、黄通：《土地政策原论》，中国地政研究所、台湾土地银行研究所印行，1961 年，第 99 页

注 33、引自《土地改革》第 17 卷，第 12 期，1967 年 12 月，第 8 页

注 34、肖铮：《平均地权理论之研究》，载《人与地》，第 58 期，1988 年，第 6 页

注 35、高信：《八十自选集》，台湾商务印书馆，1984 年，第 201 页

（作者系江西财经大学教授）

（责任编辑 徐庆全）

## 书屋 2009 年第 9 期目录

说长论短	好一个《风流去》	管卫中
	秦始皇是“英雄”吗？——与王立群教授商榷	庶人
思史佚篇	政治暗杀的另一层解读——重读宋教仁被刺案	顾士
	一颗头颅与一场革命	
	——清末乱局中的端方之死	黄波
灯下随笔	储安平的自由观及其限度	喻中
	辱莫大于心奴——品读梁启超的一篇演讲词	邵纯
	岂能轻言“告别五四”	柳士同
	“晏子转型”及其他	陆志成
域外传真	忘掉过去注定要重蹈覆辙	李木生
	永远的诺曼底	刘洪玉
书屋品茗	尘埃落定话“三国”	冯天瑜
	斯人已逝香犹在	王明析
	近代中国民族国家的另一种构想	欧阳哲生
	《罗马爱经》编后记	郭凤岭
	关于《资本论》的一条脚注	李克杰
	也谈“茜雪”——与刘广定先生商榷	朱冰
	皇帝爱“日”字	李文君
人物春秋	杨树达与陈寅恪的交谊	朱发建
	被诗与禅搭救的出水清莲	
	——王微与谭元春、许誉卿	王鹤
	《大地》背后的中国人——邵德馨	叶公平
	也谈苏轼少谏墓之作的原因	许锡强
编读往来	忽略了一个更加重大的问题	许渊博
	回忆录还是不可尽信——聊答罗飞先生	陈漱渝

邮发代号 42-150 月刊 每月 6 日出版 定价 6.00 元  
地址：长沙市韶山北路 443 号《书屋》杂志 邮编 410007  
电话 0731-85791300 85486812 传真 0731-85790197  
邮箱 nlh5314@263.net

# 首届中央政府党外人士所占比例

· 胡泊



1949年9月30日晚,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举行闭幕式,新当选的各领导人登上主席台:前排左一起:刘少奇副主席、朱德副主席、毛泽东主席、宋庆龄副主席、李济深副主席、张澜副主席、高岗副主席

1949年10月20日,《人民日报》发表《政务院各部、会、院、署、行负责人员名单》,公布周恩来等93人的政治面目或身份及职务,注明为中共党员者49人。对此,近年有评价称:“其中民主人士42名,占45%……这种安排,这个比例,超过许多民主人士的预期。”据笔者陋见,持此说者(以下简称“45%说”),以郝在今《协商建国—1948年—1949年中国党派政治日志》为最早。影响所及,如中央电视台建国55周年专题片《开国》等均沿用不疑。然而,实际情况与此相差甚远,非中共人士(民主人士)应为31人,所占比例为33%,详见以下带“【】”注解。为节约篇幅及醒目起见,名单对49位中共人士的说明从略。

## 《政务院各部、会、院、署、行负责人员名单》

(《人民日报》1949年10月20日)

- |     |                 |
|-----|-----------------|
| 内务部 | 部 长:谢觉哉         |
|     | 副部长:武新宇         |
|     | 陈其瑗(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 |
| 外交部 | 部 长:周恩来         |
|     | 副部长:王稼祥         |
|     | 李克农             |
|     | 章汉夫             |
| 公安部 | 部 长:罗瑞卿         |
|     | 副部长:杨奇清         |
| 财政部 | 部 长:薄一波         |
|     | 副部长:戎子和         |

王绍鏊(中国民主促进会)。【1981年1月6日《人民日报》】

《奋斗不息的忠诚战士王绍鏊同志》：“‘九·一八’事变发生后，……他走过了曲折的道路，终于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贸易部 部 长：叶季壮

副部长：姚依林

沙千里(中国人民救国会,原上海市人民政府副秘书长)。【1982年5月12日《人民日报》《在沙千里同志追悼会上乌兰夫同志致悼词》：“1938年,沙千里同志参加了中国共产党。”】

重工业部 部 长：陈 云

副部长：何长工

钟 林(专家)。【双峰县公共信息网历史人物栏目钟林条目：“翌年(1926年)8月,在省城经王则鸣和龚际飞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

刘 鼎

燃料工业部 部 长：陈 郁

副部长：李范一(工商界,原汉口第一纺织公司总经理)

吴 德

纺织工业部 部 长：曾 山

副部长：钱之光

陈维稷(民主建国会,原中国纺织建设公司总工程师)。【1984年1月21日《人民日报》《全国政协常委、纺织工业部原副部长陈维稷同志在京逝世》：“1938年加入中国共产党”】

张琴秋

食品工业部 部 长：杨立三

副部长：宋裕和

轻工业部 部 长：黄炎培(民主建国会)

副部长：杨卫玉(民主建国会)

龚饮冰

王新元(民主建国会,原中国纺织建设公司青岛分公司副经理)。【1978年12月28日《人民日报》《王新元同志追悼会在京举行》：“一九二六年十月加入中国共产党”】

铁道部 部 长：滕代远

副部长：吕正操

武竞天

石志仁

(专家)

邮电部 部 长：朱学范(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中华全国总工会第二副主席)

副部长：王 诤

交通部 部 长：章伯钧(中国民主同盟)

副部长：李运昌

季 方(中国农工民主党,原苏北行署副主任)

农业部 部 长：李书城(民主人士,原武汉军事管制委员会高级参议)

副部长：罗玉川

吴觉农(专家)

杨显东(自然科学工作者,原武汉大学农学院院长)

林垦部 部 长：梁 希(教授,原南京大学校务委员会主任委员)

副部长：李范五

李相符(中国民主同盟,教授)。

【《中国林业教育》1995年6期《怀念李相符教授》：“正当此时,国内发生了‘四·一二’反革命政变,……此后,去东京与中国共产党日本总支取得联系,经马哲民介绍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水利部 部 长：傅作义(起义将领)

副部长：李葆华

劳动部 部 长：李立三

副部长：施复亮(民主建国会,教授)

毛齐华

文化部 部 长：沈雁冰(作家,中华全国文学艺术界联合会全国委员会副主席)

副部长：周 扬

丁燮林(自然科学工作者,教授)

教育部 部 长：马叙伦(中国民主促进会)

副部长：钱俊瑞

韦 恂(教育工作者,原上海市人民政府副市长兼高等教育处处长)。【珠海香洲政协网站人物述林栏目韦恂条目：“1926年6月初,韦恂由苏兆征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但未履行正式入党手续。……1943年,韦恂由车衣、张云逸二人介绍,重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卫生部 部 长：李德全(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

副部长：贺 诚

苏井观

司法部 部 长 :史 良(中国民主同盟 ,律师)

副部长 :李木庵

法制委员会 主任委员 :陈绍禹

副主任委员 :张曙时

许德珩(九三学社 教授)

陈瑾昆 (原华北人民

法院院长)【《二十世纪湖南人物》：“1946年12月,经毛泽东和刘少奇介绍,中共中央直接批准他为中国共产党正式党员”】

民族事务委员会 主任委员 :李维汉

副主任委员 :乌兰夫(蒙古族 ,内

蒙古自治政府主席)。【1988年12月8日《人民日报》《乌兰夫同志生平》：“1925年9月转为中国共产党党员”】

刘格平(回族 ,原华

东人民革命大学副校长)。【1992年3月29日《人民日报》《刘格平同志逝世》：“1926年加入中国共产党”】

赛福鼎(新疆维吾尔

族 ,新疆保卫和平民主同盟代主席)

华侨事务委员会 主任委员 :何香凝(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中央常务委员)

副主任委员 :李任仁(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中央执行委员)

廖承志

李铁民(中国民主同盟马来亚支部常务委员)

庄希泉(中国民主同盟 ,工商界)

科学院 院 长 :郭沫若(无党派民主人士 ,中华全国文学艺术界联合会全国委员会主席)。【1978年6月19日《人民日报》《在郭沫若同志追悼会上邓小平副主席致悼词》：“郭沫若同志一九二七年参加南昌起义 ,同年八月参加中国共产党。”】

副院长 :陈伯达 ,

李四光(自然科学工作者 教授)

陶孟和(社会科学工作者 教授)

竺可桢(自然科学工作者 ,前浙江大学校长)

情报总署 署 长 :邹大鹏

海关总署 署 长 :孔 原

副署长 :丁贵堂(专家)

新闻总署 署 长 :胡乔木

副署长 :范长江

萨空了(中国民主同盟 ,光明日报社秘书长)

出版总署 署 长 :胡愈之(中国民主同盟 ,光明日报社总编辑)。【1986年1月23日《人民日报》《胡愈之同志生平》：“胡愈之同志 1933年9月参加中国共产党。”】

副署长 :叶圣陶(作家 ,原华北人民政府教育部教科书编审委员会主任)

周建人(中国民主促进会 ,原华北人民政府教育部教科书编审委员会副主任)。【1984年8月7日《人民日报》《周建人同志生平》：“1948年4月,周建人同志毅然加入中国共产党。”】

人民银行 行 长 :南汉宸

副行长 :胡景翼

显然,《人民日报》名单有明显疏漏。乌兰夫、刘格平、钟林、陈瑾昆均为中共高级干部(乌兰夫还是中共七届中央候补委员),却均未注明其政治面目。需要指出的是,持“45%说”者在一定程度上注意到这一缺失,把乌兰夫、刘格平补入中共人士,再用总数的93减去中共的51,得出——“民主人士42名”。

王绍鏊、沙千里、陈维稷、王新元、李相符、韦恂、郭沫若、胡愈之、周建人9人均系当时身份保密的中共特别党员,此后,郭沫若、韦恂分别于1958年、1960年“重新入党”或公开早已有之的中共党员身份。除此以外,还有四人值得注意。综合各种情况,本篇不将其计入中共特别党员。详情如下:

一、1987年12月29日《人民日报》《季方同志生平》称其为“忠诚的共产主义战士”。中国农工民主党副主席方荣欣署名文章《一个爱国者的道路》称:“在抗日战争的烽火中,季方由一个不屈不挠的民主主义革命者,成为忠诚的共产主义战士。”(《纪念季方》第30页)熟悉党情者想必明了:中共党员未必是“共产主义战士”,“共产主义战士”必定是中共党员。至于何年加入、何人介绍,尚不得而知。

二、杨显东传记称其在抗战期间三次提出加入中共，董必武答复：“你现在和我们有联系，党的学习文件都给你看，就是把你当作党外布尔什维克看待。”（《从牧童到博士》第812页）1956年，杨显东正式加入中共。

三、1949年10月15日，赛福鼎参加新政协会议期间递交入党申请书。20日，《人民日报》发表名单，23日，毛泽东批示：“同意赛福鼎同志入党”（《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一册第86页）。

四、萨空了是否中共特别党员，说法不一。在此暂取其女萨说法：“自从他三十年代交结了共产党员作朋友，接近了中国共产党，认为党的奋斗目标，正是他的理想，就主动地为党工作。党认为他在党外工作较好，他就在党外为党工作。”（《萨空了》第293页）1960年，萨空了正式加入中共。

根据笔者统计，政务院所辖机构负责人中相对准确的党派比例应为：中共方面62人（注明者51人，未注明者11人），占66.67%。非中共方面31人，占33.33%。

也许有人说：既然是特别党员、秘密党员，也许《人民日报》发表名单时也不知道其真实政治面目。实际情况是，刘少奇1949年7月4日《代

表中共中央给联共（布）中央斯大林的报告》称：“【新政协】筹备委员会已经组成，共一百三十四人，党员四十三人，肯定跟我们前进的进步人士四十八人，中间人士四十三人，其中偏右者只有十六人，在进步人士中有十五个秘密党员。”（《建国以来刘少奇文稿》第一册）政协筹备会系临时机构，其中的秘密党员尚且受到需向斯大林汇报的重视，遑论政务院所辖机构。

也许有人说：“45%说”无非根据《人民日报》名单统计而得，反映当时情况，何错之有？问题在于，当年中共是否高度评价这一安排，笔者尚未见到；倒是新世纪以来不少文章对此津津乐道，作为民主、开明的象征。在上述中共特别党员身份早已公开，公众对政务信息披露日渐关注的今天，“45%说”不免显得荒唐，何以经得起推敲？何况，反正已经修改了，何不再彻底一些？

政务院所辖机构出现中共特别党员，其形成自有历史原因，而且多已公开身份。值此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暨中央国家机构成立60周年之际，恢复政务院各部、会、院、署、行负责人全部中共人士本来面目，只能有利于后人正确认识历史，总结经验，可谓题中应有之义。

（责任编辑 萧 徐）

SIEMENS

SW 声望听力  
好听力 · 好生活

# 西门子助听器

解决听得见听不清 耳聩耳鸣的烦恼

声望全国连锁助听器专业验配机构

地址：北京市东城区东直门外大街46号天恒大厦508A/B

电话：010-84608877 400-610-0896

邮编：100027

网址：<http://www.sw-tl.com>

广告审查批准文号：苏医械广审（文）第2009030029号

# 中共为什么 1949 年会胜利

——美国远东问题专家当年如是说

• 张 彦 编译

1949年1月12日,历史悠久的上海英文《密勒氏评论报》(THE CHINA WEEKLY REVIEW)转载了《纽约星报》(NEW YORK STAR)邀请代表各种政见的几位美国远东问题专家举行座谈的记录。他们讨论的是有关当时中国最迫切的两大问题:

第一,为什么中国共产党会取得胜利?

第二,对于在中国出现的这种危机,美国能够 and 应该做些什么?

所有这些专家都是重量级人物,有的与美国政府关系甚深。60年后的今天,重读他们当年面对残酷现实时说了些什么,发人深思。遗憾的是,由于篇幅所限,在这里只能摘译其中部分人谈话的要点,以飨读者。

——译者 张 彦

埃德加·斯诺(Edgar Snow):

(斯诺,著名的“RED STAR OVER CHINA”即《西行漫记》一书的作者,原《星期六邮报》驻华记者,后任该报副总编辑,并一度兼任《密勒氏评论报》副总编辑)

已经矗立了20年的南京蒋介石独裁政权,在装备简陋但是善于动员群众的敌人面前,正在从内到外筋疲力尽、土崩瓦解了。

中国共产党人正在取得节节胜利,因为他们将一个能够满足人民大众某些迫切需求的纲领付诸行动。1927年,国民党赢得政权,靠的是耕者有其田和在政府里实行民主的口号。现在,失败了,因为它从来没有兑现过它所作的任何承诺。

共产党之所以胜利是因为他们实行平均地权,并让农民在斗争中享有经济实惠。正是在这个基础上,他们之间建立起了一个政治联盟。由于有了这样的联盟,他们开展了群众运动。从群众运动

中成长起来一股道德和文化力量,造就了一支年轻有为的领导队伍。一个纪律严明和深为群众爱戴的政党。他们之所以能战无不胜,是因为它能从大多数人民群众中吸取力量,并为满足他们的迫切需要寻求答案。正是在这样的基础上,涌现了一支现代中国最有成效的军事组织。

面对这个现实,美国能够和应当做些什么?三件事:1)回到不干涉中国内政和民族自决的传统政策;2)坚持让联合国其他国家也同样这样做;3)向中国人民表达美国深切和持久的友谊,并为解决当前革命所形成的巨大而复杂的经济问题提供援助。

欧文·拉铁摩尔(Owen Lattimore):

(拉铁摩尔,蒋介石的前政治顾问,美国新闻处太平洋行动组副组长,多本关于中国和远东问题著作的作者)

中国共产党人之所以赢得胜利,部分是由于他们领导得好。但是,更重要的是因为国民党的腐败、无能和高压统治,甚至连臭名昭著的希腊政府都不如。在我们国家,用马歇尔国务卿的话来说,我们总是把共产主义与穷困、饥饿、绝望、混乱联系在一起。令人啼笑皆非的是,在中国,这个可怕的公式所描绘的一切正发生在政府管辖的地区里。所有美国记者发回来的报道,都证实政府一边的士气完全瓦解,为国民党而战的信念已经荡然无存。

我们对于中国政府所给予的过多、过快的援助,已经严重地伤害了美国在华利益。尽管如此,我们的国家利益依然还在。我们的靠山就是中国人民对我们的良好愿望。要珍惜这个愿望,我们必须停止一切足以延长和加剧中国内战的行动。

但是,我们不应当全部撤出中国,使其陷入一

片混乱。我们应当继续每项可能的行动，特别是经济建设。从长远着眼，这对中国人民是有利的，不管他们将建立什么样的政府。

海罗德·伊克思(Harold Ickes)：

(伊克思，1933至1946担任美国内政部长，著有多本关于新政的书籍，为《纽约邮报》撰写每周三次的专栏。)

报纸上所报道的事实以及权威观察家最近发自中国各种信息，都使我不能不相信，中国共产党人在节节胜利，中国正经历着一个肿瘤的切除手术。毫无疑问，在造反者当中许多都是共产党员，而且可以肯定苏联一定在充分利用这个大好的机会。很久以来，我就认为，中国的内战在很大程度上是从农民起来反抗蒋介石腐败、残酷统治政权开始的。然后，吸引了工人以及生活在这块土地上的其他人群，包括教师、学生以及拥护孙中山人权自由理论原则的其他团体。除了这些道德因素，还得加上美国对蒋介石的大量武器和物资援助，因为其中相当一部分被腐化的国民党人在溃败和投降中转到了共产党手里。在这样一片混乱之后，倒有可能出现一个真正代表中国人民的政府。果真如此的话，我相信，我国会对它的经济复兴给予慷慨的援助。

约翰·费尔班克(费正清 John K.Fairbank)：

(费正清，哈佛大学历史系教授，《美国与中国》一书的作者，原美国新闻处处长，曾在中国居住17年以上。)

中国共产党正在取胜，是因为它将占中国人口绝大多数的贫苦农民组织起来了。国民党有过20年的时间去做这件事，但是它却没有去抓住这个机会。共产党组织农民确有一套，泼辣、坚决，但是有利于群众，极具号召力。共产党的成功，恰恰反映出国民党在组织农民成为国家政权基础的无能和失败。

美国救不了现在这个蒋介石政权，也不应该为支持它成为流亡政权做出任何承诺。我们不当再对它提供任何军事援助，因为已经不可能产生什么好的影响了。但是，我们应当为了人道主义或生产建设的目的继续提供经济援助。我们的主要政策是要保留行动的自由，以便在应对新情况

时，有个灵活的谈判基础。

与此同时，我们应当将美国的代表留在中国，并试图尽可能地与共产党地区保持接触。中国共产党继承了国民党这个烂摊子以后，必然要面对极大的问题。他们可能会来寻求我们的合作，或者就很可能给反共运动提供了大好机会。

安娜莉·贾科贝(贾安娜 Annalee Jacoby)：

(贾安娜，二战时美国《时代》、《生活》、《财富》杂志的驻华记者，与美国名记者白修德(Theodore H. White)合著《THUNDER OUT OF CHINA》，中文译本名《中国的惊雷》)

共产党之所以取得胜利，是因为他们让农民看到为什么而战，而蒋介石却完全做不到。蒋从来不与他的民众商量，他只是命令他们。他粗暴地不能容忍任何反对意见，无论是保守派的、自由派的，还是共产党的。他与他的政党总是镇压农民的暴动和起义，从来不留中间地带。中国人被迫只能在不拥护他就反对他之间做出选择，于是只能选择灾难较轻的路走。

美国放弃了三年前的一个大好机会，让马歇尔促成的政治协商会议方案（能使国民党与共产党坐下来相互协商的方案）趋于瓦解，而没有坚持让他们双方相互妥协和改善关系以换取我们的援助。我们轻易地屈从于蒋介石的蛮横无理，而明知道正是我们的援助造成了这场战争。当中间路线人士纷纷被排斥赶走时，我们却在一旁袖手旁观。

我们能够提供的所有军事援助，都不可能帮蒋介石取得胜利。我们所能做的，就是重申我们的愿望，支持一个能够代表各方意见的政府。只要这样有代表性的政府一旦成立，我们承诺对它建设提供大规模援助。

共产党在军事上已经肯定取得胜利。然而，他们知道，在重建中国时美国的援助和建议是必要的。他们知道，蒋介石的技术人员远比他们自己的能干。他们也知道，战后如果发生骚乱，饥饿的农民也可能起来反抗他们。届时，我们将可能与他们建立一个和与捷克斯洛伐克之间那样脆弱的联合战线。这大概是我们在中国的最后机会了。

爱格尼斯·史沫特来(Agnes Smedley)：

(史沫特来，与中国共产党人交往甚深。《中国

的战歌》和《朱德传》的作者。)

关于你所提的问题,我认为,中国共产党人之所以取得胜利,因为他们是一群普通的中国人,正在进行一个神圣的解放战争,将中国从封建反动派和帝国主义的压迫下解放出来。人民解放军是一支由工人农民组成的民主军队,领导他们的是一些被证实为第一流军事政治智囊。这支在反封建、反帝国主义的革命中成长起来的军队,是一支政治上有教育的、有纪律的、抗腐败的和全心全意奉献的军队。

它的战略战术是在反对一个独裁政权 20 年血腥斗争中发展起来的,这个政权统治的残酷、腐败甚至被其盟国视为比中古时代还要落后,每一个中国人都知道如果没有外国人的支持,这个政权是不可能生存的。

美国政府应当从中国,包括青岛和台湾,撤出它的武装力量,停止对南京或者地方军阀政客的一切援助。在我们的国务院、国防部里,应该清除那些南京政权的支持者,代之以懂得如何赢得新建民主中国友谊的开明美国人士。中国的革命者一向视美国人民为朋友和盟军,但是却从血腥斗争经验中认识到我们目前的政策决定者却是他们的敌人。与占世界人口四分之一的几亿亚洲人为敌,是一种愚蠢的犯罪行为。

纳桑尼尔·裴斐(Nathaniel Peffer):

(裴斐,哥伦比亚大学国际关系教授,著有多种关于国际事务和远东问题的书籍,其中一本就是《我们必须在亚洲作战吗?》。)

中国的国民政府失败了,因为它已经被中国人民否定了。它的无能,且不说它的腐败,导致了中国人民对它的否定,也导致了共产党将其战败。

共产党胜利了,虽然他们在物质上处于绝对劣势,而且出乎所有人的预料。与其说是共产党取得了胜利,不如说是国民党宣告失败。国民党被否定了,出现了一片真空,于是共产党就进来了。现在,我们已经无能为力。

现在,美国已经没有任何能力来改变这个正在走向结束的结局。国民党政府必须滚蛋。如果美国决心这样做,它可以取代它的地位,行使中国政府的权力,可以派去一支军队作为军事援助。那样可能就意味着将和大多数中国人以及俄国人开

战。所以,这是荒诞的想法,最好放弃这种想法。

现在,对于中国,除了接受现实,我们已经不能有任何作为。如果俄国变得过于危险,必须予以对抗时,就只有整个西方起来反抗了。

克里斯托福·兰德(Christopher Rand):

(兰德,《纽约先驱论坛报》驻华记者,刚从中国回来。抗战期间,在驻中国的美国新闻处工作。)

共产党之所以节节胜利,因为他们比蒋政府更加关注中国人民的需要。他们是在一个原则的指导下行动,而不受蒋介石集团的压力。他们的军队和政权是在一个为公众利益服务的明确思想指导下工作,更具有奉献精神和高效率。共产党力量来自中国国内。俄国人的物质援助,与我们对蒋介石的相比,少得可怜。如果外界列强对于中国的内战不予过问,共产党可能早就取得胜利了。

美国应该在这次危机中,坚决保护它的公民。它应当停止对蒋的一切军事援助,因为它不仅徒劳无用,而且更增加对其继承政权的敌意。它应当继续它的经济援助,但是只在明确可以帮助中国人民的地方,而不是某个集团。它应当宣告它愿与任何有代表性的中国政府友好的愿望。它应当采取一个长远的政策,尽可能密切追踪观察中国的发展,试图用不侵犯睦邻关系的意愿,恢复传统的中美友好关系。基于中国的教训,美国对于亚洲以及存在共产主义因素的其他落后地区实行以下政策:不去支持任何陈旧顺便的职权,不用武力去反对任何强大的群众运动,建设性地和有意识地运用美国的财富和技术去缓和西方世界对古老农民社会所形成的撞击。(这是今日世界面临的重大问题之一。)如果这意味着支持这些地区的社会主义,我们也应该毫不犹豫地这样做。

阿莫斯·兰德曼(Amos Landman):

(兰德曼,是纽约《下午新闻报》的政治、劳工记者,经常为《COLLIER'S》以及其他杂志撰稿,目前正在远东旅行。)

一个字就能说明共产党的胜利:士气。共产党,有,而国民党,没有。根据南京的报道,在前线,成千上万的士兵逃跑。

政府军队的挫败,不是因为缺乏武器,而是因为缺乏战斗意志。例如,在济南,国民党军队拥有

充足的供应,但是只交战了8天,就撤离了。

在后方,人民已经无法容忍粮食和必需品的匮乏、以及货币的不稳定。连中产阶级也在最近的所谓改革中被剥夺走190,000,000元黄金。

我没有访问过共产党地区,但是我知道,他们成功的游击战靠的是农民的合作,共产党连续的胜利似乎证明他们军队的士气很高,得到民众的拥护。

我们面临的一个问题,是否符合美国的利益,去继续支持一个不为人民拥护而且不能有效使用美国援助的政府。现在,美国的问题是能不能利用它的力量和资源设法建立一个温和、有效的政府,实行中国大总统孙中山所主张的三民主义:民族主义(实现中国的统一)、民权主义(立法、公决、召回权等)、民生主义(国家有责任提供必要的粮食、衣服、住房和旅行工具)。(责任编辑 萧 徐)

## 代购代邮

书 名	作者或主编	定价	邮 费
问史求信集	阎长贵 王广宇著	58.00	8.00
直言——李锐六十年的忧与思	李 锐	29.50	7.00
潜规则:中国历史中的真实游戏	吴 思	28.00	6.00
血酬定律:中国历史中的生存游戏	吴 思	28.00	6.00
《名家书札与文坛风云》	徐庆全	45.00	7.00
找寻真实的蒋介石 蒋介石日记揭秘	杨天石	60.00	8.00
国史札记(事件篇)	林蕴辉	40.00	7.00
国史札记(史论篇)	林蕴辉	38.00	7.00
我亲历的政治运动	萧 克 李 锐 龚育之等	28.00	7.00
经历——我的1957年	和风鸣	29.00	7.00
让民主造福中国——俞可平访谈录	闫 建编	35.00	6.00
父亲的战场——中国远征军滇西抗战田野调查笔记	章东磐著	32.00	7.00
流逝的岁月——中央党史研究室前副主任李新回忆录	李新著 陈铁健整理	39.00	8.00
官场怪圈定律	李茗公著	46.00	8.00
回首“文革”——中国十年“文革”分析与反思	张化 苗采青等	59.80	9.00
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	薄一波	88.00	11.00
我的八十五年——从西北到东北	张秀山	43.00	7.00
夹边沟记事	杨惠惠	34.00	7.00
沉思录	马可·奥勒留著 何怀宏译	20.00	5.00
真理标准问题讨论始末	沈宝祥	39.80	8.00
走出个人崇拜——一个年代的反思	冯建辉	16.50	5.00
苏共亡党十年祭	黄苇町	22.00	6.00
1949年:中国知识分子的私人记录	傅国涌	30.00	6.00
九死一生——我的右派历程	戴 煌	21.00	5.00
民主是个好东西——俞可平访谈录	闫健编	35.00	6.00
李锐反“左”文选	李锐著	22.80	6.00
1978 我亲历的那次历史大转折			
——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台前幕后	于光远	36.00	7.00
尚未结束的历史——戈尔巴乔夫访谈录			
鲍·斯拉文著 孙凌齐 李京洲 李桂兰译		26.00	6.00
你所不知道的刘少奇	王光美 刘源等	20.00	6.00
抹不掉的记忆——共和国重大事件纪实	张广友	32.00	7.00
恍若隔世——回眸夹边沟	邢同义	24.80	6.00
庐山会议实录	李 锐	18.00	5.00

地 址 北京市西城区月坛南街69号

邮 编 :100045 收款人 炎黄春秋杂志社

(注 邮购三本书以上,可按总书价的10%付邮费)

《九死一生——我的右派历程》 虽然我们不再因为思考与表达成为“右派”,但那段历史我们仍不敢忘记。作者因提出“神化与特权”问题,开始了长达21年的“右派”生涯——一段疯狂、荒唐与阴暗的岁月在这里定格,一段惨痛、悲苦与抗争的生命历程在这里展开……

《李锐反左文选》 1957—1978年的20年,中共走了一条漫长的“左”的错误道路:反胡风,反右派,大跃进,反右倾,“四清”社教,直到十年“文革”灾难。历史上“左”造成的恶果甚多,其中整人(往死里整)是最大的恶果之一。

了解中国政治,必读李锐文章。

《经历——我的1957》 这是一段沉重的历史:1957年的反右斗争,作者和丈夫共同被划为右派分子,劳动教养。在1960年的大饥荒中,丈夫被活活饿死在甘肃酒泉夹边沟劳教农场里,作者的大半生经历了家破人亡的不幸和痛苦、受尽各种凌辱委屈,经受了—一个女性所难以承受的各种情感遭际与心灵创伤。这是血和泪写就的历史。

《苏共亡党十年祭》 通过反思苏东剧变,深刻剖析了苏共因失人心而失天下的历史悲剧,文章针砭时弊,“实话实说”,有很强的思想震撼力,在干部群众中引起了共鸣。

《问史求信集》 这是一部由江青第一任专职秘书阎长贵、中央文革小组办事组组长王广宇合著的问信文革史研究著作,书中他们本着对历史负责的态度,将亲身经历和了解的“文革”中的一些事情回忆和记录下来,供读者参考和研究。

《直言》 尝忆50年代,为鼓励放胆直言,毛泽东多次谈及,共产党员应有六不怕:不怕扣机会主义,不怕撤职,不怕开除,不怕离婚,不怕坐牢,不怕杀头。六者除头颅犹在,其余皆已身历。自谓因祸得福,筋骨耐劳,心志耐苦,世事洞明,胆气犹壮。今年80有余,回首平生,行止无愧天地,得失从不萦怀,素与“左”倾无缘,足以自慰矣!来日无多,请问尚有何眷恋?关怀莫过后来者,忆旧休忘左祸殃,但愿一言堂永绝,神州遍地百花香。——李锐

《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 这是一部回忆并带有研究性质的书,但不同于个人回忆录,书中不少情节是历史档案中所没有的,作者将了解的情况如实写出来,留给今人和后人探讨。

# “信阳事件”后刘建勋在河南



## ● 刘立强

河南,既是我的父亲刘建勋最后工作过的地方,也是他工作时间最长的地方,下面讲述的,就是我所知道的一些父亲主政河南十七年之初,如何克服“信阳事件”所造成严重困难局面的故事。

### 深夜受命 只身赴豫

1961年的春末夏初,时任广西区党委第一书记的父亲正在北京参加中央工作会议。

一天深夜,住在北京饭店的父亲已经吃了安眠药睡下,突然间电话铃声大作,父亲的保健医生李士峰同志拿起话筒,原来是毛主席要召见父亲。父亲马上起身,匆匆而去……

从中南海回来,父亲只告诉了李医生一句话:“主席、中央派我去河南。你先跟我直接去郑州吧!”

后来,中共中央书记处总书记邓小平在代表中央正式与父亲谈话时说:“建勋啊,你命苦,57年广西出了问题,饿死人,要你去。现在河南饿死人,又得你去!”(李友九、霍泛的回忆文章和复信)

关于邓小平与父亲谈话中提到的这两次调动,多年以后,一位叔叔是这样记述的:

“建勋原在广西任第一书记,在他未去之前,广西南部地区也是问题很多,许多人没有饭吃。他到广西以后亲自下基层调查研究,在农林政策上作了调整,允许农民把一部分房前房后的地自己耕作,这样很快就解决了当时的问题,稳住了广西大局。中央当时曾经下过正式文件,认为广西的办法是马列主义的。毛主席曾经说过刘建勋有文有武,是一个会下残棋的人。所以当河南处在十分困难之时,把他调到河南工作的。”(陈立华《刘建勋之事》)

父亲晚年告诉我,那时他对河南复杂、困难的局面早有耳闻,私底下曾向老领导李先念伯伯表示:“广西是个边疆小省,这些年我和韦国清同志合作得很好,各方面的工作也开始往上走。而河南地处中原,又是个人口大省,我担心完不成中央交给自己的重任……”

李先念伯伯同样也给了父亲很大的鼓励和支持。

灾情急似火,责任重如山。6月12日会议结束,父亲与继任的韦国清伯伯交接完工作后,就立即直接飞赴河南。7月22日,中共中央正式下令,任命父亲担任中共河南省委第一书记,同时兼任河南省军区第一政治委员。

动身前,父亲给母亲草草写了一张便条,大意是:“中央调我到河南了,你安排收拾好,就过来吧。”母亲晚年曾不止一次半玩笑、半当真地跟我和西林讲:“我和你们爸爸过了几十年,都快一辈子了,这才算是他写给我的第一封信……”

而事实上,这也是父亲写给母亲的唯一的一封信。

### 那时的河南

从1959年开始,中央和毛泽东主席就开始关注河南的情况。1959年庐山会议上,毛主席讲到:“……团结问题。统一思想,从中央到县委。河南120万基层干部,40万犯错误,3600人受处分,是个分裂。”(李锐著《庐山会议实录》增订本,第24页,河南人民出版社,1995年1月)

国务院副总理李先念、习仲勋同志先后来河南进行调查研究,都发现和批评了当时省委的一些错误做法。李先念伯伯看到信阳地区光山县人人戴孝、户户哭声的惨状后,对中南局的第二

书记王任重说：“西路军失败惨得很，我没有流泪，到光山看到这种情况流了泪。是痛心哪！”（信阳地区党史办撰《“信阳”事件始末》，中共河南省委党史研究室编《河南“大跃进”运动》，第459页，中共党史出版社，2006年9月出版）

据邓力群回忆说，李先念副总理回到北京，曾亲口告诉自己，“他去过的村庄，妇女没有一个不穿白鞋的。”李副总理还感叹地评论道：“如果把自留地坚持下来，小自由多一点，即使是反革命破坏，人也要少死好多。”（吴思著《我的极左经历》，《香港传真》，2007年第19期）



刘建勋

1958年1月，毛主席路过郑州，在专列上接见了河南省委主要负责同志，这位主要负责同志当面虚报粮食产量，还谎称一年内能够实现“四化”（绿化、水利化、机械化等），这些都不不得引起毛主席的怀疑和质问。

毛主席虽然是“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的倡导者和推动者，但他也是最早通过调查研究发现问题并着手纠正的中央领导人。在1958年11月召开的第一次郑州会议上，他即开始纠正“左”倾错误，多次发表重要讲话。会议前后，毛主席通过听取新乡、信阳地委负责人的工作汇报，进一步了解到许多真实情况，对河南“大跃进”运动中的一些错误做法提出了批评。在次年2月召开的第二次郑州会议上，根据毛主席的意见，党中央提出了整顿人民公社的“五十六字”方针。

1960年10月23日，党中央召开了华北、中南、东北、西北四个大区的省、市、自治区党委主要负责同志会议，讨论如何纠正“共产风”的问题，河南的“信阳事件”令到会的中央领导人十分震惊。26日，“信阳事件”的材料送到了毛主席手里，他立刻召集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以十万火急的方式请周恩来抓紧制定中央关于农村政策问题的紧急指示信，并亲自审阅修改，重申反对“共产风”，反对“一平二调”，强调要实行按劳分配的原则，允许农民保留小额自留地，经营小规模家庭副业，有领导有计划地恢复农村集市等。

毛主席还提出了1961年要搞一个调查研究年、实事求是年，试图开始进行全面调整。

1961年1月底，中南局领导陶铸、王任重主持召开了河南省委扩大会议，揭批省委存在的虚夸蛮干、欺上瞒下、闭塞言路、麻木不仁等严重问题。

6月中旬，再次临危受命、从广西来到河南的父亲，所面临的这样严峻的形势，父亲在工作岗位上时，从未对我们子女透露半字，到了晚年，他才零零碎碎地说到一些：

原河南省委对前省委第一书记潘复生、省委书记杨珏、省

委副秘书长王庭栋三位同志进行了残酷斗争和无情打击。中央领导曾经明确指示对潘复生同志的错误，要按照组织原则，通过党内批评和自我批评的方式，进行正常的思想斗争。可是一回到河南，那些人就将中央领导的话抛置脑后，在全省范围内掀起了“彻底揭发批判潘、杨、王反党集团”运动的狂潮。省委秘书长戴苏理不仅亲自组织机关干部对潘、杨、王三同志进行批斗、辱骂，甚至还发动郑州市的小学生向他们脸上、头上吐痰。潘复生叔叔被“下放”到黄泛区农场，一些少不经事的娃娃们被鼓动起来，站在他家窗台上，往里面的床上撒尿，害得他家几乎天天都要晾晒被褥。潘复生叔叔平反后，父亲与他刚一见面，潘复生叔叔就放声痛哭，长久不止。但在当时的情况下，父亲也只能以“老同志要正确对待党内斗争”等话语相劝。

盛夏三伏天，看管人员逼着杨珏叔叔蹲在省委机关大院的地上，不允许戴草帽，把水泥方砖缝隙里的小草一根一根地拔干净。子女们放学回来，想帮爸爸一下都不允许。家里就连子女们睡觉的小屋里，从墙上到床上，到处也都贴满了机关干部甚至还有小学生写的大字报。到后来，杨珏叔叔也没有逃过“下放”劳动二年的厄运。

王庭栋叔叔因为年轻，干脆被直接“下放”到了农村生产队，每天代替牲口拉犁耕地。他的妻子生下孩子的第二天，就被撵出了医院。当他平

反后第一次看见父亲时，一下子就蹲在了地上，像个孩子似的大哭起来。

父亲晚年向我们讲述这些情节时，哽咽不已、时断时续。

当时，河南全省的大批中、基层干部、党团员和知识分子也都受到了牵连、打击和伤害。而他们所谓的“错误”和“罪行”，无外乎就是诸如新乡地委第一书记耿起昌和洛阳地委第二书记王慧智“主张在农村人民公社内实行包工包产到户”、洛阳滚珠轴承厂厂长阎济民“主张在工厂内实行一长制”等等。这些干部后来都被划为右倾机会主义分子的典型，上报党中央，遭到了严厉的处分。所报材料还被转发全党。

那时，河南省的整个国民经济与人民生活都遇到严重困难。农业大步倒退，农业产品大幅度减产。1960年粮食产量比1951年还少16.5亿斤。其他如油料、棉花、生猪和轻工业品也都是下降的。全年全省人民群众的猪肉消费量人均居然只有0.15公斤。人口出生率由1957年的35%，下降到14%；人口死亡率由1957年的11.80%上升到39.6%，当年全省人口比上一年减少了161万人。中南局第一书记陶铸伯伯深入信阳、豫东等地调查研究，征求意见。他看见广大群众因为没有饭吃而身患浮肿病，又是难过、又是生气地说：“河南的领导干部，就是怕资本主义。”

1962年春，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

总理李富春到河南考察时，吃着掺上野菜的面团子感慨地说，如果河南人民都能吃上这个就好了。”（王维群著《回顾河南的“大跃进”运动》，张林南著《关于“反潘、杨、王事件”》，中共河南省委党史研究室编《河南“大跃进”运动》，第491—492页，第342页，中共党史出版社，2006年9月出版。）

灾情开始蔓延后，那时的省委一直是采取漠视、封锁、高压的态度，仅信阳一个地区扣压的干部、群众上告信件就超过了12000封之多。

这其中有一个极端的例子：一个村子有23名党员，饿死了20名，剩下的3人联名给毛主席写了一封血书，请求赶快救救他们和群众，血书到了省委秘书长戴苏理的手中，被戴扣压，并且戴还表态要查处“肇事者”。对戴苏理处理“血书”的表现，中南局第一书记陶铸伯伯非常不满、非常气愤。

后来，河南省委主要负责同志代表省委在给党中央、毛主席的检讨中，终于承认：由于他们领导的失误，在农村的一些地方甚至出现了“无人村”，“许多村庄成为废墟，令人目击而泪落”。他在省委常委扩大会议上作检讨时，也曾沉痛地说道，这是河南省“建国以来的最大惨案”。

### 周总理教父亲“磕头化缘”

父亲接手面对的就是这么一个中原大省。保健医生李士峰告诉我，父亲刚到河南时，尽管他整天不是召开会议、就是谈话调研，累得不行，但是到了夜里，却还是难以入睡。父亲常常从临时住的招待所溜达出来，沿着金水大道走进紫荆山公园，在小山包上的亭子里，一坐就是大半夜。而陪着他的只有李士峰医生。“民以食为天”。在那个节骨眼上，父亲首先必须解决的燃眉之急就是5000万人的吃饭问题。他赶到北京开会之机，当面向周恩来总理求教。周总理是全中国人民的当家人，当时还亲自兼任中央“瓜菜代”领导小组的



60年代中，刘建勋（中）在平顶山矿务局一号矿井下视察（摄影：魏德忠）

组长。周总理对父亲说：“我给你想一个办法，就是挨门向住在北京饭店的几个省委负责人去磕头……”（陈立华《刘建勋之事》）

周总理的一席话，让父亲茅塞顿开！他使出浑身解数，先后找山西的陶鲁笳叔叔借面，找湖南的张平化伯伯、湖北的王任重叔叔要米，找广西的韦国清伯伯弄木薯，找安徽的曾希圣伯伯要红薯干。事后，陶铸伯伯还曾带着父亲专程赶赴属于华东局的安徽，向省委第一书记曾希圣伯伯和安徽省委表示了感谢。到后来，父亲连远在大西北新疆的张仲翰叔叔都拜到了，而张叔叔给的是当地特产马铃薯。父亲晚年在自己的《自述》中是这么回忆的：“我到河南后，先抓救灾，保证中央给的钱、粮食确实让群众收到。我从新疆张仲翰那儿弄土豆，他是我的河北老乡，是献县人，和纪晓岚是一个村子的，当时是新疆建设兵团副司令员……”

我的二姨父张林池时任东北农垦总局党委书记，正好也在北京参加中央的会议。一大早，父亲就敲门闯了进去，两手抱拳、开门见山说道：“闲言少叙，救人要紧，能给多少粮就给多少。”二姨父知道河南的灾情，更了解父亲的脾气，当即答应了给几千吨。父亲喜笑颜开，连坐都没有坐，马不停蹄地转身就又跑到隔壁房间，继续敲门求粮去了。

父亲还把周总理支的招儿告诉给了河南的各级干部，号召他们都想方设法为老百姓找、借、要一切可以吃的东西。最后，就连已经离职在家养病的母亲也被父亲动员起来，她给老战友、广东湛江地委第一书记孟宪德叔叔写信求援。孟叔叔接信后，立即组织群众赶制了一批红薯干，很快运到了河南。

父亲除了按照周总理教给的招数，四处化缘、八方磕头，以求尽早解决河南人民的吃饭问题外，以他为首的新省委还作出了一个在计划经济年代算是胆大包天的决定，即要求全省铁路的大小火车站，对无钱购票的逃荒灾民，一律不得阻拦或扣留，统统给予放行。

四十多年过去了，当年率领林县人民修建红旗渠、后来曾先后担任河南省委常委和公安部主要领导的杨贵叔叔感叹地对我说道：“就是这一条，你爸爸不知道救了多少河南的黎民苍生啊！”

当然，除了河南省委千方百计争取兄弟省市无私援助，同时不遗余力组织广大人民群众抗灾自救外，最主要和最关键的，还是在党中央、国务院的统一领导和部署下，由李先念伯伯牵头挂帅，采取了“挖东补西”、“抽肥补瘦”等许多正确措施，向全国各地的灾区紧急调运了大批粮食和其他救灾物资，这才使得全国各地包括河南的灾区群众得以度过生死攸关的关口。

那时，灾区群众翘首以待的救济粮款、过冬衣被、生产用具、种子、肥料、农药和大小牲畜，城镇人口不可或缺的粮油供应、日常生活用品、煤电需求……一桩桩、一件件，千头万绪、日理万机，压在父亲的肩头，压在父亲的心口，他那早已治愈多年的肝炎复发了，眼底视网膜也再次大面积出血。医生警告他必须休息！

可是，父亲没有休息，他始终坚守在自己的岗位上！

## 团结和选配干部队伍

当时，父亲除了必须迅速解决“五风”造成的恶果，组织救灾，恢复生产，稳定局面外，还要妥善处理“反右”以来原省委对干部、知识分子队伍三次大的伤害和分裂，大刀阔斧地平反冤、假、错案，真诚、热忱地团结犯错误的同志一道工作。

父亲首先面临的的就是应该如何全面、客观、慎重地认识和对待原省委主要领导同志。事隔多年后父亲透露，他到任不久，就有人在一次省委常委会上，提出要面对面地批斗这位原省委主要领导同志，企图重演批判潘复生叔叔的一幕。而那时该同志的胰腺已经完全丧失了功能，每天的胰岛素用量为100—120个国际单位，超过一般患者10倍以上。父亲认为这样做，既不符合当时的中央指示精神，也有悖于党的一贯干部政策，甚至根本是不人道和不道德的，当场予以拒绝。

父亲在晚年，只要一提到原省委这位主要负责同志，总是说，他是位老资格、老学究，对群众工作、党内斗争没有多少实际经验，是周围的几个“黑参谋”毁了他（“黑参谋”一词是毛主席对原省委主要负责同志身边那几个人的评价原话——作者注）。同时，父亲对这位主要负责同志辜负毛主席、党中央的信任，搞“假、大、空”那一

套,给河南的人民群众和干部队伍带来了难以估量的伤害,也是非常的不满和遗憾。关于这一点,我在采访父亲的老战友杜润生、陶鲁笳、杨珏叔叔等人时,发现他们也都有强烈的同感。

其中,杨珏叔叔晚年说到,他听张玺叔叔的大女儿张林南大姐讲,1952年11月,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撤销平原省,将其并入河南省之前,中央曾征求过即将离任的河南省委第一书记张玺叔叔的意见,究竟由谁来接任新的河南省委一把手职务较为合适。张玺叔叔出于对时任河南省委第二书记的这位老同志的了解,向中央推荐的人选是平原省委第一书记潘复生叔叔。中央采纳了他的建议,任命潘复生叔叔为合并后的河南省委第一书记,任命这位老同志为第二书记。后来证明,潘复生叔叔在河南工作期间思路是正确的,是有成效的,可遭到了诬陷和打击,而这位老同志取而代之后,却惹下了一场滔天大祸。

这位原省委主要负责同志于1962年4月被中央免去省委第二书记和省长职务(由驻越大使何伟叔叔接任省委第二书记),调中南局任负责文教工作的书记。

与此同时,一大批受到错误批判和处分的各级领导干部陆续得到了平反并恢复了工作。为了作好这项工作,由父亲亲自挂帅,省委成立了专门班子,省委宣传部副部长冯登紫叔叔就是其中的成员。多年后,他在回忆父亲的文章中写道:“省委给潘复生、杨珏、王庭栋同志的平反决定,建勋同志抓的很紧,要求很严格。我们几个同志,根据他的指导思想和要掌握的原则,都是白天写,晚上向他和省委书记杨蔚屏汇报,听取修改意见。他总是字句斟酌,力求准确。他精力充沛,在研讨中,不时讲点故事、笑话,提提我们的精神,有次竟讨论通宵。”

另外,经过严格的和长期的考察,一些实事求是、德才兼备、业绩突出、群众拥戴的地市县和大型企业的领导干部脱颖而出,先后走上了省委领导岗位。一大批中青年干部也相继担任了地市委第一书记领导职务。

父亲在河南主政17年,正是依靠了以他为代表的务实勤勉、艰苦奋斗的广大干部作为核心骨干和中坚力量,才能够率领人民群众共同支撑起了中州大地度荒救灾、保障民生、恢复生产、发

展经济、稳定时局的宏图大业。

## 尊重和发挥知识分子的作用

在领导河南全省广大人民群众进行生产自救过程中,父亲首先十分注意发挥本地工程技术人员和专家的重要作用。

至今我还记得在父亲的办公室里,经常是大大小小、花花绿绿的地图摆满一地,大人们或坐或站,或蹲或跪,还有的人索性脱了鞋,直接在地图上踩来踩去。他们时而小声商议,时而大声争论。由于抽烟太多,满屋子烟雾缭绕,仿佛着了火似的。因为我住的小屋紧挨着父亲的办公室,所以我经常是伴着隔壁透过来的噪声和灯光,再加上挡也挡不住的浓浓烟味,恍然入梦的。

父亲晚年在《自述》中讲完救灾后,话锋一转:“然后,我就是抓治碱,修水利。治碱工作量小一点。还修了不少的水库。后来,这些水库都发挥了很大的作用。”

河南省水利厅有位专家,名叫陈惺,他因为公开反对“以蓄为主”的做法,50年代末被扣上“严重右倾错误”的帽子,先是下放到南阳农村劳动锻炼,后来又全家被贬到了信阳。父亲调到河南后不久,了解到自然灾害主要是因治水错误而起,他就四下里追问当年水利界有没有反对派?大家反映说:“有,叫陈惺,现下放在信阳地区水利局。”

闻听此言,父亲大喜过望。据陈惺叔叔回忆,1961年9月的一天,还戴着“右倾”政治帽子的他突然接到通知,说父亲要见他。

一见面,父亲就直截了当地对陈惺叔叔说:“我来信阳做农村调查,你陪我去。”当天下午,他们到了罗山县,晚上听取了县委的汇报。散会后,父亲对陈惺叔叔说:“我来到河南后,对存在的问题有了初步了解。当前首先要办两件事:一是落实‘三级所有、队为基础’,重振农民的生产积极性;二是整修被严重破坏的水利工程,恢复农业生产能力。”

随后,陈惺叔叔陪着父亲走了七个县。父亲白天看、晚上听,抽空儿他俩还走街串巷地四处转悠。父亲被所看到的悲惨现象和所听到的荒唐事例深深震惊了。每天晚上,父亲总要留下陈惺

叔叔,两个人一聊就聊到深夜。父亲给他留下了“十分好问,而且喜欢打破砂锅问到底”的印象。直到父亲眼疾复发,需要马上回郑州治疗,他们才依依不舍分手。临行前,父亲让他作好回省里工作的准备,并指示信阳地委速速放人。但由于当时信阳地委主要领导从中作梗,直至一年后,经父亲再三催促,陈惺叔叔才回到了省水利厅。

通过认真调查豫南和豫北平原地区治水的经验和教训,父亲明确指出,“现在平原治水的问题那么普遍,那么严重,这不是具体工作的问题,而是方针的问题!”又经省委班子的反复研究,到了1961年的冬季,省委正式提出了“以排为主,排、灌、滞兼施”的平原治水方针。为了稳妥起见,父亲特别提出,在党中央、国务院“以蓄为主”的政策未改变之前,“以排为主”的口号只在省内讲,对外暂不提。

又经过了一年多的实践检验,1962年初,在“七千人大会”的预备会期间,父亲向党中央、毛主席写报告,反映了平原治水问题,这下子可把问题捅了天了。不久,周总理召开了冀、鲁、豫、皖、苏、京五省一市的第一书记座谈会,经过认真讨论,最后周总理代表党中央、国务院明确表态:“平原治水要因地制宜,该蓄的蓄,该排的排,不能只蓄不排。”从此,在华北平原地区延续多年的“以蓄为主”的错误做法开始得到纠正。

3月中旬,国务院副总理谭震林、水利部副部长钱正英视察冀、鲁、豫三省接壤地区的水利情况,接着在河南召开了新中国治水史上著名的范县会议。父亲在会上介绍了河南的情况,并提出了三条有针对性的措施。最后谭副总理、钱副部长做了总结讲话,父亲提出的措施被全部采纳,“以蓄为主”给平原地区带来的恶果逐步被消除了。

自1961年到1965年的5年间,河南省的有效灌溉面积由116.5万公顷恢复到174.7万公顷,旱涝保收田由4.5万公顷发展到96.3万公顷,粮食总产量由684.5万吨增加到1227.5万吨,广大农村由濒临绝境转为复苏和发展。(陈惺著《深切怀念刘建勋书记》和《“三主治水方针”的对与错》)

在那个火红的年代,父亲不仅尊重、爱惜河南本地的知识分子人才,对于外来的专家学者,

他同样也是坦诚相待、全力支持。

中国科学院南京土壤研究所的研究员王遵亲先生在回忆文章中写道:“34年前(1965年),我有机会参与向时任河南省委书记的刘建勋同志汇报中科院在封丘开展的除灾增产科学试验研究工作。时间虽短(约2小时左右),但印象深刻,其情景犹如发生在不久之前。当时他外表黑瘦有神,穿一身深色中山装和一双黑色圆口布鞋,手握一杆当地特有的竹根做的短旱烟袋,吸着当地土制黄烟丝,态度平易近人,言谈亲切、朴实,善待他人意见(尤其让我们感受到他对知识分子的尊重);记得当其聚精会神地听到汇报中使其感兴趣之处,竟脱了鞋,两手往沙发扶手上一撑,蹲上沙发议论问题时,顿使汇报气氛轻松活跃起来,加上他那溢于言表的正直不阿气质,显示出令人起敬的‘老八路’作风和形象,更令人经久未忘。”

中科院学部委员(相当于现在的中科院院士——作者注)、土壤所的熊毅教授率领科技人员在试验中取得了井灌并排初步成功后,父亲先认真听取了汇报,随后又赶到农田现场察看,最后他决定马上在全县和整个新乡地区推广应用。此后虽经“文革”十年,熊毅教授的科学试验几无中断,其成果迅速得到推广应用,在除灾增产方面发挥了巨大而深远的作用。(王遵亲著《深切悼念河南原省委书记刘建勋同志》)

与此同时,父亲还坚持了对科技工作的重视和倾斜政策,使得河南全省的“五小”工业取得了突飞猛进的发展,在全国名列前茅。所以,父亲才在晚年不无感慨地说道:“河南是个七八千万人的大省,‘五小’工业搞起来很不容易,发挥了不小的作用。”

## 顶住压力,借地渡荒

六十年代在河南农村中流传着这样一个顺口溜:“跟着吴芝圃,白受三年苦,跟着刘建勋,粮食吃一斤。”这完全是因为以父亲为首的新河南省委大胆地在全省农村推行了借地渡荒的救急措施。这个政策被广大农民群众誉为“救命政策”、“拴人政策”和“叫人(回来)政策”。

虽然,父亲在晚年的《自述》中只是简单地

了一段话：“‘借地’是陶铸同志支持我们搞的，后来由我承担责任，向主席、中央做了检讨。”其实，这里面还是充满了曲折和坎坷的。

父亲刚上任时，河南全省正面临着相当严重的困难，特别是粮食困难。他多次主持召开省委常委会议，研究解决粮食问题，提出今后的工作方针，从各方面支援农业，支援市场，首先解决全省人民的吃、穿、用问题。为了贯彻这一方针，省委采取了一系列措施：动员各行各业支援农业，大力恢复和发展农业生产；在农村实行牲畜分户喂养，果树、花生分户管理，田间管理分段包工到人等多种形式的责任制，调动农民的生产积极性；恢复手工业，扩大农具和日用品生产；恢复小商小贩，活跃城乡市场；派人到有关省求援，解决部分粮食及代食品；在全省农村实行行之有效的借地渡荒救急措施。（《河南省志·人物志》第一章的《刘建勋》小传。第六十卷，第185—186页，河南人民出版社出版，1997年第一版）

这个政策的雏形——“农村人民公社生产管理实行小段包工和记工方法”，是在新乡等地区试行地段包工和“父子田”、“夫妻田”、“姐妹田”等措施，并产生了良好效果后，省委经过认真总结和研究出台的。时间是1961年的7月27日，距中共中央决定父亲调任河南的正式命令公布之日仅仅一个月零五天，这也正体现了父亲的执政决心和工作作风。

在陶铸伯伯为首的中南局的支持下，经国务院李富春副总理同意，这个政策以河南省人民委员会布告的形式昭告天下、正式推行。

之前，父亲还特意征求了曾长期负责中央农村工作的老领导邓子恢伯伯的意见，并得到了他的明确支持。

“借地”的第一阶段，于1962年3月在土地盐碱化严重的豫北、豫东4个专区22个县展开，惠及约四百多万人。5月第二阶段就扩大到约有四千多万人口的地区。接下来，借地就在全省势不可挡地普遍实行开来。到了6月下旬，省委专门召开了常委扩大会议，决定迅速实行田间管理到人、包工到人的责任制，同时还对过去因实行责任制而受到批判的干部予以平反。

所谓“借地”，具体就是把集体的耕地“借给”农民三五分，让农民自己耕种，加上小片荒、自留

地，平均每人可以达到一亩左右，不计口粮，不计征购，完全由农民支配，让农民能吃饱。

很快，河南广大农村重新恢复了勃勃生机，千万农民的脸上绽开了久违了的笑容。到处是麦浪滚滚、人欢马叫的喜人景象。老百姓编的顺口溜，恰恰正是朴实、厚道的河南老百姓对自己父母官的最高赞誉和褒奖。

灾难深重的河南渐渐恢复了元气。1965年全省的财政收入由1962年的7.6亿增加到10.2亿，年均递增10.4%。（张向持著《解读中原》，第61页，作家出版社，2002年1月第1版）

父亲看到了“借地渡荒”政策的成效，满心欢喜。他没有忘记自己奋斗了四年的南疆红土地的战友和人民，热心地向老战友、时任广西区党委秘书长的霍泛叔叔建议说：“广西也有灾情，是否也可采取这个办法？请转告区党委考虑。”（霍泛的复信）

就在河南实行“借地”后不久，父亲开始逐渐感受到了来自各方的压力。据父亲的老战友杜润生叔叔讲，那时河南省委的“借地渡荒”政策和安徽省等地的“包工包产责任制”一样，都是今天农村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前身和先声，可当年国务院负责农业领导工作的一些同志，私下里却认为要向中央反映，应该批判父亲的“右倾”错误。

于是，就在省委正式实行借地渡荒政策未及半年后，父亲又不得不以个人名义，向党中央、毛主席检讨。父亲写检讨报告的过程自始至终得到了中南局领导的指导和帮助。记得在那段日子里，我从大人们的话里话外隐隐约约地察觉到，父亲在给“上面”作检查，家里面没日没夜的人来人往、大会小会，空气显得格外地紧张、凝重和不祥。

自1961年7月父亲调到河南后，他认真总结了前任省委领导工作中的沉痛教训，在党中央、国务院和中南局的正确领导下，团结全省广大干部和人民群众发愤图强、艰苦奋斗，拼搏数载，到了1965年前后，终于使得中原大地上的这个泱泱大省基本摆脱了前些年“左”的影响，逐渐走出了“信阳事件”的阴霾。

（责任编辑 徐庆全）

# 民国代总统周自齐

● 丛彩娥 杨世谷

周自齐(1871年—1923年),字子虞,山东单县人,一生活跃于晚清民国政坛。在晚清时期出使海外,创办清华学堂(清华大学前身)。民国初历任山东都督、中国银行总裁、交通总长、陆军总长、财政总长、农商总长、盐务署督办等要职。1922年任北洋政府国务总理兼教育总长,代行过民国大总统职务11天。作为一个受过西方教育的旧官僚,他有爱国的一面,维护国家利益,发展农工商金融业,做过大量对民生有益的事情;同时他又拥护袁世凯复辟帝制。在当时军阀混战武夫当国的特殊年代,正是这种动荡的社会,铸就了他矛盾而又复杂的传奇人生,留给后人许多人生第一。

## 创办清华第一人

清华大学,我国名校,即将迎来百年华诞,周自齐是其首创者。1908年,周自齐从美国留学回国,任职外务部。同年美国政府决定退还庚子赔款中的部分款项,用于办学校和送中国学生去美国留学。清政府在1909年6月成立了游美学务处,周自齐出任总办,他又主持筹建游美肄业馆(后改名为清华学堂),聘请教员,招收学生460人,在这里按美国标准对学生进行短期训练,然后择优送去美国留学。清华学堂于1911年4月29日正式开学,周自齐是学堂的监督(校长)。从选定校址、购地、建校,到聘任教员,周自齐费尽心血。清华学堂于辛亥革命后改为清华学校,1928年正式更名为国立清华大学。周自齐可说是清华大学的第一任校长,对以后清华大学的赫赫盛名有开创之功。周自齐在任游美学务处总办和清华学堂监督期间,亲自主持选拔工作。他选拔留美学生的原则是“宁缺勿滥”,学生的中文要通达,身体要强壮,品行要纯正,家世要清白,还不能有破相。经过考试

和精心挑选,前后共选派三批、180名留美学生。这些留美学生中很多人以后都成了国家的栋梁之才,如梅贻琦、赵元任、竺可桢、胡适等。

## “二十一条”密约最先曝光者

“二十一条”密约是一战结束后日本欲强加给中国人民的不平等条约,更是引发伟大的“五四”反帝爱国运动的导火索。1915年1月,日本驻华公使日置益奉命向袁世凯政府提出臭名昭著的“二十一条”密约。袁为赢得日本对他称帝的支持,竟冒天下之大不韪,命外交总长陆征祥、次长曹汝霖与日置益秘密谈判,准备予以承认。为使谈判不被世人察觉,日置益曾恶狠狠地警告袁世凯说:“不管在什么情况下,都不得泄漏给其他国家,特别是美国和英国。否则,日本将被迫出面干涉,即使你大总统也难免于牢狱之灾!”

英国《泰晤士报》在华记者端纳得知日本向中国提出无耻的“二十一条”后,决心查个水落石出,让真相大白于天下。他与许多同情中国的外国人一样,认为在日本的侵略要求面前,中国保护自己的最好办法,就是把这件事公开,以激起全世界的巨大反响,迫使日本人缩手。

端纳与北洋政府的高层人士有密切的关系,其中与财政总长周自齐尤为莫逆。他来到周府,对周自齐说:“我写出我认为日本可能提出的所有要求。你用铅笔划掉错的,保留对的,如有漏掉之处,也请你暗示一下。我再拿这张纸到其他政府官员那里去,同样搞它一遍。我迟早会得到‘二十一条’的正确文本,而人们却永远不知道我的消息是从哪里弄来的。”周自齐不由得哈哈大笑,叹道:“高明!”他们坐在周府花园的荷花池畔,像是推敲学术问题似的,开始工作。端纳开始猜写。满洲、山

东?聘请顾问?改组军队和警察?兵工厂?铁路?然后加上一些主语、定语或动词,就变成了一句句比较完整的条款,凑满二十一条为止。周自齐手捏铅笔,这里画画,那里点点,看看八九不离十,掷笔而去。随后,端纳拿着这张不成熟的条款,挨个找了一些知情者。“这就是二十一条?”端纳疑信参半。但他相信,这份猜写的文本八九不离十。一旦披露,同样会引起中外舆论的极大轰动。他立即向英国《泰晤士报》和美国《纽约时报》发去电讯,披露了这则内幕消息。同时,他又往访美国公使芮恩施,请其将“二十一条”密约的内容转告美国国务院,期望美政府对日本有所行动。此后,端纳怀着一种大功告成的喜悦,等待着两报会以大字醒目地刊出他的报道,轰动世界……

从伦敦传来了回音。《泰晤士报》主编致端纳电报:“请告消息来源,我才发表你的报道。日本驻英使馆已予以否认。”端纳如遭当头一棒。他费尽心机搞来的重大内幕消息,竟被人弃如敝屣。正在端纳彷徨无策之际,端纳想到了澳洲同乡、袁世凯政治顾问莫里循。

莫里循早年也担任过外国报纸的驻京记者,后被袁世凯聘为政治顾问,是个著名的“中国通”。他广泛参与了北京政府的核心机密,对袁世凯与日本政府的政治交易感到不安,多次劝袁慎重,惟收效甚微。他的确拥有一份“二十一条”密约的副本,深锁于保险箱中。

端纳与莫里循,当年同为澳洲名记者,一南一北,饮誉中华。他们相互之间,保持着非常友好的关系,后莫氏脱离报界,但对端纳的一举一动,仍十分关注。

当端纳前来拜访莫里循时,莫氏已经心领神会。一番寒暄之后,他站了起来,一双手按在办公桌的一堆文件上,另有深意地望着端纳:“对不起,我到书房去一下就来。”端纳颇为紧张,不知这项“计划”能否达到预期的目的。他估计,莫里循去书房,是金蝉脱壳之计。他的一双手按在办公桌的文件上,是否就是一种明显的暗示?等莫里循推开内室的门,走了进去,端纳快捷地从沙发上站起来,一边在身上搜摸雪茄,一边挪到了办公桌旁。他的一双眼睛紧紧盯住那堆文件,恨不得伸出手,统统把它抓进自己的皮包里。第一份,不是,第二份,也不是。身后的门吱呀一声打

开。端纳马上回来,原来是一位身穿白色长袍的中国仆役,端着茶壶和茶杯进来。“就放在这里吧。”端纳指着茶几说。仆役冲好茶,仍肃立在屋内。端纳从兜里掏出一点小费,塞进仆役的手掌,又说:“去给我拿一盒火柴来。哦,附近还有卖雪茄的吗?”仆役退了出去。这次,端纳不再犹豫,也不再细看,索性从桌子上抽了好几份文件,塞进皮包里。稍顷,莫里循又走了进来。“对不起,老兄,让你久等了。”莫里循搓着手说。“没关系,乔治。无论如何我该走了。”

回到下榻的东方饭店,端纳关好门,外挂“有事,请勿打扰”的小牌子,开始检视“偷”来的文件。当他翻检到第三份时,不由得眼睛放光,这不是他日思夜想的“二十一条”正式抄本吗?同他原来猜写的文本相比较,内容出入并不大,主要是他对日本人的苛刻条件有所低估。他说:“日本人的恶毒程度,是每一个真正的人难以想象的!”端纳立即把“二十一条”文本提交给英、美两国公使,并得到他们的确认。美国《纽约时报》首先刊出了来自北京未署名的关于“二十一条”的头条新闻。

## 任职最短的总统与主持译制第一部影片等

袁世凯复辟帝制失败后,周自齐被通缉逃亡国外。逃亡回国后,受到北洋政府的继续重用。1920年曾任职靳云鹏内阁财政总长,1921年12月6日,作为出席华盛顿会议代表高等顾问周自齐电请辞职,维护了国家主权。1922年4月8日,被徐世昌任命为署理内阁总理兼教育总长。同年6月2日至6月11日,徐世昌被逼下台后,周自齐带领内阁阁员摄行大总统职,这是我国历史上任职时间最短的总统,但在当时却避免了中国的“无政府状态”。黎元洪复职后,周当了财政整理委员会的挂名职务。此时,他对政治已心灰意冷,遂退出政界,去美国游历。其间他考察了美国的电影工业,筹办孔雀电影制片公司。他邀请中国第一部电影年鉴的主编程树仁担任译制工作,译制了第一部影片《莲花女》,这是外国影片配上中文字幕的开端,对中国电影业的发展具有划时代的历史开创意义。

此外,1918年2月,他还参与创办了天津扶

轮公学；1918年12月周自齐为南开大学创办认筹40万元公债票；1920年7月，改组北洋保商银行，任董事长；同年，创办中国经济讨论处，实为中国近代政府经济调查之滥觞；1921年，投资枣庄矿区中兴矿局；周自齐对家乡《单县志》的编修极为关心，并于1922年4月捐赠大洋一千元，亲任督修，成为新中国成立以前最完备的善本；周自齐十分喜爱李簧的诗，亲自校点李簧《梅楼诗存》，并编印作跋。

## 我国植树节的最早呈准者

3月12日，是中国现在的植树节。而中国最早设立植树节，是由周自齐呈准大总统设置的。

孙中山是中国近代史上最早意识到森林的重要意义和倡导植树造林的人。辛亥革命后，民国四年（1915年），在孙中山的倡议下，由农商部总长周自齐呈准大总统，以每年清明节为植树节，指定地点，选择树种，全国各级政府、机关、学校如期参加，举行植树节典礼并从事植树。7月21日批准后，通令全国如期遵照办理。

民国十七年（1928年）北伐完成后，4月7日由国民党政府通令全国：“嗣后旧历清明植树节应改为总理逝世纪念植树式”，民国十八年（1929年）2月9日农矿部又以部令公布《总理逝世纪念植树式各省植树暂行条例》16条。而国民政府行政院农矿部长易培基遵照孙中山先生遗训，积极提倡造林，于民国十九年（1930年）2月呈准行政院及国民政府，自3月9日至15日一周间为“造林运动宣传周”，于12日孙中山先生逝世纪念日举行植树式。北方地区以3月初旬，寒气未消，还不适于栽树之故，特规定植树式仍于3月12日举行外，造林宣传运动周延至清明节行之。并由该部公布《各省各特别市各县造林运动宣传周大纲》7条，以便全国照办。

## 周自齐墓地及我国最早的记录遗体告别镜头

1923年10月21日，周自齐病逝，葬于京西门头沟城子村西面的九龙山山坡上。北京市门头沟区有许多名胜古迹，仅城子村西九龙山的山

坡上，原来就有两处。一处是龙泉寺；一处是周家坟。

“周家坟”不大，但建筑极为讲究，尤具民国时期建筑特色，具有很高的历史文物价值。

当地百姓最初并不知道这是我国近现代史上著名的外交家、政治家、教育家、经济学家、实业家周自齐的墓地，只知道墓主人是晚清的一个大官，因被仇家所杀，所以无头。墓地多次被盗，传说墓里葬的是一颗金头。周自齐金头的传说，或许是其墓被盗的原因。

2000年，借天安门金丝楠木流失事件的讨论，一篇叫作《金丝楠木搭驴棚》的小文，发表在《北京日报》上。虽然这篇文字浅陋得不能再浅陋，但仍受到了广大读者的错爱。周自齐的家人通过北京日报社找到了笔者，并热情邀请笔者到他们的府上去看一件“宝贝”。在他们的府上，记者看到了记录周自齐从逝世到殡葬全过程的纪录片，这是我国最早记录殡葬全过程的纪录片。此片长约18分钟左右，英文解说词。片中，从周自齐逝世，到黎元洪、段祺瑞、靳云鹏等政府要人的亲自祭悼，从暂厝停灵到发丧出殡等等宏大场面应有尽有。片中，当时北京的城市面貌、人们的着装打扮、民风民俗都得到了真实、准确地反映。这样规格的葬礼绝不比两年后孙中山的葬礼逊色。而且除孙中山外，民国的其他任何大总统、总理好像都没有留下这样的纪录片。周自齐作为当时在任时间最短的代总统，怎么能够拍的如此清晰、气派和及时？按当时的摄制技术，在短期内能拍出这样质量的纪录片，是不可思议的。由于当时科技水平所限，这部片子原始的胶片非常易燃，而且由于年代太久，影像质量也差了许多。现在看到的这部片子，是通过周自齐在好莱坞工作的家人，用最新科技方法和先进技术，对片子重新做了处理，并加进了英语的片头、片尾解说词的。

“文革”结束后，门头沟区政府和文化文物部门非常重视对包括周家坟在内的门头沟所属各处文物的保护工作。尤其对周家坟作了力所能及的修葺。对墓体进行了大修，重新树立起了部分石碑坊，墓周围挖了排水渠，树立了区级文物保护单位的标牌，新铺了到墓地的柏油道路等等。

（责任编辑 萧 徐）

# “总统府”对面的纪念碑

• 智效民

应“中央研究院”近代史所邀请,我于5月1日前往台北,参加“纪念五四90周年学术研讨会”。会议的主题是《胡适与近代中国的追寻》。马英九先生不但出席这次会议,还坐在主席台下恭恭敬敬地聆听著名学者林毓生演讲。这让我想起学界的一件轶事。早在抗日战争前夕,竺可桢请马一浮去浙江大学授课,马一浮提出应该让学生“登门请业”,理由是“古闻来学,未闻往教”。因此我以为,马英九能够亲自“登门请业”,而不是让学者去“总统府”讲课,体现了他对学问的尊重。这种尊重对于政治领导人具有示范作用。

第一次到台湾旅行,本想到各地玩玩,但由于允许停留的时间只有7天,便只能在台北逛逛,顺便买点旧书。转眼间已经是5月7日,因为我预订了晚上的机票,所以还有一个白天的时间可以利用。于是我与同伴相约,想去参观一下市政府、市议会、国父纪念馆、中正纪念堂、自由广场和“总统府”等政治性场所。中午时分,我们来到“总统府”附近的丁字路口。台湾“总统府”是一座五层楼高的西洋式建筑。建筑物中部,还有一个高高的塔楼。远远看去,犹如鹤立鸡群,颇为壮观。

由于烈日当空,“总统府”周围没有一个行人,我们打消了前去参观的念头。正在这时,我发现马路的另一边好像还有一个很高、很独特的建筑。走近一看,上面镌刻着“白色恐怖受难者纪念碑”几个大字。这让我吓了一跳。自从懂事以后,只知道“白色恐怖”是共产党对国民党的指控,没想到这种指控居然以纪念碑的形式,赫然屹立在台湾“总统府”的对面,这怎能不让人感到惊诧?

为了弄清真相,我对它进行仔细观察。纪念碑分两部分:主体部分由黑色的方形基座和一个几十米高的三棱柱组成。三棱柱下部呈暗红色,

上部是白色,给人以庄严肃穆的感觉。纪念碑的另一部分是一面护墙,有两米多高,呈半圆形围绕着三棱柱展开。护墙并不完整,到边缘处有断开部分,使墙体形成一个个石柱。护墙正面镌刻着一段碑文,读完之后,让我感到强烈的震撼。碑文不长,仅300余字,故照抄于下:

台湾实施戒严期间(1949年5月20日-1987年7月14日)及其前后,有许多仁人志士遭受逮捕,羁押或枪杀,时间长达四十多年。此种惨痛事实形成恐怖气氛,笼罩整个社会,成为台湾人民挥之不去的梦魇,影响社会发展至深且钜,史称“白色恐怖”。

昔日威权体制下,统治者高高在上,迫害人权,剥夺自由,造成无数生命的陨落,家庭的破碎和种种不公不义,举国上下遂长期处于不安与恐惧之中。1990年代之后,在国人流血流汗,持续努力下,台湾走出威权统治,逐渐形成自由民主的社会。

保障人权,追求社会公平正义,是民主国家所服膺的普世价值。我们不仅要追求历史真相,追究责任,更应记取教训,使执政者不再重蹈覆辙。因此建立此碑,祈愿台湾从此成为民主、自由、人权和正义的国家。

白色恐怖受难者纪念碑委员会谨立  
2008年4月7日

在这里,有必要对碑文中“台湾实施戒严期间”和“昔日威权体制”略加解释。

先说“戒严”。上世纪40年代末,基于内战原因,南京国民政府于1948年12月10日宣布在全国实行戒严。一开始,由于台湾离战场较远,不在戒严范围之内。1949年5月19日,时任台湾省政府主席的陈诚秉承蒋介石旨意,通过台湾“警备司令部”颁布戒严令,宣布从5月20日开

始,台湾地区处于“战时动员状态”。随后,当局又颁布涉及党禁、报禁等内容的100多项管制法令,对整个社会进行全面控制。据有关人士统计,在戒严期间,台湾共发生与政治有关的案件29000余件,牵涉人数高达14万人左右,被处决的大约有三四千人。直到1987年7月14日,蒋经国为了顺应时代的变化,才颁布“总统令”,宣布从15日零时起解除戒严,取消党禁和报禁。于是,台湾民众把这一天当作宪政的开始,把这历史上时间最长的戒严称为“白色恐怖”时代。在台湾期间,我曾经与出租车司机、著名学者、社会名流、书店老板等各方面人士接触过,许多人都提到1987年7月14日,可见这是台湾历史上划时代的一天。

说罢“戒严”,再说“威权”。近年来学界对威权主义的讨论很多,但由于“学术性”较强,往往增加了理解的难度。有些人甚至以“亚洲四小龙”的经济奇迹为理由,为威权主义涂脂抹粉,大唱赞歌。看到这个纪念碑以后,我发现大陆学界对威权主义的理解,与台湾民众的认识大相径庭。另外,这次台湾之行,我在书店淘到一本旧书,是台湾传记文学出版社出版的《沧波文存》。其中有一篇解释威权主义的文章,也可以印证我的这一“发现”。

文章说:“威权主义是一种反民主的政治哲学,也是一种反民主的政治制度。”它有三个特征:第一,威权主义政权无须征得被统治者的同意。第二,政府的权力不受宪法的限制。第三,政府往往以“决策”的名义独断专行,并对言论、选举进行严格控制。

文章还说,从历史上看,威权主义的理论根据大约有三类。一是“神权论威权主义”,这种

类型在政教合一的国家比较普遍。二是“制度化威权主义”,这种类型需要盲目服从,与黑格尔国家至上的理论有关。三是“超人论威权主义”,这种类型受叔本华和尼采的影响,认为某个人或一群人具有超人智慧,因此他们永远是正确的。他们的行动不应该受到质疑,他们的权力不应该受到限制。这些解释,与白色恐怖受难者纪念碑的用意基本上一致。

看到白色恐怖受难者纪念碑之后,我的内心久久不能平静。从纪念碑落款来看,所谓“白色恐怖受难者纪念碑委员会”可能是个临时机构。但是它却代表了台湾民众的基本诉求和一致愿望。正因为如此,他们才把这个纪念碑矗立在“总统府”对面,其目的就是为了强调:“保障人权,追求社会公平正义,是民主国家所服膺的普世价值。我们不仅要追求历史真相,追究责任,更应记取教训,使执政者不再重蹈覆辙。”

(责任编辑 萧 徐)

## 公 告

凡未收到稿酬的作者,请将联系地址、邮编和身份证号码告知我社。

联系人:肖林 电话:010-68525374

海内外炎黄子孙心爱的读物

# 炎黄世界



邮发代号 **46-159**

每期定价6.5元 全年**39元**

半年**19.5元**

本刊由《家庭》原总编辑李骏主持编辑出版工作

立足广东	面向宇寰	栏目众多	扣人心弦
历史感悟	新锐观点	人物挖掘	争论热点
社会世相	民心民愿	监督反腐	揭露冤案
老少咸宜	雅俗共看	朝阳园地	办给青年
一流内容	一流容颜	全彩印刷	价格低廉

国内统一刊号: CN44-(Q) 1126  
 电话: (020)-85171024 85171214 E-mail: yhsjzz@126.com  
 地址: 广州市永福路42号永福楼西塔504室 邮编: 510095

# 纪念端午节的意义

• 周有光

端午节是汉族的民间传统节日,始于春秋战国时代,后来成为汉族和少数民族的共同节日。“端、初”同义,“午、五”相通,“端午”就是“初五”。

民俗学者认为,端午节来源于古越人的图腾祭祀,插艾蒲,饮雄黄,挂香囊,禳灾异,辟邪驱恶,都是公共卫生的原始防疫。

但是我国代代相传,端午节是纪念屈原投江自尽的受难日。龙舟是到水中去寻找屈原,粽子是给屈原的灵魂祭奠,屈原则是中国知识分子的受难象征,正像耶稣是以色列人的受难。

屈原(前340—前278),战国时期的楚国贵族,才思超逸,辅佐怀王。秦楚争霸,“横则秦帝,纵则楚王”。屈原主张联齐抗秦。怀王轻信谗言,放逐屈原,与秦结盟,被秦俘虏,客死于秦。顷襄王即位,继续亲秦,再度放逐屈原。屈原流放,辗转沅湘,哀吟苦忆,目睹亡国。秦将白起破郢都,灭楚国。屈原痛不欲生,自沉于汨罗江,以死殉国,时为(前278年)夏历五月初五。

屈原之死,震动了中国知识分子的灵魂。端午节从纪念屈原受难的节日,经过两千三百年的绵延,发展成为尊重知识的节日,解放知识分子的节日。

怀念古代为的是教育今日。儒家教育重视“以史为鉴”。华夏历史,从甲骨文算起,有三千三百年文字记载。阅读古书而不知“以古鉴今”,读书何用?纪念端午节,自然地由屈原受难联想到秦始皇的焚书坑儒,历代的文字狱,以及晚近的反右运动。

秦始皇焚书坑儒(前213年):下令焚烧《秦纪》以外列国史纪,谈论《诗》《书》者处死,以古非今者灭族,禁止私学,以吏为师;次年,将四百六十多名方士儒生坑死于咸阳。历代专制暴君,禁

锢思想,一字成狱,中国社会由此千年停滞。晚近的反右运动,直接摧残五十五万人,连带亲友二百五十万人。提倡“知识无用论”、“知识越多越反动”。毛泽东得意自言,秦始皇的焚书坑儒,跟他的反右相比,只是“小巫见大巫”!在知识成为国力基础的全球化时代,以“社会主义革命”的名义,实行如此残暴的集体清洗,在世界历史上少见。

屈原被否定,放逐异乡,心力交瘁,投水自尽,这跟反右运动中知识分子被否定,下放劳动改造,折磨而死或失望自尽,历史轮回,何其鲜活!田汉的自沉、老舍的自沉、储安平失踪,一代知识精英被摧残。近年来不再谈论此事,可是人民心中念念不忘。言论可以控制,记忆无法禁止。中华民族的特色就是有强劲的历史记忆。勿忘过去,警惕未来,历史才能正道前进。

端午节成为法定节日,是复兴传统的信号。全球化时代是双文化时代,世界各国都在奉行国际的现代文化,同时发扬本国的传统文化,以本国的传统特长增益国际的现代文化,以国际的先进制度改进本国的传统文化。这就是纪念端午节的意义。

学者谭如为先生作《端午节有感》,词正意切,敬录如下:

黄钟毁弃,雷鸣瓦釜;文人噩运,鱼肉刀俎;  
每临端阳,瓣香瑶圃;思接千载,徜徉江浒;  
靳尚媚上,郑袖善舞;台榭山丘,屈平不腐;  
长吟离骚,诗魂翘楚;美人香草,比兴媚妩。  
后昆垂范,前贤踵武;砺我精神,生气虎虎;  
浩然正气,流芳千古;佳节永志,屈子风骨。

(2009端午,时年104岁)

(责任编辑 萧 徐)

# 『国进民退』是一条死胡同

● 张鸣

眼下,趁国际金融海啸民企出现暂时困难,中国土地上演了一幕“国进民退”的大戏。垄断性的大型国企,大举进军一般竞争性行业,中粮入资蒙牛,中化收编民营化肥厂,五矿和中钢收编民营钢厂,甚至一些民间做的比较好的书商,也面临国企的收购或者入资。民营企业最发达的浙江,则掀起一股政府入资民企高度监管的高潮,据说,宁绍一带,真正酝酿由政府向民企派遣党委书记,人称,新的公私合营开始了。有识者对此表示了极大的担忧,著名报人笑蜀表示,这是以市场化的名义去市场化,最终会危及国民整体利益和国家经济安全。

在1949年之后,中国曾经有过一次以国家的名义吞噬民营经济的事件,在历史上,被称为社会主义改造。中国因此而建立了计划经济的模式。不过,今天的国进民退,似乎并没有人想要真的来一次社会主义改造,重回计划经济。这场国进民退的热潮,很有些类似抗战胜利后的中国。那时的中国,恰好也发生过一场以接收敌产的名义开展的国家吞噬民间资产的运动。

抗战胜利后,国民政府对沦陷区敌产的接收,被外界批评为“劫收”,属于公认的国民党统治失败的重要原因。但是,以往的批评,往往多局限于劫收过程中,国民党军政官员的腐败,所谓接收大员的“五子登科”(金子、票子、房子、车子、女子)“三洋开泰”(崇拜西洋,痛骂东洋,抢劫大洋)等等丑行。其实,当时的接收,虽然在过程中,接收人员没少中饱私囊,但这个所谓的接收敌产活动,主要是一场国民政府的国有化运动。

据张忠民先生的研究,国民政府战后的接收,虽然规定了如果确系敌伪抢劫自私人者,可以发还本主,“但在由各接收区自行处理的9000多家中小工矿企业中,发还的仅有314家,占总数的3.41%,标卖的1384家,占总数的13.74%,其余的均通过不同形式和途径改组成了各种类型、分属于政府各部门的国有企业。据经济部1946年7月的报告称,在经济部接收的2411家敌伪工厂中,除了951家未处理以外,有1219家(其中大部分为大工厂)由经济部直接经营或移转至别的机关经营,标卖给民营的只有114个单位,还不到接收工厂总数的5%。”就这样,凭借接收,国民政府在一般竞争性行业建立了庞大的国有企业。如中国纺织建设公司、中国蚕丝公司、中国石油有限公司、中国植物油料厂股份有限公司、中国渔业股份有限公司、中华水产公司、中国丝业公司、中国盐业公司、中华烟草公司等。(参见张忠民:《略论战后南京政府国有企业的国有股份减持》)

当时所谓的敌产,标准非常模糊。不光指日伪所有的产业,凡是能找到跟当时沦陷区敌伪政权或者个人有点关系的,就都算敌产。试想,按中国商人的经营习惯,凡是要开展经营活动的,只要留在沦陷区,就或多或少要跟当家的政权有点关系。于是,大批的民企就都变成了敌产。因此,据当时的报道,接收一开始,上海几乎90%的企业都关门倒闭。然后大量的变成了国有资产。不仅如此,当时的国民政府为了填充战争期间过于空虚的国库,居然公然掠夺沦陷区老百姓。当时,汪伪政权的货币中储券,实际上要比国民政府的法币值钱,1元中储券顶20元法币也不止。但是,胜利后,国民政府财政部居然规定,法币和中储券的比率为1:200,过了几个月,在强烈的舆论压力下,才改为1:5,规定在4个月内兑换完毕。

国民党政府的这种“国进民退”的运动,显然与其建党建政时变形的国家主义和列宁主义思想基础不无关系。在建政之初,确立中、中、交、农四大国有银行金融体系之时,就已经初见端倪,抗战期间,更是凭借战争的特殊环境,大有斩获,而战后则大获全胜。然后,其大获全胜之际,便是全面覆灭之时。国民党政府靠劫收民企建立的庞大国企,尤其是在一般竞争性行业建立的国企,基本上都是赔钱的,最大的作用,是成为党政要员的钱袋。劫收导致民企垮了,接着,国企也垮了。国民党的经济危机出现在政治危机和军事危机之前,接收要负很大的责任,并非仅仅借机贪污这一个方面,最最主要的,还是这场由接收引发的国有化运动。

由历史反观今日,情势虽有不同,但道理其实一样。在计划经济的条件下,一般竞争领域的国有企业虽然低效,但还能维持。在市场条件下,则维持都难。这些领域原来都是国企的一统天下,之所以让出来,是市场化过程的必然结果。换言之,是因为它们在市场化环境中活不下去。国企能解决中国经济的问题,中国就根本不会有改革。再次国有化,不仅国家税收会大幅度锐减,连基本的就业都保证不了。谁都知道,当今之世,城镇人口就业的百分之六十,农村人口的百分之九

十都是民企解决的。现在垄断性大型国企之所以财大气粗,在很大程度上不仅因为它们垄断了国家资源,享有国家特许,垄断金融能源交通电讯,而且因为迅速发展,无所不在的民营企业,尤其是中小企业的发展,为他们提供了广阔而纵深的市场。

所以,如果当今的国进民退之举,如果目的是为了吞噬和挤走民企的话,等待它们的,大概只有失败,跟当年的国民党政府一样的失败,到那时候,中国经济的前景只能有一个,重走回头路。

## 读 者 来 信

阅读了贵刊 2009 年第 6 期上海社科院王维江先生的鸿文——《五十年代历史学家的命运》,获益匪浅。但文中存在一些失误。

第 40 页及注释 1,《励耕书屋问学记——史学家陈垣的治学》当为《励耘书屋问学记——史学家陈垣的治学》。该文又称陈垣先生建国前长期任教于美国教会办的燕京大学,这也是不准确的,陈垣先生应该是长期任教于德国教会办的辅仁大学,并任校长(1929—1952),在燕京大学只是兼课。

陈 鹤

## 按 需 出 版

2004 年我公司在国内率先与出版社合作开展按需出版业务。5 年来引领行业潮流,已为 300 多位国内作者出版了学术专著、回忆录、游记、各种形式的文学作品,也为加拿大、澳大利亚等华人作者出版了著作赠送亲属友人,精美的按需出版图书深受广大作者欢迎,成为品味高雅的礼物和更有价值的纪念。

按需出版是新的数码出版方式,具备四大优点:(1)解决由于印数少而不能出版的难题。(2)即需即印,总是新书,零库存。(3)避免资金一次投入过多印数过多造成浪费。(4)出版周期短,一般在 1—2 个月。重印在 1—2 周。

适用范围:个人著作、长辈遗作;书法、绘画、照片、奖状复制;家庭、家族需要保存、传世的专辑、画册;单位或个人旧书翻新重印;单位少量用书。

印数:100 册以下最合适。

## 继 续 征 稿 (50 本起印)

资金投入:自费。以 50 本(大 32 开)为例,基本费用 200 页 2000 元,300 页 2800 元。如需加增录入排版、装帧设计制作,则共为 4000~4500 元上下(含 2 页彩插)。具体价格视稿件形式、种类、字数情况确定。详细报价可电话或信函咨询。

稿件内容文责自负,但需符合我国出版法规。没有书号,不能销售,仅作为留世和赠送。作者享有著作权。

正文纸张:70 克胶版纸(黑白)、128 克进口铜板纸(彩色)。印刷质量:上乘。

所有出版的图书均事前签订合同。

联系地址:北京市海淀区清缘西里小区 1 号楼 1509 号,邮编:100192,热线:13521531088 陶女士。

电子信箱(Email):173736757@qq.com

北京地区上门服务,送书到家。外地邮寄。

北京文苑文化发展公司

# 我告发了同学宋尔仁

## • 老鬼

文革前,同学们在私下相互交谈中,也都特别鄙视向老师告密的人,虽然背地里有人干过这事,但在公开场合,告密总还是招人恨的,不光彩的。

但是文化大革命开始后,只要对方是反革命、五类分子、阶级敌人,就可以不择手段对待。检举揭发阶级敌人受到鼓励,告密也成了政治觉悟高的表现。那时候一切行为只要打着革命的旗号就可以理直气壮进行。因为革命至高无上。

我们北京四十七中高三二班同学宋尔仁是一个比较复杂,比较特别的人。他家住在门头沟煤矿。隐隐感觉他出身不会太好。因为他从不说父亲是干什么的,似乎刻意隐瞒。他喜欢文学,激动的时候,曾经在宿舍里大声背诵莱蒙托夫或普希金的诗。但有时候又特粗鲁,能说些矿工才说的那些脏话。对招惹了他的初中小孩,敢抽耳光,毫不手软,也不怕背上欺负弱小的名声。

无论团干部怎么劝,他也不申请入团,不靠近团组织,对班主任敬而远之,政治学习能不参加就不参加。一句话,他在班里属于比较后进的同学。

给我印象最深的是他曾公开大骂女人。当周末,宿舍里没几个人时,他声色俱厉地对我说:“天底下最坏最坏的是女人!你知道吗?最毒莫过妇人心,比毒蛇蝎子都毒!”说这话时,他的眼睛闪闪发光,唾沫星子四溅。

当时正是青春期,对女性充满了好奇和神往。他这番言论,让我感到极其反常。心想,他肯定是在这方面受过伤,跟女的有过交往,被女的抛弃过,伤了心,才那么恨女的。一个高中生,小小年纪这方面就有了事,弄不好别是个流氓。再加上他对自己的经历,对老师或其他同学的想法很少说,让人看不透他内心深处到底在想什么,所以我对他总保持着戒备之心。

他平时寡言少语,不爱在人多的地方说话。

为人挺讲义气,自己吃点小亏,别人沾他点便宜,从不计较。

明知道不能以貌相人,但还是要受外表影响。宋尔仁喜欢梳个大背头,上唇留着一络小胡子,又是个三角眼,都让我联想到坏人。有一次借书,他原形毕露,更加深了我对他的不好看法。听图书委员说,他要借一本《红与黑》,但学校规定这种书只借给老师,学生不借。图书委员好心给他另外借了本革命小说。他却勃然大怒,跟图书委员吵了起来。警告图书委员别把他当猴耍,借什么书用不着你管……眼珠子几乎要瞪出来,凶恶异常。

宋尔仁对积极要求进步的人都比较冷淡,对我却是个例外。那时候我想入团想疯了,成天扫厕所,一周写一次思想汇报。有人说我是“假积极”,动机不纯,可宋尔仁对我很好,觉得我比较



1967年初,老鬼(右)与哥哥合影

直率。后来我又因为打了那位背后说我坏话的同学,挨了个记过处分,同学们都与我疏远,唯宋尔仁跟我见面依旧打招呼,不嫌不弃。他从家里带来的红薯、花生、瓜子总主动塞给我。上山摘来的白杏、酸枣什么的,也都给我吃过。

可我只是表面上跟他不错,享受着他对我的信任和友好。内心里对他却充满警觉,觉得他思想复杂,居心莫测,别被他拉拢腐蚀……

文化大革命开始后不久,一个周末他回家了。宿舍里没有人,我坐在他床铺上,发现他枕头下面放着一本日记。出于好奇,我就偷看了。

那正是1966年7月份,工作组当政的时候。结果大吃一惊。他的日记里充满了对社会,对形势的不满。说什么“现在乌云笼罩着祖国天空”,“我们的国家处于最危险的时刻”,“人民在受苦受难!”……

好反动呀!他把文化大革命的中国说成是“乌云密布”。

我当即把这本日记给了一个要好的同学看。他翻了几页后也斩钉截铁说:“绝对是反动日记。”

我问:“怎么办?报告工作组?”  
“对。”

于是我和同学一起很兴奋地把这本日记交给了学校工作组。同时很为自己过去对宋尔仁的怀疑得到了证实而沾沾自喜。

工作组马上派人把宋尔仁从家里抓了回来,单独禁闭。并在大会上宣布宋尔仁书写反动日记,恶毒诬蔑我国的大好形势,诽谤文化大革命,隔离审查。

据知情者说宋尔仁最初表现很老实,蔫不出溜,终日埋头写检查交待。刚开始也没有人动手打他。直到某次,一喜欢拳击同学参加审问,冷不防给了他一拳,力量很大。宋尔仁当时正坐在椅子上,被打了个后滚翻,从椅子上翻了过去。

就在那天夜里,他逃跑了。以后彻底销声匿迹,再也没有回学校。

可惜,我举报了宋尔仁也没当上左派,连军训也没资格参加。工作组把我留校,整日跟班上的几个出身不好的“狗崽子”一起学习。

自从宋尔仁逃走之后,一晃多少年过去,我们班的同学谁也没有见过他。

流亡美国期间,倍感孤独和寂寞,经常回忆过去。宋尔仁的影子也常浮现脑海。我这才感到自己这辈子最对不起的就是宋尔仁。干的最缺德的事就是举报宋尔仁。

可能由于他住在门头沟煤矿,班里多数同学内心瞧不起他。我跟他同学三年,住同一个宿舍,吃同一个食堂。尽管他对我不错,数次为我说话,我却用两面派的手段对付了他。表面上和和气气,骗取着他的好感,内心却对他小心防范。

——就因为他留着小胡子、三角眼、梳大背头,外表像个坏蛋,就因为他大骂过女的,可能跟女的有过什么事,就因为他对自己的出身躲躲闪闪不说。

啊,宋尔仁看错了我。我不像他想象得那么襟怀坦白,我一直对他笑里藏刀,起码内心深处对他的戒备就伪装得让他感觉不到。所以文革开始,我偷看了他的日记后就毫不犹豫地交给了工作组。自以为这是革命行动,自以为自己站稳了革命立场,自以为自己揪出了一个革命的敌人。

同学任道昂说我踩着别人往上爬。在宋尔仁这件事上确实如此。

30多年之后,当我写《血与铁》,想找宋尔仁核实情况,当道歉之时,才发现他早已经不在人世。

据同学说他大约1968年初到了黑龙江省德都县黑龙江兵团一师六团。干过喂猪、种菜、采石等工作。平日寡言少语,没什么朋友。大约1974年娶了一个当地女人。他特别能抽烟喝酒,等到吐血时,才看病,但为时已晚。1977年因为肺结核病故于北京,留下一个儿子。

可以说,我交了他的日记本对他的杀伤是巨大的,影响了他一生的命运。这是我这辈子干的最缺德的事。我对不起宋尔仁。

革命啊,革命啊,多少罪恶假你之名。

特写在此处,让世人知道,并恳请同学宋尔仁在天上的亡魂原谅。

马波,又名老鬼,自由写作者。1947年生于河北阜平,1968年从北京去内蒙古锡盟西乌旗插队,1976年到山西大同矿机厂当工人,1977年考入北京大学中文系新闻专业,1982年后在文艺出版社、法制日报任编辑,1989年应邀赴美国布朗大学当访问学者,著《血色黄昏》、《血与铁》、《母亲杨沫》等书。(责任编辑 吴思)

# 不 朽 的 库 克

## ——读《弑君者：把查理一世送上断头台的人》

● 毕 苑

1649年,英王查理一世被送上断头台,这震撼人心的一刻揭开了人类近代历史的序幕。约翰·库克(John Cooke),审讯查理一世的特别法庭的副总检察长,就是我们的主人公。他的控诉词结束了一个时代、开辟了一个时代,他创造了历史却籍籍无名。

约翰·库克(John Cooke)出生于一个社会地位较低的贫穷家庭,父母都是农民,一生为生计劳碌奔波。库克作为“贫困生”在牛津完成了大学教育,读书期间勤俭节约、品行端正,后来进入律师公会学习法律。和当时很多青年一样,他攒钱“壮游”欧陆,眼界大开,信念日增,回来后在格雷律师公会成立了自己的事务所,开始执业。库克的正直品格和清教徒的坚贞信念日益显露,经常表达对社会改革和法律改革的想法,这些想法往往是“道德上正确,政治上却不正确”,他的性格预示了他的职业生涯必然充满坎坷。

作为一名律师,库克的正直在同行中早有口碑。他相信法律职业应当为公共利益服务,律师实践给他增添了勇气,他决定揭露和批评他所处时代司法体制的不公正。他的清白廉洁使他得到“白色库克”(white Cooke)的绰号。

律师职业不仅训练了他的正直勇敢和社会责任感,更加深了他对于英国政治的深刻认识。1637年的船舶税事件是一个重要标志。查理一世为聚敛财富、应付庞大的王室开销,下令增收本应经过议会讨论的赋税——船舶税。懦弱的议员和法官们向国王低下了头,最终国王高于法律。但是库克运用职业知识,看穿了船舶税案的漏洞:“如果国王可以在必要时采取任意措施,并且必要与否又由他自己裁定,英国的形势只会越发

严峻”,他说,英国不应该像一块草坪,“国王想割就割”。(注:见《弑君者:把查理一世送上断头台的人》P45,下同。)

在随后更有历史意义的斯特拉福德案件中,开始刺激库克对于“叛国罪”的认识。他想不到,这个罪名此后成为他最熟悉的话题,并且把它送给了国王查理一世。

1640年,失去了理智的查理大军横扫苏格兰,这场闹剧加剧了斯图亚特王朝覆灭的命运。查理的宠臣斯特拉福德伯爵受命于君王,成为战争的领头人。但不幸的是王军一战即溃,形势极为不利。查理一世为了弥补枯竭的财源,不得不再次召开议会,这就是“长期议会”(the Long Parliament)。但议会已经成为反对国王的革命力量,它的第一个议案就是以“叛国罪”控告斯特拉福德伯爵,把这个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权势人物关进伦敦塔。这个案件作为英国革命的开端被载入史册。

按照1351年的《叛国法案》规定,“叛国罪”是指“预言或希望国王死亡,发动战争对抗国王或投靠国王的敌人。”(P49)大部分议员认为,是斯特拉福德“使国王误入歧途”,他应该承受叛国罪的罪名。但是库克不同意这个看法。他冒着被归为斯特拉福德一派从而可能葬送职业前途的风险,坚持认为斯特拉福德不是战争的最后责任人。不过库克的辩护终究是杯水车薪。虽然查理对这位忠实的执行者表示了同情,但他还是向议会妥协,斯特拉福德因叛国罪被斩首。库克在事业刚起步的时候接手了这桩重案,开始认识到:种种情况的错误应该直接归咎于国王,独裁残暴的管理和征讨罪名不应该由它的执行者来承担。

如果说这个时候库克对于“叛国罪”的认识还没有成熟,那么1645年6月的纳斯比一役,查理一世在和克伦威尔新模范军交手时的表现,就让库克彻底明白了。在这场经典的、决定性的战役中,克伦威尔大胜,王军伤亡惨重。重要的是,保皇党藏有国王的来往书信被截获,信中证明,国王一直希望把爱尔兰反叛者的军队引入英格兰来帮助他,并与王后密约以法国资金和军队作为回报。这件事使国王彻底丧失了民心。值得注意的是,这样的罪行对任何人来说都是叛国罪,它使库克产生了一个无人敢想的提问:如果任何人都是如此,为什么国王就不能?

对“叛国罪”的疑问提升了库克对于君主制的思考。

英国革命的结果无需多说,查理一世面临着革命力量的裁判。但这个审判毫无先例可循——首先也是最重要的问题是:审判的合法性何在,审判权力从何而来?因为无论按照什么条例,没有一个法院可以对君主施行审判。就像查理一世后来在法庭上始终带有挑衅的提问:“我想知道你们凭什么权力把我带到这里?”君主的权力高于一切,这是君主制度赋予查理的傲慢。如何在法理上找到坚实的基点,以合法和合乎正义的程序,给这桩历史性案件一个合适的裁决,时代把库克和他的同道推到了前台。

如果从11世纪威廉征服算起,到库克的年代,封建君主制在英国已经存在了600年之久。如此漫长的社会结构足以使君主世袭制度作为一种观念深深融入社会意识中。库克首先批驳君权神授的“天然”观念。他认为君主世袭制是上帝命定的观点是错误的,也就是说,君权并非神授。他从《圣经·撒母耳记》中寻找支持,证明君主制是人类违背上帝意愿的恶行,从而使审判国王有了道德上的支撑力量,接着他又论证国王在统治中的种种罪行。而议会这时也通过宣告:“上帝之下的人民是一切正当权力的来源”,“英国议会的下议院,是人民所选出的、代表人民,拥有这个国家的最高权力”,这个权力“无需获得国王或贵族院(上议院)的同意或协助”。这个革命性的宣言陡然把人类历史推上了一个台阶,“可以说是现代历史上第一次由立法机关明确提出民主的原则”。(P143)很快下议院通过法案,在事实上和理

论上赋予审判以合法性。

1649年1月10日,特别法庭通过了对于库克担任副总检察长的任命。面对紧张而危险的局势,库克没有丝毫犹豫,欣然接受了“如同从天而降的呼召一般”的任命。(P147)经过多年的法律实践和对英国人民生存状况的深切体验,还有战争对英国带来的伤害,库克坚信,一个导致千万英国人民死亡的战争政策无论如何都不符合公益,国王是导致这个国家无数自由人民被杀害的罪魁祸首。

审判在庄严肃穆的威斯敏斯特大厅举行。1月20日第一次开庭。大法官庄严宣布:“带人犯上庭。”这个宣告也是史无前例的。憔悴的查理出现在众人视线中。副总检察长库克出场了,他掷地有声地宣告:

“我代表英国人民并且以他们的名义,向法庭控诉我身旁所坐的英国国王查理·斯图亚特构成严重叛国罪及其他严重罪行。”(P158)

经过多次开庭和证据阶段,法庭各位委员和顾问们厘清了案件事实。库克越来越强烈的意识到,对于英国人民来说,长远之计就是再也不要让英国为国王所累。国王对于人民的蔑视使他坚定了自己的结论:君主制必须和国王一起灭亡。(P177)

我们来看库克这篇历史性的控词:

“现任英国国王查理·斯图亚特……阴谋破坏这个民族古老的基本法和自由,取而代之以独裁专制政府。他用武器弹药,在这块土地上对议会和整个王国发动了一场残酷的战争,导致遍地荒芜、国库耗尽、贸易萧条、成千上万人民死于非命以及其他数不清的恶果——所有这些严重叛国罪行,足以将查理·斯图亚特定罪……”(P142)

“本人约翰·库克,代表英国人民控告查理·斯图亚特的叛国阴谋和其他罪行构成暴君、叛国贼、杀人犯和英国人民公敌……”(P151)

库克这篇伟大的控词结束了国家元首不受审判的传统,君主豁免权从此不再存在。

大法官布拉德肖则以契约思想论证国王的失职和罪行。他说,“在国王和他的人民之间存在一个契约协定,国王的即位宣誓就意味着契约开始履行。”(P188)这个“契约”思想,可比洛克、卢梭等“社会契约论”哲学家要早几十年!最后大法

官正气凛然地宣判：

“本法庭宣判查理·斯图亚特，作为暴君、叛国者、杀人犯和本国善良人民之公敌，应被处以身首异处的死刑。”(P189)

审判结束了。

1月30日，在伦敦白厅前宽阔的街道上，在大好的日光下，行刑者砍下了查理一世的头。

处决国王后库克面临的战斗仍然严峻。法律容易更改，不容易更改的是人心。深入社会血液中的对君主制度的习惯成见，往往是革命之后产生复辟的一个原因。悲剧最终发生。

查理一世处死后10年，1660年斯图亚特王朝复辟。库克和克伦威尔、大法官布拉德肖成为查理二世排除在特赦之外的三个人。但是克伦威尔和布拉德肖已经去世，历史的重压将由库克独自承担。

库克知道自己时日不多，但他没有像有些议员那样忏悔，而是坚决拒绝强加给他的所有罪名。他没有财产、没有“关系”帮他赎罪，有的只是对于法律和上帝的信念。他无所畏惧、充满自豪又不无遗憾地说：

“我们反对特权，追求普世的权利，我们为公共利益而斗争，要不是这个国家更热衷于奴役而非自由，我们本已建立起全民选举制度来保障所有劳苦大众的福祉。”(P296)

库克对自己还是小婴儿的女儿，怀着绵绵亲情和深深歉疚，写下感人肺腑的短信。因为他知道，作为“弑君者的女儿”，她将背负父亲沉重的罪名。

他还写下了宽恕，包括判他有罪的陪审团和法庭，包括出卖他的同胞。痛人心扉的话语打动了许多人。不过他一再表明，他的良心没有任何不安，没有任何遗憾。他就像一艘航船，在漫漫长途后驶进生命的港湾——“我将不再重回世上。”(P344)

相比查理一世的审判，库克的审讯要潦草的多；相比处决查理一世的庄严肃穆，库克的行刑则是残酷的多。死刑令写得明白：

“你们将被倒拖着赴死刑地处以绞刑，在还未咽气时砍下头，割掉器官，取出内脏，如果还未死亡，将忍受烈焰的灼烤，并砍下头颅、五马分尸，你们的残肢将任凭国王处置。”(P333)

库克作为人类进步的代价惨遭杀害。但他为英国社会留下了很多开创性的宝贵思想。他在一本引人瞩目的著作《为法律教授和法律职业的辩护》中，敦促议会履行《大宪章》的承诺，加快司法改革。他推崇正义，认为没有公正就没有和平，法律是公正的保护者，理性是法律的根基。在复辟阴影严重威胁着共和国的暗淡日子里，库克还起草过一份告公民书，其中的一系列法案试图用一套宪法来保证法庭能够取消恶法。他明白宣布：只有通过合法审判，才能拘捕自由公民，否则不得剥夺公民的生命、财产和自由权利——它的精神和1689年议会通过的《权利法案》相通，后者堪称美国宪法的前身，对世界历史都产生了重要影响。库克还提出律师不得选择自己的辩护对象，即著名的“计程车规则”。

“弑君者”约翰·库克在当时是一个被保守派恨之入骨的名声远扬的勇敢律师，为他描容绘形的人——本书的作者杰弗里·罗伯逊(Geoffrey Robertson)同样不是法学界的无名之辈。作为一名国际知名的人权律师，他是英国王室法律顾问、联合国塞拉利昂特别法庭法官，参与过起诉皮诺切特(Pinochet)等的案件，也参与过对审判萨达姆·侯赛因(Saddam Hussein)的法官的培训，他的著作在法学界影响巨大。

为什么把库克在历史的海洋中钩沉出来？这建立在作为库克的同行，作者对人类法制和文明发展历程有深切认识的基础上。

库克的所作所为可以说是英国革命的一面镜子。作者认为，英国革命的最大特点就是革命者通过法律——《大宪章》、《权利请愿书》和普通法，来证明革命的正当性。(P91)库克一生都是希望通过立法制度，获得大众的支持。他用事实论证了：统治者因犯谋杀罪或实施暴政而接受审判，是合法的。作者指出库克那个时代的价值：1641年至1660年，是一个律师的时代。律师们提出了许多到今天依然宝贵的社会理想：议会自主、司法独立、反对随意逮捕拘留、有权保持沉默、宗教宽容等等——一句话，反对任何暴政。

作者多次强调，很多历史教科书都没能让人领会到1649年取得的成就，有些读物只是一味夸张、渲染处决查理一世的场景，而库克总是落在克伦威尔的影子里。作者要人们(下转87页)

# 德国卫生部长专车失窃案

● 亚思明

7月25日,德国卫生部施密特部长到距离部长办公室2000余公里处的西班牙海滨城市丹尼亚(Denia)度假。部长本人是飞往度假地的,但她的司机却是千里迢迢地开着她的公车去的。不凑巧的是,27日,当地一名盗贼撬开阳台门的铁栏杆,将屋内的司机迷倒,偷走了桌上的车钥匙及一些个人物品。部长专车失窃案立即成为德国各大媒体的新闻热点。

新闻媒体的喧闹,让施密特部长及其所在社民党尴尬万分,让窃贼也有些发慌。不过,窃贼好过关——西班牙警方在离布兰卡海岸事发地点仅25公里处发现了丝毫未损的专车,据推测,连日以来占据媒体显要位置的舆论风暴终令偷车贼慌忙扔下手中的烫手山芋望风而逃。但是,施密特部长却无法逃脱,德国各大媒体饿虎扑食般地向施密特发起了猛攻,她以及她所在的社民党成为德国公众质疑的对象。

## 施密特只能退出影子内阁

对于施密特专车失窃案,德国媒体的主要疑点在于:施密特为什么要不远千里地将公务用车派往度假海岸?如果仅仅是为了便于参加官方活动,为何不能就地租车呢?《柏林日报》公开质疑卫生部长前往西班牙阿利坎特参加德籍退休移民的会议不过是为“公车私用”提供借口。这“公车私用”的背后,则是“浪费纳税人钱财”,惯以寻衅滋事为己任的《图片报》则不怀好意地给事件真相划上了一个大大的问号。

在德国,对官员来说,“浪费纳税人钱财”是个可怕的指控;之所以可怕,这个指控会令德国公众群起而攻之。在四年一度的议会大选进入磨刀霍霍的备战阶段,经济危机下的德国政府的债

务负担远比历史上任何一个时期都要沉重,再也没有什么比“浪费纳税人钱财”更能刺激选民神经的指控了。一项普普通通的专车失窃案,搅动德国政坛就成为必然的事情了。

面对媒体的质疑,德国政府有关方面必须像小学生面对老师的提问一样,规规矩矩地回答问题。第一个出来回答问题的是德国联邦卫生部。它做出的解释是:向施密特所在的度假地点派送公车的做法更为“经济”。他们在写给联邦议会预算委员会的信中算了一笔细账:使用奔驰S级专车外加司机的全部开销为3200欧元。其中包括440欧元的汽油费、240欧元的高速公路费,以及2520欧元的专职司机的差旅补助。该车还顺便给部长女士捎去了一套“简易办公设备”,其中包括打印机、计算机、纸张等等。因为联邦部长必须随时准备进入工作状态。而假如弃用公车,卫生部就不得不向西班牙委派一名工作人员,帮助部长安装、拆卸办公设备。工作人员的往返机票外加当地的租车费用共计3710欧元。此外,部长在动身之前尚不明确,是否还有其它的公务安排。鉴于施密特的专车是由租赁公司提供的,卫生部没有将折旧成本考虑在内。

对于卫生部的这一套说辞,德国纳税人联合会表示,这是“文过饰非,不足为信”。联合会主席赖纳·霍尔茨纳格尔认为,“部长女士遮遮掩掩,令整个事件愈显扑朔迷离。很多问题依然没有答案。”德国纳税人联合会仿佛早已知道联邦卫生部会有这样一套说辞,因而此前已经为施密特的“公车”消费开出了近1万欧元的账单,其中仅支付给司机的工资和加班费就高达4872欧元。据此,霍尔茨纳格尔指责施密特铺张浪费,千里迢迢调用专车是“不当之举”,并要求相关机构健全规章、明晰责权。

施密特也要出面来回答问题,面对着德国纳税人联合会给她开列的“账单”,她反驳说,自己的行为完全符合有关专车使用的政策及法律规定。联邦政府为每位部长配备公务专车,也允许他们公车私用——无论是在国内还是国外。只是,相应费用将从官员的私人账户上扣除。据悉,施密特去年就曾为6111个私人公里数买单。合理合法,何罪之有呢?

孰是孰非?公众永远是政府的天敌。根据这样的原则,德国联邦卫生部以及施密特本人的解释再有理,但在媒体和公众的质疑面前是那样地苍白。《南德意志报》在一篇评论文章中指出,“专车事件”中的施密特触犯的不是法规条文,而是人们心中的一道红线。因为她所表现出来的骄傲自负以及脱离群众恰恰是一剂政治的毒药。而施密特本人也为此付出了高昂的代价。

距四年一度的德国大选还有两个月时间,据Forsa新近一次的民意调研结果,施密特所在的社民党正以两位数字落后于联盟党的支持率。社民党主席兼总理候选人、德国外长施泰因迈尔仅只获得17%的选票,与现任总理默克尔的58%的超高人气相差甚远。要想后来者居上,社民党还有一场硬仗要打。而施密特此时招来的这股媒体旋风令人唯恐避之不及。29日晚,度假归来的卫生部长首次在公开场合亮相,表示为了不拖团队的后腿,决定暂时退出以施泰因迈尔为首的影子内阁。

也就是说,自2001年以来一直担任卫生部长的现年60岁的施密特将在“专车事件”的阴影中灰头土脸地走下政治舞台。而她的工作,大概也是最不讨好的一种。这位被默克尔总理称为“我的最执拗的部长女士”上任以来连抡三板斧,力削医生团体、保险公司、制药企业的荷包,为此,她没少收过谋杀恐吓信。假如没有一种不屈不挠的顽强斗争精神,医疗体制改革是断然推行不下去的。现在,她又将这种顽强斗争精神用于应对舆论战。事发以来,施密特坚持不肯道歉,并称自己的陈述绝对经得住任何考验。

## 想起了沙尔平“军机事件”

一辆小小的专车竟然阻断了劳苦功高的卫

生部长的仕途之路,这不禁令人想起2002年同样是在大选两个月前遭到罢免的前德国国防部长鲁道夫·沙尔平。

撼动沙尔平乌纱帽的是一次“军机事件”。据媒体爆料,2001年8月,也就在德国军队准备进驻马其顿的前夕,沙尔平却搭军用飞机前往西班牙马略卡岛与女友相聚,并命令飞行员第二天一早再去接他,以便前往军营看望整装待发的德国官兵。据调查,沙尔平在过去的一年里至少20次因私使用军用飞机,其中大部分是为了看他的女友。事件曝光之后,举国一片哗然。沙尔平登时成为“德国历史上最不称职的国防部长”。但是,随后发生的震惊世界的“9·11事件”暂时转移了公众注意力。

2002年7月,德国《明星》杂志披露沙尔平在任期间曾经收受一家公关公司支付的14万马克酬金。一石激起千层浪,这条消息立刻在德国政坛掀起了巨大波澜。

据调查,沙尔平收到的其中一笔8万马克的汇款是作为回忆录的预付稿酬。其余的6万马克则是沙尔平出任国防部长之前在公开场合的演讲费。但是,这种解释不能让人信服。德国议会议长蒂尔泽率先发难,责令沙尔平在四周之内如实汇报酬金的来龙去脉。因为根据有关德国联邦议员的条例规定,凡联邦议员的额外收入如演讲费等,如在一年之内超过1.55万马克或在一个月之内超过2500马克,必须向联邦议会主席团及时申报。而沙尔平却隐瞒不报。

面对媒体的穷追猛打,尽管沙尔平本人还在喋喋不休地辩解,但其微弱的声音早被舆论风暴淹没。大选在即,当时的德国总理施罗德自顾不暇,迅速作出丢卒保车的决定,用《明镜周刊》的话说,“扫地出门仅用了50秒。”

为了防止类似情况的再次发生,执政的社民党和绿党决定在德国大选前修改联邦议员的行为规范条例。今后议员们的额外收入不仅要向联邦议会议长本人通报,而且要在议会手册上和因特网上公布于众。

综合对比施密特的“专车事件”和沙尔平的“军机事件”,我们不难看出舆论监督是打击官员腐败的一种行之有效的手段。

## 德国的“第四种权力”

媒体在德国素有“第四种权力”之称,是名副其实的“无冕之王”。按照法律规定,检察院有义务协助记者就腐败问题进行调查。德国拥有100多家电台、25家电视台、27家通讯社、380多种报纸和9000多种期刊。这些独立的媒体大多是独资或合资的股份制企业,以盈利为目的,依法享有高度的自由。为了最大程度地占有市场,他们一般都雇有耳目,专门收集政府要员的政治丑闻和绯闻,以期吸引公众注意力。这些讯息也乐意为在野党接收并放大。

例如,2002年8月,德国《图片报》揭露说,一些政府官员滥用免费机票。这些机票是汉莎航空公司对航空里程积累到一定数量的顾客的奖励。由于柏林议员因工作之需到处飞来飞去,因此议院规定,凡是出差所得的免费机票不得挪为私用。但是《图片报》宣称,掌握“假公济私”的人员名单,正处于事业巅峰的绿党新秀奥茨德米尔就在其中。加之他以前曾经接收过一家公关公司提供的低息贷款,迫于政治压力,不得不辞去了联邦议院内政发言人的位置。

此外,柏林市副市长、民社党的中坚人物居西也公开承认自己在这方面犯有“不可饶恕的过失”,并宣布辞去目前担任的职务。

丑闻爆出之后,最新的民意测验显示,时任总理的施罗德的竞选对手施托伊贝尔的支持率有所上升,已经处于领先地位。在接受德国电视一台的访问时,施罗德表示:“整个事件的进行方式和方法,让人不得不怀疑幕后有政治企图。”他认为,《图片报》的目的是掀起一场党派运动,从而使在野党在竞选中得利。

更有甚者,社民党总书记明特菲林竟然将始作俑的纳税人联合会和《图片报》告上法庭,罪名是“以不正当手段取得联邦议员的航空里程资料”,从而侵犯了这些人的隐私权。

明特菲林的这一举动触犯了新闻界的众怒。尽管极尽耸人听闻之能事的《图片报》素为严肃媒体所不齿,但在新闻自由面临侵犯的紧要关头,媒体同仁立刻结成统一战线,将矛头对准了明特菲林。《法兰克福汇报》讽刺说:“这就好比是

在地震之后,将怒火发泄在地震仪上一样。”《明镜周刊》也声援道:“这些绯闻已经够让人难堪的了,如果惊惶失措的政治家们希望借助法律甚至是制定新法来限制新闻自由,那么这场讽刺剧终将演变成一个严重的政治问题。”

根据规定,德国媒体的消息来源受法律保护,任何人不得对此进行调查。而且允许报道政府、政党内部的情况,只要内容属实,不泄露国家机密,即属合法。

## 德国纳税人联合会的监督

除新闻媒体之外,各种非政府组织,如行业协会、透明国际组织、记者无疆界组织等也是反腐斗争中的一支重要力量。例如前面提到的纳税人联合会,是一个独立的、超党派的依法注册的协会,也是世界上最大的同业组织。现今旗下拥有32万名成员,并在15个州中设有州协会,所属的卡尔-布劳尔研究所致力于税法研究和财政预算,并将研究报告提供给政府和图书馆。

值得一提的是,纳税人是政府官员的衣食父母,税收占德国财政收入的90%以上。因此“浪费纳税人钱财”的罪名往往是最能击中政治家硬伤的利器,比绯闻更具杀伤力。

各项税收之中,收入所得税又是征收范围最广、税源最大的税种,税率为19%-53%累进税率,对有工资收入(包括工资、股息、红利、个人经营收入、各种佣金、报酬等)者征收。单人申报的起征点为7834欧元,家庭申报的为15668欧元。

纳税人联合会的经费来自于会员缴纳的会费及民间捐款。主要任务是代表纳税人利益,敦促政府制定合理的税收政策,反对财政浪费。他们还调查政府官员的高额开支及失职行为,通过媒体予以披露。同时每年秋季还出版黑皮书,选择100个公共服务部门浪费纳税人钱财的典型案例,给政府施加压力。

例如德国纳税人联合会2007年公布的《公共浪费黑皮书》中指出,两德统一后,政府许多部门在柏林和波恩之间来回搬迁,造成每年大约66000次无谓的飞机出差,以及900万欧元的开支和750吨的运输邮件。为此,联合会建议,所有的政府机构应全部迁往首都柏林。

而在 2006 年的黑皮书中，德国纳税人联合会列举了这样一个浪费案例：巴伐利亚州一个 13 人组成的代表团到中国进行为期一周的访问，“考察”中国的“信访制度”，每人花了 4500 欧元。联合会主席嘲讽说，这样的访问真是多余，到中国去又能借鉴什么信访制度的经验？莫非想让德国人也和中国人一样，刚出家门便被截访么？！

今年年初，纳税人联合会向《汉堡晚报》爆料说，由汉堡市 10 名政府官员组成的一个代表团曾于 2008 年 10 月前往上海访问，但是，就整个旅行期间的日程安排来看，该代表团的活动的重点并不在于公务出访，而是观光游览。为此，联合会驻汉堡负责人普洛克敦促税务局仔细审核，代表团成员为什么要返德之前拜访杭州和北京。据悉，他们在北京逗留数日，下榻在每人每夜 240 欧元的五星级酒店里。

面对媒体的质疑，代表团团长施莱伯表示难以理解，“一切都是照章办事。”他说，“市政府办公厅早在 2006 年就催促我们前往中国，与上海虹口区签订伙伴协议。正是鉴于这样的请求，我们才进行了这样一次拖延已久的回访。”

打着考察的旗号出国旅游，住豪华酒店，吃美味珍馐，这在中国官员眼中似乎不算什么，但在德国人看来，却是一个关乎道德问题的政治污点。因为身处“人间私语，天闻若雷”的监督环境之中，政治家必须洁身自好到近乎纤尘不染的程度，才能满足公众对其品格的极其苛刻的期待。

德国社民党前主席汉斯·约亨·福格尔素以节俭著称。据说，他平生从未坐过公务舱，总是和普通人一样，蜷缩在狭小的经济舱里。当他每次登机，路过其他的联邦议员的身旁，继续前行寻找他的座位的时候，他总是和藹地笑笑，招手祝同事们“旅途愉快！”

在他担任慕尼黑市长期间，他总是乘地铁上下班。1981 年，他作为柏林市市长的候选人被传唤到中央，就在首都机场，他对前来接机的专车视而不见，面对同事的不解眼神匆匆扔下一句：“对不起，我还没有这个资格。”然后招手叫了一辆计程车。

习惯用放大镜看人的媒体最后给他扣了一顶居“谦”自傲的帽子。这也并不奇怪，因为德国报刊除了在发讣告的时候不太吝惜几个好词，基

本上都是以尖酸刻薄为行业标准。正是因为有了民间组织的明察、新闻耳目的暗访，外加在野党派的虎视眈眈以及传媒机构的传声筒和扩音器，为官之人即使身居高位也要战战兢兢做人，否则一不小心就会被一辆“专车”、一架“军机”，或是几张免费机票撂倒辛苦建立起来的高大形象。

（责任编辑 吴 思）

（上接 83 页）认识到，库克对于法律改革、公共医疗、行政管理的建议在今天都得到了实施和承认，他的不朽意义在于——用正义的法律程序实现了对最高权力者的审判。相比后世多位暴君的历史结局，纽伦堡国际法庭对于纳粹高层分子的审判，智利皮诺切特将军、南斯拉夫米洛舍维奇和伊拉克萨达姆接受的审判等，无疑更加显示出库克起诉国王案的不朽意义。

最后需要说明的是，本文题目中加引号的“弑君者”是该著中文版的译名，我想译者应该也同意，英文原著的真实含义为——诛杀暴君的人。

（责任编辑 萧 徐）

中国期刊协会主办



《中外文摘》(半月刊)

**成熟人士的生活读本**

纪 实	观 察	读 点	社 会 讲 义
男 人 女 人	往 事	读 史	人 物
深 度 阅 读	尘 封 档 案	自 由 谈	快 乐 吧
作 品	民 间 搜 索	自 然 与 人	意 林

邮发代号：82-619
定价：4.50元
发行电话：(010) 85237095

社 址：北京市海淀区太平路5号503室
邮 编：100036



# 记录人生 传承文化

——三千元起编辑出版个人文集、家庭画册

## 出书范围

1. 革命史、受难史、创业史等回忆录、自传。
2. 老同学、老同事、老战友怀旧纪念文集。
3. 诗歌、散文、小说、戏剧等文学作品。
4. 时评、杂文、随笔、游记等个人文集。
5. 家庭文集、家史家谱、家族相册等。
6. 地方曲艺、民间传说、民俗方志等。
7. 旧文结集、旧书翻印、老书新出等。

## 服务流程

作者来电说明打算→编辑部寄发参考样书→作者寄送稿件图片→公司核算成本价格→协商签约支付定金→电脑录入编排校对→寄发大样作者初审→专业编辑审改→协商设计封面插页→排版制作样书→作者终审付款→出版印刷送书。

## 出版说明

一般标准：大32开本，封面插页铜版纸彩印、内页胶版纸印刷，无线胶装。

基本价格：200页出版50本两千元，300页出版50本三千元；录入排版设计费用另行计算。

特别说明：书稿内容文责自负，所出书一般没有书号只用于交流与赠送；需出版发行的我们编辑设计制作样书后联系出版社办理。

## 欢迎“组稿代理”与“设立分站”

《个人出书网》《老人出书网》自开办以来，深受离退休老干部、老教授与各地民间作者的欢迎，每月编辑出版个人文集、家族画册三十余部；为方便老龄作者洽谈与交稿，我们计划在全国各地设立“编辑出版分站”或“地方组稿代理”，请有编辑出版经验与组稿能力的个人或单位来人来电洽谈合作，共同繁荣民间出版事业，为保存民间记忆、记录时代沧桑、传承多元文化尽一份绵薄之力。

公司名称：北京时代弄潮文化发展有限公司 咨询电话：010-68920182 传真：010-68928330

联系地址：北京市海淀区、厂洼街五号（北京电视台生活频道院）、博越商务楼6507室 邮编：100089

登陆网址：《个人出书网》(www.grcsw.com) | 《老人出书网》(www.lrcsw.com) | 《时代文化网》(www.sdwhw.net)

出版服务热线

010-68920114

010-68920182

# 欢迎订阅2009年《炎黄春秋》

实事求是 秉笔直书 以史为鉴 与时俱进

《炎黄春秋》是以史为主的综合性纪实月刊。对古今中外、特别是当代革命和建设的重大事件、重要人物的是非功过，依据翔实的史料秉笔直书，不增美、不溢恶、求实存真，以史为鉴，以史资治。在林林总总的期刊之林中具有鲜明特色。

《炎黄春秋》拥有一大批高水平作者。他们有的是资深的革命家，是革命和建设重大事件的亲历者；有的是专家学者，对重大历史事件和人物有深入研究。他们的文章具有较高的权威性和史料价值，在海内外读者中享有很高声誉。

本刊国内外公开发行，国内总发行：北京市报刊发行局

国内邮发代号：82—507 国内各地邮政局（所）均可订阅

国外总发行：中国国际图书贸易总公司（北京399信箱）

国外发行代号：1274M

社址：北京市西城区月坛南街69号

邮政编码：100045

电话：(010) 68532048

传真：(010) 68532569

每期定价：6.90元

全年定价：82.80元

如在当地邮政局（所）订阅有困难，可直接向本刊发行部订阅，免付邮费。



## 《炎黄春秋》创刊15周年精品书系(第一编)再版隆重推出



1998年推出的《炎黄春秋》精品书系，系从1995年以前45期650万字中精心筛选出150万字的文章，分类编辑为：《政坛高层动态》、《重大决策幕后》、《历史迷案揭秘》、《名流写真》、《血荐轩辕》。书系出版一年后，即脱销。在纪念《炎黄春秋》创刊15周年之际，应广大读者的要求，书系再版发行，以弥补本刊早期合订本销罄之不足。

本书系全套5本，定价125元；另加邮挂费12元（因存书不多，恕不分卷出售）。

## 新中国60周年丛书：

起点：亲历中国改革开放  
转折：亲历中国改革开放

内容简介：

本书多位作者参与了中国改革开放以来重大事件的决策，记录了一个又一个非凡的历史瞬间，既有官家的宏观视野，又有民间的客观冷静。这些发表于著名纪实性杂志《炎黄春秋》的文章，致力于匡正教科书的偏误，挖掘过去年代有意或无意掩盖的真实历史，全面提供了观察中国政治、经济与生活变化的新视角，诸多真知灼见也闪耀其间。

起点：亲历中国改革开放 定价：36元 邮费6元

转折：亲历中国改革开放 定价：36元 邮费6元

欲购者可直接向本刊发行部订购。



文革中影响全国的“青岛事件”

民主与专制的百年迷途

再说我的父亲陆定一

“信阳事件”后刘建勋在河南

中共为什么1949年会胜利

德国卫生部长专车失窃案

ISSN 1003-1170



9 771003 117002

国内统一刊号：CN11-2817/K

国内邮发代号：82-507

定价：6.90元